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浙江理工大学

学报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源刊  
科学引文数据库 (SCD) 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CAJ-N) 优先出版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年 第40卷 第1期

Vol.40, No.1 Feb. 2018

中国·杭州 HANGZHOU, CHINA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 目次

## 经济与管理

- 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综述及展望 ..... 张宏,叶敏(1)
- 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研究综述 ..... 余斌,奉小斌(11)
- 近代上海钱庄的信用危机管理(1843—1949) ..... 刘梅英(19)

## 语言与传播

- 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形成动因 ..... 孙文统(28)
- 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 ..... 王正成,李丹丹(33)
- 书写和隐喻的力量——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壁纸》  
..... 何靓(39)
-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女性关怀  
..... 陈蔚青(46)

## 历史与文化

- 新阶段“东向政策”下印度-东盟关系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对策  
..... 曾泳心(53)
- 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 ..... 鲁知先(60)

## 高教研究

-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 周赳,龚素璨,陈建勇(66)
- 国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分析 ..... 汪阳子(72)
- 高校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  
..... 陈毕晟,方平,陈蔚(80)
- 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与演化路径分析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 赵春鱼,刘培峰(85)
- 大学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个体社会化视角  
..... 甄月桥,张殷鹏,朱茹华(91)
- 协同论视域下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理念转型与机制探索  
..... 王琼(99)

#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0, No. 1 2018

## Contents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Research review on the functions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 ZHANG Hong, YE Min(1)
- Research review on tim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search ..... YU Bin, FENG Xiaobin(11)
- Research on th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in modern times:1843—1949 ..... LIU Meiyong(19)

###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preposition stranding of mandarin Chinese  
..... SUN Wentong(28)
- Shor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word vector and emotional ontology  
..... WANG Zhengcheng, LI Dandan(33)
- The power of writing and metaphor: Analysis of *The Yellow Wallpaper*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stylistics  
..... HE Jing(39)
- Deep concern for woman in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War's Unwomanly Face* ..... CHEN Weiqing(46)

### History and Culture

-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dia-ASEAN relations to China under the  
“Look East Policy” at the new stage ..... ZENG Yongxin(53)
-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pa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 LU Zhixian(60)

###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xtile design talent training in line with “fashionable textile”  
..... ZHOU Jiu ,GONG Suli, CHEN Jianyong(66)
-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textile design major ..... WANG Yangzi(72)
-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lumni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 CHEN Bisheng, FANG Ping, CHEN Wei(80)
- A study on domestic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path of learning analysis technique based on the  
view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 ZHAO Chunyu, LIU Peifeng(85)
-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cept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 ZHEN Yueqiao, ZHANG Yinpeng, ZHU Ruhua(91)
- Idea and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 WANG Qiong(99)

# 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综述及展望

张宏,叶敏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在后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作为新的治理主体,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的重要力量。由数据可知,虽然行业协会数量不断攀升,但大多数行业协会苦于无法树立威信而挣扎在生存边缘。究其原因是行业协会职能定位不明确、职能内容不完善阻碍了职能作用的发挥,进而削弱了协会在行业当中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帮助行业协会取得更好得的发展,本文以行业协会职能为中心,对国内外有关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析,总结归纳出当前职能研究方法的特点及不足,并提出未来进行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时的几点改进建议,期望能帮助学者建立更加完善和切合行业协会职能受众诉求的职能内容,进而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助力。

**关键词:**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职能研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01-10

行业协会是工商业界中企业之间的成员互益性联合组织<sup>[1]</sup>,在协调政企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sup>[2]</sup>。随着政府从市场经济中的逐渐“退位”和管理疆域的收缩,其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第三部门,成为政府职能承接、延续政府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行业协会的职能诉求急剧攀升。但囿于历史遗留内因和中国特色国情,被冠以“亚政府”和“准政府”头衔的行业协会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职能内容不健全,职能发挥不到位等种种问题<sup>[3]</sup>,这些不足衍生出行业协会“无作为”、“不作为”、“难作为”的现状,无法发挥出行业协会职能作用,成为其树立协会威信,走向专业型、服务型、自主型社会组织道路上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鉴于此,为了改善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真正发挥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本文以行业协会职能为中心,从研究方法视角对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的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析,发现学者对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较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中,也倾向从行业协会的角度进

行协会职能审视,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职能内容时缺乏行业协会和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间的交互视角。且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各职能之间的重要性差异,只明晰了“它是什么”,但是对“先做什么”却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诠释,难以对协会在明晰职能内容之后要采取的行为进行进一步指导。故而,为弥合上述不足,本文提出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政府、企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共同作为研究主体,根据各主体对协会职能的需求对现存的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审视和改进,确立出最契合主体诉求的行业协会职能。同时,综合各研究主体对职能的重视程度大小对职能进行先后排序,帮助行业协会在职能履行时有的放矢,为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树立协会威信,走向自主治理的道路助力。

## 一、相关概念

行业协会作为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和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日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并且成为政府制度改革的重要力量<sup>[4]</sup>。但目前学术界对行业协会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针对行业协会的大多数

研究也往往涉及社会组织其他衍生机构团体。例如,岳经纶、郭英慧<sup>[5]</sup>在其研究中指出,行业协会不仅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其两者在概念定义上趋同,而且行业协会也是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并随着市场的发展,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徐建牛、孙沛东<sup>[6]</sup>在其研究中用“草根行业协会”指代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行业协会,并认为该行业协会具备极强的民间组织特性。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中还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的说法,对行业协会和商会两个主体进行统筹定义<sup>[7]</sup>。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指出各概念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行业协会的定义模棱两可。因此,为了帮助各界更好地理解行业协会的内涵,本文选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商会”等四种组织分别与行业协会进行对比,明确各主体的概念边界,协助读者从不同层面把握行业协会的概念特性和内容。

### (一)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联合国文件中<sup>[8]</sup>,其由英文词组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译化而来,因此在文献写作中学者也会将“非政府组织”简化为 NGO。它是指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公民组织(《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正如字面意思表述,“非政府组织”强调组织的非官方性,与政府主导的相关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是这里的“非政府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毫无关联甚至与政府对立,恰恰相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历程中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9]</sup>。清华大学在2000年曾针对 NGO 做过一次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将近40%的“非政府组织”涉及行业协会、学会领域,行业协会成为“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经济类 NGO 的典型代表<sup>[10]</sup>。

### (二)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NPO)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组织存续目的,向社会提供服务的非政企机构<sup>[11]</sup>。美国的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对“非营利性组织”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最终归纳为五个方面,也被称为5特征法,分别为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sup>[12]</sup>。其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已成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特征,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尤其是非营利性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其与企业等利益组织存在根本不同,这一点也

与日本学者重富真一<sup>[13]</sup>的观点不谋而合。需要明确的是非营利性不是指组织不进行财富的积累,而是强调组织收入不得用于个人分配,而应该投入到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学术界对行业协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在研究时将两者当成同一概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sup>[5]</sup>,甚至还存在有行业非营利组织的说法<sup>[14]</sup>。但通过对两者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中将企业联系起来讨论行业共同问题、采取共同行动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sup>[5]</sup>。

### (三)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Civil Society)

在我国,中国民政部管理下的非营利组织称为“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社团<sup>[9]</sup>。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sup>[15]</sup>,强调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独立性<sup>[16]</sup>,根据现有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其中行业协会是社会团体的重要分支<sup>[9]</sup>。此外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中,行业类非营利组织被作为组成民间组织的12个组成部分之一,在民间组织的构建框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sup>[11]</sup>。

### (四)行业协会与“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商会是服务、流通类组织的联合<sup>[8]</sup>,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中,“商会”被定义为:“由城市工商业者组建的民间行业组织,分两种类型:一指城市商人按其经营商品的类别划分组建的行业性组织;一指由多个行业性商会组建的跨行业协调组织<sup>[17]</sup>。”该定义并没有将其与行业协会进行区分,两者的概念界限非常模糊,因此在研究中不少学者并不对两者作详细的区分,而是一度将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一个特定名词进行相应的调研<sup>[18-20]</sup>。但在国内的相关官方文件中则将商会作为一种经济协会,包含在行业协会中<sup>[8]</sup>。

上述四种组织虽然名称上相去甚远,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都在某些方面与行业协会呈现出一定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将其与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成为混淆行业协会概念的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

综合上述论点,本文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内企业自愿参加,以增进行业内企业利益为宗旨,为提高行业治理有效性和促进行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跨政府、跨企业的互益性联合组织。从宏观层面来讲,其能够成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延伸,利用“第三

方组织”的职位便利,帮助改善行业内治理的效率和效益;而就微观层面来看,其对营造更加稳定、有序和高效的行业环境,帮助行业内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也大有助益。

表 1 行业协会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类型	侧重点	与行业协会的联系
非政府组织(NGO)	强调组织性质的“非官方性”,与政府组织进行区分	行业协会是经济类 NGO 的代表
非营利性组织(NPO)	强调组织存续目的是“非营利性”的,与企业等利益组织进行区分	行业协会属于广义的非营利组织范畴,是行业中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
民间组织(Civil Society)	采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强调组织功能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独立性	行业协会是组成民间组织三大分类中社会团体中的重要分支,也是组成民间组织的 12 个细分条目之一
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强调行业组织的经济特性,与行政类组织进行区分	商会是行业协会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整理。

## 二、行业协会职能诉求的凸显

### (一)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sup>[21]</sup>。这是自十八大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来又一次对社会组织在政府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进行肯定。在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大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和扶植力度,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已然成为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而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分支,其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日益成为业界和政府越来越强烈的共同意向<sup>[12]</sup>,在政府的制度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4]</sup>。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它是对政府建立的“公序”的补充<sup>[22]</sup>,成为政府面对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中的必须依赖的一种权力主体<sup>[23]</sup>,是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力量。而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随着国家治理疆域的收缩,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介入,类似“第三方机制”的存在,能有效弥补政府从市场经济中“退位”后遗留的职能空白,完成公共职能的有效供给<sup>[24]</sup>,实现政府“监管”到市场“自治”转型中社会发展的稳定。

### (二)行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有效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宣示。面对新局面和新形势,改革势必成为党和政府必须牢牢掌握的主线<sup>[25]</sup>。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带来机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方利益主体的入侵,业内竞争环境也急剧恶化,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与贸易摩擦时常发生,建立标准化的行业规范和营造安全有序的贸易环境成

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首要任务。而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内企业的利益联合组织,能够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sup>[26]</sup>。除此之外,协会还能够及时依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行业规范<sup>[27]</sup>,在“快经济”市场中,减少企业的反应时间,把握市场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中也能起到事前预警和事后协调等作用,帮助维护行业协会成员及整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利益<sup>[28]</sup>。

### (三)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

国外市场持续渗透和竞争逐渐升级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更具效力的组织制度和更具优势的成本管理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而研究表明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的必要服务和技术支持对完善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sup>[28-30]</sup>,并且其作为企业外的“第三方协调者”与资源提供者,不仅能调解企业间的利益冲突提高企业组织运行效率,在降低单个企业搜集市场信息和进行交易前的经营决策成本方面也大有裨益。此外面临行业间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摩擦,还可以降低单个企业反倾销诉讼和应诉成本<sup>[31]</sup>,这些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重选择。

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型、行业竞争环境的恶化和企业发展壮大的需求,从宏观到微观对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也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契机,协会数量从 2000 年的 36605 个<sup>[32]</sup>,发展到 2014 年的近 7 万个<sup>[33]</sup>,成为社会组织中最活跃的部分。然而现有的行业协会发展现状仍不容乐观。国内大部分行业协会的生存状态处于难以维持或勉强维持的状态<sup>[22]</sup>,即使是行业协会发展

较好的温州地区,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sup>[34]</sup>,其中行业协会职能不清晰、职能缺位,职能作用发挥不到位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障碍<sup>[35]</sup>。在此阶段,明确行业协会职能定位,完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是帮助行业协会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前提<sup>[36]</sup>。

### 三、现有研究的综述

行业协会“能办事儿”“会办事儿”是协会成长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其进行自我提升和树立威信的重要路径<sup>[37]</sup>。而其中,确立协会职能定位,明晰协会职能内容是协会“办事儿”的前提。因此为了帮助行业协会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树立协会威信,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主体对此展开了广泛研究。本部分将主要综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

#### (一)国内研究

本文依照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将国内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 1. 内容分析

贾西津等<sup>[38]</sup>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提出协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协调和服务。这一观点得到康晓光学者的赞同,同样是对行业协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康晓光<sup>[39]</sup>还认为行业协会除了协调和服务职能之外,还包括代表职能、沟通职能、监督职能、公证职能、统计职能、研究职能。而陈荣峰<sup>[40]</sup>则在二者的基础上将协会职能分为4大部分:维权服务、行业自律、参与功能和中介功能。此外张建民<sup>[41]</sup>在分析国外行业协会职能演变进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性核心职能、优先职能和其他职能。其中核心职能强调服务会员,包括信息提供和行动协调;而优先职能包括市场支持和市场补充;最后是行业公共性强、对协会商会组织能力要求高的其他职能。谢增福<sup>[42]</sup>则对官方文件中针对协会职能的相关条例和规定进行分析,认为协会职能包括:自律、协调、监督和维权、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等4类,并指出协调是行业协会的本质职能,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层次提升,行业协会也衍生出一些现代职能,包括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内市场、帮助企业拓展国外市场,以及反倾销职能。

##### 2. 归纳总结

刘斌和杨浩<sup>[31]</sup>侧重描述行业协会的行政作用,

将其职能概括为代表职能、沟通职能、协调职能、监督职能、公证职能、仲裁职能等6项,也变相揭示出为何行业协会一直被冠以“准政府”、“二政府”头衔。而朱英<sup>[43]</sup>则着重体现行业协会处于政府和企业间“第三方组织”特殊地位,将行业协会职能概述为代表、服务、自律和中介等4项职能。至于郑江淮和赵向莉在研究时更多地表达出行业协会作为“企业利益表达的代表”对企业发展所承担的职能义务。其中郑江淮<sup>[44]</sup>将行业协会职能归纳为利益代表、提供服务、促进社会契约形成以及执行被授权等4项,且指出作为企业的利益代表,为企业服务是其核心职能。赵向莉<sup>[45]</sup>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企业视角的14项行业协会职能,包括:创办了刊物和简报、组织宣传活动、行业调查和分析、经验推广、通报行业重要事件和政策变化、组织培训、引导企业参与公益活动、制定行规并监督执行、协调会员间关系、协调政企关系、协调会员与非会员关系、参与职称评定、参与许可证发放工作、参与企业年终评审等。王民等<sup>[46]</sup>倾向将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在公益社会中职能的延伸,在研究指出行业协会的4项基本职能为维护权益、行业自律、公共服务、政策建议,将公共服务纳入到协会职能内容当中。江静和张健在研究时,将行业协会看成一个组织团体,突出其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其中江静<sup>[47]</sup>将行业协会的功能归结为4点:利益代表、提供服务、提供社会契约、执行被授权的管理职能等4项;而张健<sup>[35]</sup>认为行业协会主要包括3项职能:服务、代表和管理,并且对管理职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分为制定行业标准、行业规划、解决行业纠纷、发放许可证等。此外,王勇<sup>[48]</sup>在研究时突出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行业协会作为政府职能承接主体应承担的职能义务和内容,指出行业协会主要职能应分为协会服务、内部自律和政府委托等3大类,明确了行业协会的“非政府”属性,同时也暗示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体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杨剑和黄建<sup>[3]</sup>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企业比较全面的对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进行了概括,他们指出行业协会职能内容可以分为3个层次:政治、社会和经济。其中政治方面,包括提供组织支撑和制度平台,确保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化解政企沟通障碍;社会方面,包括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秩序;经济方面,代表、维护成员利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等。此外还创新性提出行业协会有助形成新的社会价值的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府大有裨益。

### 3. 案例研究

陈宪等<sup>[49]</sup>通过对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将其功能概括为服务、协调和沟通 3 项。刘张君<sup>[50]</sup>则通过对银行业为代表进行分析,得出行业协会主要包括行业自律管理会员、协调会员、服务会员和监管当局助手等 4 种职能。张宏<sup>[30]</sup>通过对胶州市行业协会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将行业协会的职能概括为以下 5 点:服务、行业自律、整合资源、协调、管理和组织培训。孟亚男<sup>[37]</sup>以中关村一个 IT 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主体,认为其作为中介性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体现在 3 个方面:资源整合、权利整合、行业管理和服务。梁昌勇等<sup>[51]</sup>以安徽省粮食、饲料和旅游等 3 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企业行为、维护行业秩序等行业功能。肖凤翔和贾旻<sup>[52]</sup>则以现代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职能有 3 类:决策咨询、管理和服务。此外余晖<sup>[53]</sup>还采用多地域、多行业案例研究的方式,将行业协会职能分为信息提供和协调行动。上述 7 位学者虽然研究的案例主体不同,但是从中总结出的行业协会职能殊途同归。首先,强调行业协会的协调和服务作用,印证了协会作为“第三方组织”的中介特性和为企业谋福祉的核心宗旨。其次,在研究中均未指出行业协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研究视角局限在行业内,而没有上升到政府和社会层面,职能内容局限。

但根据已有研究显示,学术界已意识到上述不足,并且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进。阳盛益<sup>[23]</sup>以温州行业协会作为分析主体指出除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服务企业、提供咨询之外,发展公益也是行业协会的重要职能。而同样以温州为研究主体的周莹等<sup>[54]</sup>则对其社会功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得出保护社会环境、维持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也包含在行业协会职能内容中。周俊、宋晓清<sup>[55]</sup>以杭州和温州两市为研究对象,提到在两地行业协会职能内容中,稳定社会环境、发展行业公益是重要组成部分。杭州行业协会的 5 大重要职能分别是:行业培训和咨询,信息提供、行业自律、行业品牌建设及价格协调;温州行业协会的 5 大重要职能包括:组织会展、行业资料整理、发布信息、行业培训和行业公益事业。

### 4. 调查研究

王名和孙春苗<sup>[56]</sup>主要以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为依据,据问卷分析结果提出,目前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主要体现在行业层面,包括提供信息、维权和培

训等。而赵向莉<sup>[57]</sup>则主要聚焦在企业层面,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指出行业协会在企业层面的职能主要分为 3 类:信息功能、协调功能和管理功能。黄蔚佳<sup>[58]</sup>在研究中采用调查研究中的访谈法对广西省转型期间行业协会的职能进行探讨,并将其概括为以下 4 种:实现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帮助企业维权、服务企业及帮助行业自主管理。

### (二)国外相关研究

在针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收集时,由于国内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中文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在西方往往对应多种不同的英文名称和含义<sup>[38]</sup>,其中单从翻译上来看,外文的行业协会通常被翻译成 Trade promo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和 Trade association<sup>[56]</sup>,有时也被称为 Business association, Employer association<sup>[22]</sup>,但如果从意义上来进行区分,NGO、NPO 等组织内涵与其也有颇多相似和重合之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时二者与行业协会的用法常被混淆,界限不是非常明晰<sup>[18-20]</sup>,所以在进行文献搜寻时有必要对这两者进行同步检索。因此本文以 Trade promotion association、Trade association、Business association、Employer association、NGO、NPO 等六个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并将不符合文中研究主题和要求的文献剔除,最终梳理概括为以下三大类:

#### 1. 内容分析

根据学者的研究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探讨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职能。通过对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Lindberg<sup>[59]</sup>提出,行业协会具备稳定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等职能;而 Hollingsworth 等<sup>[60]</sup>认为行业协会不仅包括上述两种职能,还包括对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进行规范,保护行业内企业利益等功能;Doner 和 Schneider<sup>[61]</sup>则站在更高的层次,提出行业协会不仅有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竞争格局有稳固维稳功能,同时还具备行政监督和管制等职能。

第二类着重聚焦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间的特殊地位。在研究中,Frahana<sup>[62]</sup>阐述了行业协会作为议程设置者、良心维护者、合作者、专家、游说家、实施者等六种角色所具备的其在组织、协调、沟通、代表、发布信息、执行等 6 项职能。而 Sabine<sup>[63]</sup>具体提出行业协会的五个核心职能层面:角色、权力、责任、合法和承诺。

此外 Schaede<sup>[64]</sup>和 Nelson<sup>[65]</sup>在研究时还将协会作为自主治理运营团体指出,对协会进行自我管理,执行相关规章条例也是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案例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分类,主要可从以下两点来进行分析:a)促进行业发展,Tendler<sup>[66]</sup>、Athreye和Chaturvedi<sup>[67]</sup>分别以巴西家具行业协会和印度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具有信息传递和组织研发创新等职能;Kalle<sup>[68]</sup>、Wolfgang和Michaela<sup>[69]</sup>以香港、丹麦、芬兰和德国作为研究主体,认为技术推广也包含在其职能范围当中;Schneiberg<sup>[70]</sup>、Ville和Merrett等<sup>[71]</sup>以美国消防保险业和新西兰羊毛协会为中心开展研究,结果显示促进产业间合作、规范行业竞争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b)保护环境, Lee、Jung和Kwak<sup>[72]</sup>以小型干洗店为研究对象指出贸易协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的监督和管控职能。Sinh<sup>[73]</sup>、Turnock<sup>[74]</sup>、Haigh<sup>[75]</sup>通过对泰国水用户合作社、欧洲东南部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牛津布鲁克大学共同支持的土地复垦研究项目进行研究,指出行业协会具备宣传、倡议等职能。Bailey<sup>[76]</sup>还通过对英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案例进行研究指出,制定章程和落实政策也包含在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当中。

## 3. 调查研究

该类研究,学者主要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进行分析和概述。Kennedy和Dornan<sup>[2]</sup>以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中12家以旅游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法探讨了这12家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方面的职能,并指出提供教育培训、制定发展的相关官方政策和进行研究、投资属于其职能内容。Ramamoorthy、Poyyamoli和Kumar等<sup>[77]</sup>以印度南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为例,通过实地访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以及查访当局的有关记录等方法进行两次数据收集,认为行业协会具备改善环境职能。Elizabeth<sup>[78]</sup>等以秘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为例,通过对其中28个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提出NGO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四项职能:宣传、倡导、发展和扶植畜牧业。另外,Dario和Wolfram等<sup>[79]</sup>还以菲律宾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种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调查,得出保护森林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国内外研究特点及不足

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都倾向采用内

容分析、归纳总结、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的方式对协会的职能和内容进行研究,例如,张健<sup>[35]</sup>、孟亚男<sup>[37]</sup>、Lindberg等<sup>[59]</sup>、Kalle等<sup>[68]</sup>都是根据已有文献或资料进行协会职能的提取和归纳。而对于定量研究的关注稍微有所不足,目前能获取到的文献资料不足定性研究的五分之一。并且在同一研究中,国内学者通常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例如,王名等<sup>[56]</sup>和赵向莉<sup>[57]</sup>在收集数据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黄蔚佳<sup>[58]</sup>的数据则关键依靠访谈调查获得;而国外学者更偏好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例如Kennedy<sup>[2]</sup>在研究时采用了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法,Rajamanikam等<sup>[77]</sup>在获取数据时结合了实地访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以及查访当局的有关记录等5种方法,研究方式也更多元化。

第二,在职能的研究上,国内外针对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层面很广,在国家、市场、企业层面都有所涉及。相较国外,国内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研究更加丰富,阐述的职能内容也更全面,例如其中涉及到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经济职能、行业建设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以及组织自我管理职能等,而国外学者对协会职能研究的层次更深、更细,善于从一些具体的案例中进行某种细小职能的提取,例如, Lee等<sup>[72]</sup>和Sinh<sup>[73]</sup>则只探索了行业协会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能,阐述的职能内容更为精准。此外,国内对职能的研究多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探索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包括维护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解决市场纠纷等,但国外则更多围绕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展开,例如改善环境、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等。

第三,在选取对比研究主体的跨度上,国外学者选取的跨度更大。国内学者的对比研究主体多是选取不同省份或市级区域内的行业协会组织,例如梁昌勇等在进行对比研究时以安徽省粮食、饲料和旅游等3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但国外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在不同国家间选取对比主体,例如,Kennedy和Dornan<sup>[2]</sup>在研究时选择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中12家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

除上述特点外,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同时呈现出单主体研究视角,以及对职能重要性不加区分等不足。其中单主体研究视角是指在研究中,以某一方团体或组织作为研究的对象,站在其立场对文中研究的问题进行鸟瞰。例如,黄蔚佳<sup>[58]</sup>在研究行业协会职能时,关键针对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和领导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收集;Elizabeth<sup>[78]</sup>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时也主要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表作为访谈对象。结合上文所述已有研究文献可知,现有针对行业协会的职能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时较多围绕某一类主体进行,要么是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要么是行业协会的领导和代表,并以他们的观点为支撑进行行业协会职能内容的搭建,但“屁股决定脑袋”,不同地位主体对协会职能的诉求和看法存在差异<sup>[58]</sup>,如果只从一方视角进行行业协会职能的构建势必会有失偏颇,难以制定出最契合行业协会职能受众需求的职能内容,而这将会大大降低协会职能作用的发挥<sup>[80]</sup>。

而对职能重要性不加区分则是指行业协会内各项职能的重要程度相同,协会在承担和履行职能时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国内外研究多局限于协会职能内容的丰富,即解决行业协会职能“是什么”的难题,但是对确立职能履行的先后顺序,即“先做什么”却鲜有涉及,学术界默认各项职能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的重要性等同,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一视同仁的职能内容只会让面临资源困境的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无的放矢,影响职能作用的发挥。

## 五、结 语

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企业的角度,界对行业协会职能作用的诉求越发凸显,行业协会职能内容作为协会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也愈发受到重视。本文以学者在分析行业协会职能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依据,对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明确了现有研究的特点及不足。针对上述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 (一)将多个主体纳入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体系中,实现受众需求与职能的契合

身处不同背景和环境下的主体对行业协会职能的需求不同,因此在确立行业协会职能时要从多主体角度出发对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审视,重视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在职能内容确立过程中的角色,认识到其对修正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一起纳入职能的研究体系中来。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第一,对上述主体分别进行调研,了解其对行业协会职能的需求和期待;第二,将各个主体的调研结果与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体系进行对比;第三,根据对比结果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进行

修正,补其所需,去其所弃,实现受众需求和职能之间的契合。

### (二)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间的对等关系,明晰行业协会各职能重要程度

主体的差异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表明对协会职能一视同仁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此情况下,应该树立一个衡量标准,量化各个职能的重要性,让协会在进行职能履行时有据可循。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首先,让各个研究主体对协会职能进行重要性打分,分数越高代表职能越重要;接着,将各个研究主体对职能重要性的打分进行对应相加得到各个职能的总评分;最后,以总评分为依据来分配职能权重,分数越高权重越大,而具备高权重的职能在同等情况下有优先履行权,总权重相加等于1。经过上述方式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之间的对等关系,不仅能直观清晰地反映该职能的优先等级,而且可以有效帮助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有的放矢。

### (三)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的独特优势,更有效地收集相关调研数据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研究目的,在研究时可以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优势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一方面,问卷调查是一种量化方法,适合进行具体数据的收集,学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得到各主体对职能重要性的评分数据,并以此作为分配权重的依据,会大大提高职能重要性划分的说服力。另一方面,相较问卷调查,访谈偏定性研究方法,适合进行意见、看法的收集,因此运用访谈法与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沟通可以深入了解各主体的需求和期待,进而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全方位审视,最终构建出最契合主体需求的职能。

## 参考文献:

- [1] 廖鸿,石国亮.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管理及改革展望[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52-58.
- [2] Kennedy K, Dornan D. An overview: Touris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9,14(2):183-200.
- [3] 杨剑,黄建. 公共治理理论下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10):184-185.
- [4] 郁建兴,沈永东,周俊. 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的重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7):107-116.
- [5] 岳经纶,郭英慧. 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J]. 东岳论丛,2013(7):5-14.

- [6] 徐建牛,孙沛东.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J].浙江学刊,2009(1):200-205.
- [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1).
- [8] 郑昕,魏红英.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法性与准入制度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4(1):47-51.
- [9] 黄立侠.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及管理的思考[J].决策与信息旬刊,2015(11):148-149.
- [10]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1] 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 [12]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30-43.
- [13] 重富真一.亚洲的国家与NGO[M].东京:明石书店,2001.
- [14] 邢小强,全允桓,陈晓鹏.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商业模式:一个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10):108-124.
- [15]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6] 林尚立,王华.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J].学术月刊,2006(5):22-28.
-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18] 郁建兴,周俊,沈永东,等.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商会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2013(12):53-61.
- [19] 龙宁丽.国家和社会的距离:寻求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范式:基于对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4(6):73-80.
- [20] 杨剑,黄建.治理视阈下中国行业协会商会之功能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3):119-123.
- [2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2).
- [22] 余晖,邱靖基,郑江淮,等.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 [23] 阳盛益,金蕾.地方治理视角中的行业协会职能分析:基于温州商会的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2011(11):68-70.
- [24]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25] 姜泓冰,程远州,贺林平.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N].人民日报,2017-10-21(9).
- [26] 刘瑞明,段雨玮,黄维乔.中国转型期的食品安全治理:基于行为法经济学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98-116.
- [27] 柴振国,范旭华.区域合作中的行业协会立法回应[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91-92.
- [28] 孙铮,刘浩.反倾销会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辨析[J].会计研究,2005(1):67-77.
- [29] 李锐.发达国家行业建设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4):71-74.
- [30] 张宏.行业协会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J].现代经济信息,2011(13):285-286.
- [31] 刘斌,杨浩.我国行业协会的性质和功能研究:从交易成本和规制角度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03(4):24-26.
- [32] 高丙中,袁瑞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3] 民政部召开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发展工作交流会[EB/OL].(2014-04-12).[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2/content\\_2657747.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2/content_2657747.htm).
- [34] 江华.民间商会的失灵及其矫正:基于温州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8(1):164-167.
- [35] 张健.行业协会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钻石模型[J].生产力研究,2012(12):223-225.
- [36] 周帮扬,傅大鹏.我国行业协会立法现状分析[J].理论月刊,2007(4):126-128.
- [37] 孟亚男.“内生一增能”:民间行业协会的生长模式:基于北京中关村一个IT业行业协会生长历程的个案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109-114.
- [38] 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39] 康晓光.行业协会何去何从[J].中国改革,2001(4):34-36.
- [40] 陈荣峰.中外行业协会功能比较:兼论健全我国行业协会功能[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10-30.
- [41] 张建民.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职能的新定位[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5):29-37.
- [42] 谢增福.行业协会功能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8:50-129.
- [43]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4] 郑江淮,江静.理解行业协会[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5-62.
- [45] 赵向莉.不同生成途径行业协会的功能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21):98-100.
- [46] 王民,刘培峰.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47] 江静.转型国家行业协会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基于政府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11):93-97.
- [48] 王勇.行业协会职能定位新模式:“三位一体”[J].中国市场,2013(21):110-112.
- [49] 陈宪,徐中振.体制转型与行业协会:上海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研究报告[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

- [50] 刘张君. 基于合作博弈的银行业协会治理机制研究[J]. 金融研究, 2007(12): 231-235.
- [51] 梁昌勇, 代翠, 朱龙. 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 一项多案例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6(1): 228-234.
- [52] 肖凤翔, 贾旻. 行业协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机理、困境和思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84-91.
- [53] 余晖著. 民间商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理论与案例[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 [54] 周莹, 江华, 张建民. 行业协会实施自愿性环境治理: 温州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3): 71-75.
- [55] 周俊, 宋晓清. 行业协会的公共治理功能及其再造: 以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11): 36-46.
- [56] 王名, 孙春苗. 行业协会论纲[J].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09(1): 1-39.
- [57] 赵向莉. 行业协会功能维度及其对企业信誉缺失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D].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2013: 50-125.
- [58] 黄蔚佳. 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职能研究: 以广西行业协会为例[D].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2014: 10-45.
- [59] Lindberg L, Campbell J, Hollingsworth J.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y*, 1991, 89(2): 3-34.
- [60] Hollingsworth J, Schmitter P, Atreec W. Govern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Performance and control of economic sector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46(5): 20-43.
- [61] Doner R, Schneider B.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J].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00, 2(3): 261-288.
- [62] Farhana Y. NGO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1, 10(2): 149.
- [63] Sabine 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governance 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green building councils[J]. *Environmental Policy & Governance*, 2014, 24(4): 247-261.
- [64] Schaede U. Cooperative capitalism: Self-regulation,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 anti-monopoly law in Japan[J]. *Oup Catalogue*, 2011, 28(1): 203-206.
- [65] Nelson P.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information flows, authority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Japan[D].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2004, 78(32): 996-1009.
- [66] Tandler J. *Good government in the tropics* [D].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Johns Hopkins, 1997, 66(32): 1250-1264.
- [67] Athreye S, Chaturvedi 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technology-based growth in India[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7, 19(1): 156-173.
- [68] Kalle J. The role of intermediating institutions in the diffusion of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How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tervened in Denmark, Finland, and Hong Kong[J]. *Information Society*, 2001, 17(3): 195-210.
- [69] Wolfgang M, Michaela O. Innovativemilieu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role of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Germany[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4): 441-452.
- [70] Schneiberg M.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governance by association: Private order and price controls in American fire insurance[J]. *Politics and Society*, 1999, 27(6): 67-103.
- [71] Ville S, Merrett D, Morgan 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s facilitators of social capital: The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operations of the Melbourne woolbrokers association [J]. *Business History*, 2008, 50(6): 781-794.
- [72] Lee E, Jung C, Kwak J. 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under limite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small businesses[J]. *Environmental Policy & Governance*, 2016, 26(5): 422-436.
- [73] Sinh B. Government and NGO partnership in managing community-based water resources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Thai long dam project[J]. *Business Strategy & the Environment*, 2002, 11(2): 119-129.
- [74] Turnock D. The role of NGO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south-eastern Europe[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4, 13(1): 103-109.
- [75] Haigh M.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value of link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J].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30(2): 327-349.
- [76] Bailey I, Rupp S. The evolving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negotiated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The case of United Kingdom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15(1): 40-54.
- [77] Rajamanikam R, Poyyamoli G, Kumar S, et al.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residenti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Puducherry, a coastal city of India[J].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 2014,32(9):867-881.
- [78] Elizabeth F, Donald J, Markus J.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mbating illegal wildlife-pet trade in Peru[J].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015,24(11):72-82.
- [79] Dario N, Wolfram H. The role of “hybrid” NGOs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lawan island, the Philippines [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0,23(2):165-180.
- [80] Newbery R, Gorton M, Phillipson J, et al. Sustaining business networks: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 bundles sought by members of local business associations[J]. *Environment & Planning C: Government & Policy*, 2016,34(7):1267-1283.

## Research review on the functions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ZHANG Hong, YE 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dual management era, industry associations, as new governance subject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data we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continues to rise, most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ffer from the inability to establish prestige and struggle on the edge of survival. The reason i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s not clear, and the content of function is also not perfect. These weaknesses hinder the exertion of functions and then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help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develop better,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unc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as the center,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func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func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hope of helping scholars to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content which will meets the needs of audience, and the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Key words:** industry association; functional content; func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review

(责任编辑:钱一鹤)

## 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研究综述

余 斌,奉小斌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时间已成为知识搜索战略的构成要素。综合以往与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相关研究,围绕“搜索什么知识”、“何时搜索知识”及“如何搜索知识”三个主题展开研究,系统梳理了知识年龄及时序问题、知识搜索速度及时机问题、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三个方面主题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未来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时间边界、时机选择、时间认知、时间演化等四个前沿问题。

**关键词:** 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知识年龄;搜索时机;时间压力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11-08

知识搜索作为创新管理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学者们主要聚焦于知识搜索的纵深度、宽广度、距离维度、知识源特征来划分知识搜索维度<sup>[1-3]</sup>。动态环境下,组织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搜索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对时间的敏感性,表现为“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搜索企业所需的知识”<sup>[4]</sup>,并且企业从外部搜索汲取新知识的速度也引起重视<sup>[5]</sup>。一些研究从知识时间边界角度将知识搜索模式区分为时间探索与时间利用<sup>[6]</sup>、前沿技术搜索与成熟技术搜索<sup>[7]</sup>等,但大多研究仍停留在静态时间点和企业进入市场速度的客观时间上,忽视了企业的知识搜索特征随时间或产业环境的变化呈现动态性<sup>[8-10]</sup>。从演化经济学角度而言,知识搜索被认为是一个解决创新问题的过程,企业创新是随着时间推演不断及时地从外部搜索知识更新自身知识基的结果。因此知识搜索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时间序列,先前或现在的搜索行为会影响后续发生的搜索活动<sup>[11-12]</sup>。由于以往的静态研究并未回答“企业间如何围绕创新展开知识搜索竞赛”<sup>[13]</sup>,这启发笔者思考企业当前搜索时机(Timing)的选择问题,研究组织决策者如何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和行

业特征掌控搜索的节奏,尤其是何时采取何种搜索行动最有利于组织获取竞争优势。

在复杂多变情境下做出正确的搜索决策,要求管理者综合考量企业知识搜索的速度、时机抉择、时序先后及时间压力等问题<sup>[4,9]</sup>,分配好管理注意力和关注调节焦点识别来自外部的时间压力并进行环境感知,透过时间维度理解与解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关系。基于此,本文结合以往相关研究对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综述:“搜索什么知识(客观视角)”、“何时搜索知识(竞争视角)”及“如何搜索知识(主观视角)”,其中“搜索什么知识”主要涉及到搜索的知识年龄(旧知识/新知识/潜在知识)及时序问题、“何时搜索知识”主要聚焦知识搜索速度及时机问题、“如何搜索知识”主要关注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问题。围绕知识搜索的主观、客观和竞争三个视角,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综述思路,下面将分别探讨这三个主题并试图建立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企业新旧知识搜索目标是否会影响搜索速度与搜索时机选择,后者反过来是否会影响企业搜索到的知识类型及时序模式;其次,搜索速度和搜索时机是否与管理者的时间压力及注

收稿日期:2017-09-25 网络出版日期:2018-01-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2166;71302125);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7C35022)

作者简介:余 斌(1995-),男,浙江宁波人,本科生,主要从事创新搜索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奉小斌,E-mail:fengxb2002@163.com

注意力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最后,时间压力与注意力分配对企业搜索到的知识类型及时序模式是否产生影响,新旧知识搜索目标将会带来哪些方面的时间压力及认知冲突。本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未来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前沿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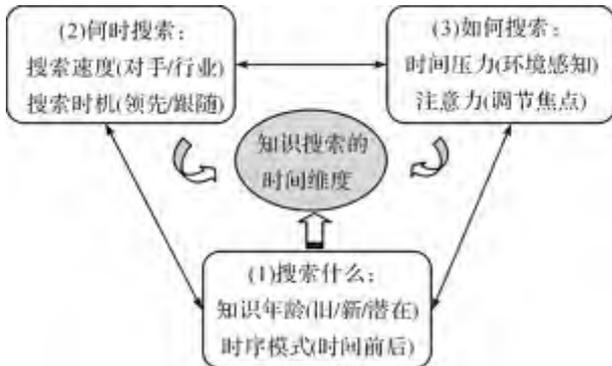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时间维度的知识搜索研究综述构思

## 一、搜索的知识年龄及时序模式

### (一)搜索的知识年龄

知识年龄是知识搜索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时间特征,多数研究将搜索到的知识划分为新知识或旧知识<sup>[14]</sup>,最近搜索或出现的知识系通常意义上的新知识,包括企业新知识、行业新知识及行业外新知识<sup>[2]</sup>。潜在新知识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潜在知识的界定与研究相对尚处于起步阶段,个别研究(如 Rosenkopf 等<sup>[15]</sup>)将潜在知识等同于尚未发现的科学知识或产业领域之外的新知识。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和路径依赖,企业倾向在现有知识域附近搜索解决问题的方案,搜索旧知识还可以为企业获得积极的反馈,但是过度开发过去旧知识可能陷入“时间近视症(Temporal myopia)”<sup>[16]</sup>。还有学者将搜索旧的或者以前的知识视为利用性搜索,而搜索新的或最近的知识视为探索性搜索<sup>[6]</sup>。

虽然搜索知识的新旧程度对创新产出均有影响,但是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关于旧知识,一些学者(如 Katila<sup>[2]</sup>)认为旧知识不能满足环境变化的需求,但也有学者强调旧知识因聚焦特定知识域而更可靠、对企业价值更高<sup>[17]</sup>;关于新知识,有研究主张搜索最新技术知识提高创新水平,尤其对潜在全新技术的探索给企业带来突破性发明<sup>[18]</sup>,但新知识在可靠性、利用风险及搜索成本方面不抵旧知识。针对这种争论,学术界从新旧知识平衡利用角度将知识年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推进到非线性领域<sup>[19]</sup>,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前沿知识或成熟知识在企业创新和市场回报中的作用<sup>[7]</sup>。近年来,关于知识年龄影

响搜索绩效的研究争论逐渐减少,其原因可能是该方面研究难以找到新的切入点,以 Jung 等<sup>[3]</sup>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探索知识属性(如知识原创性)对搜索绩效的影响,还有研究尝试探讨知识搜索时间与其他边界模式的多元组合<sup>[20]</sup>。总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新旧知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且以高技术行业(如制药、机器人等)实证研究初步肯定了旧知识和新知识在创新中的非互斥关系,但是以往研究并未探讨不同行业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在搜索新知识或旧知识的动机、强度方面的差异。

### (二)搜索的时序模式

组织知识搜索战略具有时间依赖性,时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搜索活动的重要线索,从时间顺序角度考察知识搜索行动的前后关联性将具有重要意义。时序模式中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要素反映一个组织的搜索与学习状态转换,并使组织可以反思过去的搜索活动和展望未来的搜索行动<sup>[9]</sup>。Gavetti 等<sup>[21]</sup>将企业知识搜索行为划分为前向搜索(Looking forward)与后向搜索(Looking backward)两类,前者基于决策者随时间的经验积累与绩效反馈结果强化过去的决策,后者基于决策者对未来与计划行为可能结果的评估来做出组织行动。前向搜索成功实施的条件是组织能够设定目标与绩效期望引导意见不同的团队,调整当前行为不需参考未来的计划,相反后向搜索中决策者对未来有一幅认知蓝图<sup>[22]</sup>。另外,由于市场中可以获取的新兴技术机会与互补技术知识之间存在时间滞后,这要求企业具备持续搜索的能力<sup>[23]</sup>。结合创新理论,企业对同一或相似创新问题持续关注或周期性搜索该领域知识可被视作连续搜索。但在技术探索与搜寻的过程中,企业也会在探索式学习和开发式学习间不停转换<sup>[24]</sup>,通过这种间断时序搜索模式提升组织的柔性。这种间断时序是一种典型的非连续搜索,当技术进步曲线和技术扩散曲线出现节奏不协调时,不连续搜索与创新的机会就存在。总之,基于过去搜索行动和经验的总结反思,组织对现在和未来的知识搜索决策及方向能够论证更为合理,但关于过去搜索、现在搜索及未来搜索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现有研究并未详细探讨。

### (三)知识年龄与时序模式研究述评

上述对知识年龄及时序模式的研究,基于时间轴的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线索<sup>[12]</sup>,将旧知识、新知识及潜在知识纳入企业知识搜索内容研究中考

虑,并且连续创新和不连续创新理论将企业连续或间断搜索问题推到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前沿。但是,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首先,将知识搜索的年龄与内容相结合的研究相对欠缺,对企业而言新旧程度不同的技术或市场知识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可以将知识搜索的年龄与知识搜索空间相结合,且区分探索本地或远程新旧知识对创新的不同作用机理;最后,关于知识搜索是否连续的研究较少,未来应拓展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如何采取连续性搜索的研究,并探讨间断搜索对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或产生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为此,纳入知识年龄、时序模式及知识搜索的连续性,结合知识搜索内容与搜索空间可以构建知识搜索的时间边界整合模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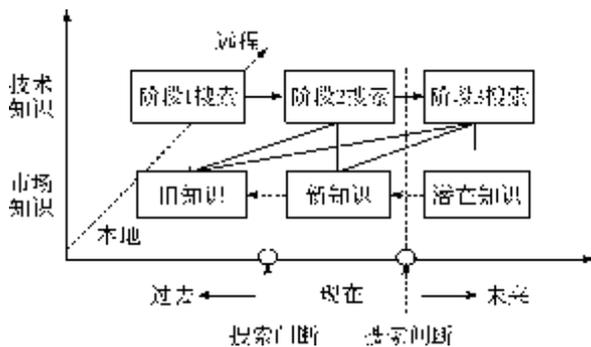


图2 知识搜索的时间边界整合模型

## 二、知识搜索的速度与时机选择

### (一) 知识搜索的速度

虽然以往创新学者假设“知识搜索活动能促进创新结果”<sup>[1]</sup>,但在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毁灭加速交替背景下,外部搜索到的知识也被期望更快速的应用于企业创新中<sup>[8,13]</sup>。目前,学术界基于时间竞争(Time-based competition, TBC)的创新搜索研究中存在两类看似相悖的观点:一类研究从创新先动者优势角度,提倡企业加快产品创新速度或伺机选择新产品上市的时机以获得占领市场先机,并比竞争对手对外部环境做出更快速的反应;另一类研究质疑创新中“快即是好”的观点,管理者追求速度可能会导致对创新过程与时机缺乏理性分析<sup>[4,8]</sup>,此后有研究发现搜索中快学习与慢学习两者需要平衡<sup>[9]</sup>。产生上述悖论的原因可能是搜索速度取决于决策情境是否清晰,在模糊情境下后行动可能比快速搜索收益更多。如 Grimpe 等<sup>[25]</sup>从行业类型角度对企业的知识搜索节奏进行实证,发现中低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在创新搜索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性。从上述研究可知,现有对知识搜索速度的研究主要侧重新产品或市场先机,但知识搜索过程中的知识扫描、获取、整合与应用等环节的速度还缺乏细致探讨。

### (二) 知识搜索的时机

学者们为了从时间维度剖析管理实践者的战略行动,最开始简单地将时间归结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后续更具体地研究时间(时机)与新产品开发或市场进入等组织各类具体行动之间的关系<sup>[4]</sup>。以往知识搜索研究大都遵循一种“由外及内”的观点,重点关注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市场类和技术类知识源,但知识搜索活动可能会受到竞争对手的影响而需要调整目标企业自身的搜索策略<sup>[16]</sup>。有学者强调相对对手的搜索时机造成组织间产品创新的差异<sup>[27]</sup>,并发现竞争对手对焦点企业搜索时机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效果:“排斥效应”和“激化效应”。此后,Chen 等<sup>[28]</sup>少数研究尝试探讨新创企业如何与在位企业竞争,但均未将相对竞争对手的知识搜索时机这一问题进行细化研究。

引入平行搜索视角后,知识搜索活动事实上成为一种学习竞赛过程,在搜索时机选择上存在三种策略:领先竞争对手、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以及跟随竞争对手,并且有研究发现与竞争对手同步搜索并不利于创新,领先搜索有可能发明全新产品和跟随搜索促进研发更多新产品<sup>[27]</sup>。考虑外部环境中的竞争对手行动时机后,有学者指出目标企业知识搜索效果是自身搜索策略与相对竞争对手的搜索时机的函数<sup>[16]</sup>,Boudreau 等<sup>[29]</sup>发现创新问题复杂性和竞争对手增加引发的市场多样性均对知识搜索产生积极影响。搜索时机是知识搜索研究中一个比较新的研究主题,但现有研究仅限于相对对手的搜索时机,但从知识搜索客体看,搜索时机还涉及其他创新问题的解决者(如供应商、顾客等)。上述研究旨在揭示“企业在什么时候做出正确的搜索时机选择”,但以往关于搜索时机的研究并未考虑不同类型企业(如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本地企业与全球企业)的资源禀赋差异性,这可能导致知识搜索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不具有针对性。

### (三) 知识搜索速度时机与时间边界的相互影响

首先,企业搜索新旧知识或搜索的连续性影响搜索速度与时机选择吗?在组织惯例的影响下,企业倾向搜索与现有知识基础相接近的知识,现有知识基础的新颖性与多元性直接影响组织未来的知识搜索策略<sup>[30]</sup>,并且知识搜索与期望绩效比较的反馈

成为管理者搜索速度与时机决策的重要信息源<sup>[31]</sup>。由于新的机会和威胁会根据组织内部和外部动态性发生持续变化,组织也需要持续权衡时间维度上的探索和利用策略,当前绩效结果与绩效预期相匹配时组织延续原有的搜索策略,但是连续搜索在某个阶段如何因产品或企业特征不同而选取不同的搜索时机仍不得而知。

其次,知识搜索速度与时机对搜索新旧知识或搜索连续性策略选择的影响?在搜索时机选择上,企业首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何时开发新产品或采用新技术、如何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次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行业特征选择适宜的知识搜索速度。在搜索时机选择方面,领先搜索有助于企业搜索到更具新颖性的异质性知识,而跟随搜索可能搜索到更多成熟知识<sup>[14]</sup>。如果将竞争对手纳入搜索时机框架,搜索时机选择将为企业从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差距中搜索不连续创新机会。

综上所述,知识搜索随时间或竞争关系的动态变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考虑竞争互动情境下的核心企业知识搜索时机选择(如领先、同步或跟随)的演进规律还有待探索。结合搜索时机对知识时间边界的影响,围绕企业与对手间知识搜索策略的竞争,并考虑过去(现在)的搜索时机选择对现在(未来)的影响。比如,借鉴 Katila 等<sup>[27]</sup>等研究,领先、同步和跟随是根据本企业相对竞争对手在利用、探索和没有搜索这三种平行搜索竞赛策略中的选择加以判定。核心企业知识搜索时机抉择取决于上一阶段竞争对手搜索时机策略选择,并且核心企业与竞争对手当前搜索速度与搜索时机选择影响企业下一阶段的时序模式。

### 三、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与注意力

#### (一)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

管理者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如快慢、紧急)影响企业知识搜索决策,基于特定时间情境的管理者认知构成管理者行动的基础<sup>[4]</sup>。关于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从组织即兴角度考察“即时特征”对知识搜索的影响。知识搜索的时间临近促使组织思考与即兴学习(Improvisational learning),即兴能力要求企业在截止日期之前(Temporal proximity)立即做出知识搜索的决策,通过这种方式将管理经验转化为企业绩效<sup>[9]</sup>。即兴有助于线性时间和周期时间的综合,综合过去的搜索经验与未来的搜索预期制定现在的知识搜索方案<sup>[32]</sup>。当面临

外部短时间内创造满足消费者需求产品的压力,组织通过搜索外部类似解决方案加以应对<sup>[5]</sup>。另一方面,从经验学习角度,探索复杂多变情境下的知识搜索活动。在快速搜索决策前提下,基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可知企业全面掌握与评估外部信息几乎不可能,管理者以“满意原则”作为决策的标准<sup>[33]</sup>,借助不同搜索决策的试错找出较优的搜索策略。还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与知识搜索存在倒U型关系<sup>[34]</sup>,即在一定程度上时间压力有助于知识搜索,但当感知时间压力超越临界点之后会导致管理者认知冲突与效能感下降。在快节奏市场中,行业地位不同的企业(如领先企业或跟随企业)感知时间压力的强度及所处情境不同,未来研究应该探索这些企业在采取搜索行动的时间跨度与速度方面的差异性。

#### (二)知识搜索的高管注意力

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影响知识搜索以及创新绩效,高层注意力的分配对企业知识搜索速度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在高层注意力的时间维度(关注过去、关注现在和关注未来)上,有学者<sup>[35]</sup>发现高层注意力聚焦当前技术或新兴技术将导致企业进入新市场不同的节奏,还有研究证实高层注意力焦点影响组织战略的响应速度<sup>[36]</sup>。基于管理者认知判断,前向搜索反映组织决策者对未来及执行搜索计划后可能结果的评价<sup>[4]</sup>,后向搜索倾向通过渐进式学习和对组织惯例的适应性选择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sup>[21]</sup>。另一方面,关于高层管理注意力的空间维度(关注外部和关注内部),由于“外部焦点”和“内部焦点”相互竞争管理者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内外部注意力配置不同对企业洞察外部机会和传递外部竞争压力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企业知识搜索策略和时机选择的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讨<sup>[13]</sup>。还有研究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发现CEO促进性焦点积极影响探索与开发活动,但是预防焦点不利于探索活动<sup>[37]</sup>。高层管理者或高管团队对前一阶段的知识搜索结果的反馈以及对未来知识搜索目标的预期,均会影响其注意力的分配及对下一阶段的知识搜索决策<sup>[38]</sup>。以往研究将注意力与知识搜索相结合,丰富与扩展了知识搜索理论,但处于行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管理者注意力对知识搜索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 (三)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和高管注意力与知识年龄及搜索时机的影响模型

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组织的资源及

管理者认知存在差异,即是在相似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的知识搜索策略会有不同。企业搜索从客观的“速度”转向主观的“时机”,将管理者对时间的认知导向充分挖掘出来,管理者对时间压力的感知和对稀缺注意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无疑影响对外部新旧知识的搜索。相反,组织的惯例以及响应策略往往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性<sup>[39]</sup>,企业现有的知识结构、所涉及的技术范围以及之前知识搜索行为也会对知识搜索的时间目标或是否持续搜索带来影响。领先对手获取行业内外的新知识对管理者具有时间任务压力,并且新知识相对于旧知识更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故对目标企业的管理注意力分配及认知也会产生一定影响<sup>[40]</sup>。

关于知识搜索时间压力对搜索新旧知识和做出正确的搜索决策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极度竞争压力下的即兴表现对组织的影响是同时存在利弊<sup>[41]</sup>,未来需要探索时间压力和高管注意力对企业知识搜索的作用机制。同时,搜索时机选择也会影响管理者的注意力及感知时间压力,比如在技术革新较快的行业,知识搜索将使管理者面临不同的时间压力<sup>[10]</sup>,因此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资源配置也有

所不同。具体而言,领先搜索决策使得企业管理者关注企业外部及未来绩效,跟随搜索企业更多关注企业内部与当前绩效<sup>[37]</sup>。

为此,基于“管理认知—搜索行为—创新结果”视角,本文构建一个基于时间维度的知识搜索的最新研究模型(图 3)。首先,当前知识搜索研究尚未构建个体(如 CEO 调节焦点类型)、团队(如高管团队注意力和时间压力)、组织(如感知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程度)层面上知识搜索时机前因模型,知识搜索时机与企业搜索的知识年龄之间相互影响,但是搜索时机与知识年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仅受到企业类型与行业特征的调节,还受到企业管理认知层面因素的调节作用<sup>[21]</sup>。其次,在知识搜索的时序模式特征方面,T1 阶段的知识搜索行为通过绩效结果反馈影响 T2 阶段的搜索行为,进而对后续阶段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对这种动态时序影响的关注还不够。最后,知识搜索主观时间维度的研究相对处于起步阶段,管理者主观认知因素对企业搜索的客观知识属性和竞争时机的综合影响模型尚未有研究系统探究,并且复杂关系研究可能还需要综合问卷、案例、仿真等多种方法加以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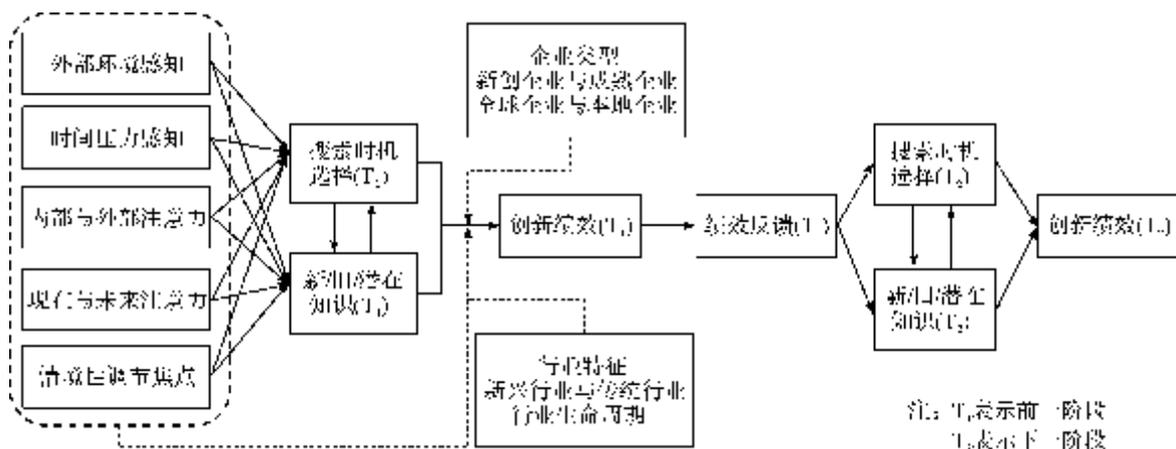


图 3 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一个最新模型

#### 四、结 语

传统知识搜索的研究较多考虑搜索内容与搜索机制<sup>[4]</sup>,但是这二者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极少。演化经济学指明了先前知识搜索的经验或知识存量影响后续搜索模式的选择<sup>[42]</sup>,但是企业知识搜索的内容及路径具有惯性,这种惯例使得企业倾向选择在现有地域或知识基附近搜索旧知识。为了适应环境动态变化,企业应搜索一些突破式创新所需的新知识或潜在知识,然而

知识新旧程度不仅是动态时间轴中的相对位置不同或者对企业而言是否熟悉,而且知识搜索的年龄还取决于企业对知识搜索速度或时机掌控<sup>[27]</sup>。时间除了作为知识搜索的一种客观存在之外,企业决策者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或稀缺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客观反映其应对外部技术机会与市场扰动的能力,企业搜索时机选择及新旧知识搜索取舍对创新绩效均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展开为知识年龄及时序问题、知识搜索速度及时机问题、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等三个方面主题,并探讨

了三者之间围绕时间线索构成的逻辑关系,最终构建一个“管理认知—搜索行动—创新结果”的综合研究模型。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及理论发展动向,未来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第一、知识搜索的时间边界探索。现有研究主要将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等同于知识的新旧程度,探讨不同搜索战略对获取新旧知识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均基于高技术行业(如国外机器人、制药行业等)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大多数传统制造类行业。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基于本土不同行业及企业特征,一方面运用管理问卷及专利数据探索不同搜索速度与时机对其搜索新知识或旧知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创业企业或成熟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采用案例或内容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基于时间维度的知识搜索模式内涵、特征及对创新的影响,并弥补现有专利数据和问卷调查无法较少关注默会知识的不足。

第二、知识搜索的时机选择问题。时基竞争模式下,知识搜索速度备受关注,但是当前关于搜索速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企业相对竞争对手在搜索时机选择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应该结合行业特征和企业特征探讨搜索速度对结果影响的差异性,立足竞争视角综合考虑企业“从哪儿搜索”和“何时搜索”的问题,并借助非合作博弈理论、纵向案例跟踪、时间序列数据等方法揭示企业知识搜索速度或时机选择的演进规律。

第三、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研究。虽然现有研究认识到知识搜索受到管理者对主观时间认知的影响,但是时间压力的性质(如挑战性时间压力与阻碍性时间压力)、感知强度及所处的情境对知识搜索活动的影响机制仍值得探讨。跨越管理者个体、高层团队及组织三个层面对时间的感知、注意力分配等因素影响搜索时机与知识年龄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且时间认知层面的前置因素对搜索行动与创新结果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机制还需细致探究。

第四、知识搜索的时间演化问题。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序要素反映一个组织的搜索与学习状态转换<sup>[12]</sup>,但是现阶段知识搜索行为及绩效结果对企业下阶段知识搜索结果的影响缺乏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构建仿真模型(如系统动力学模型)或纵向时间序列跟踪数据,探索基于上一阶段绩效结果反馈的搜索策略调整过程及不同阶段的

知识搜索策略的动态演化规律。

#### 参考文献:

- [1]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 K. manufactur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 131-150.
- [2] Katila R. New product search over time: Past ideas in their prim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5): 995-1010.
- [3] Jung H J, Lee J J. The quest for originality: A new typology of knowledge search and breakthrough inven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5): 1725-1753.
- [4] 曹瑄玮,唐方成,郎淳刚. 时间战略: 战略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缺失[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1(2): 31-37.
- [5] 芮正云,罗瑾琰. 企业创新搜寻策略的作用机理及其平衡: 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与经验证据[J]. *科学学*, 2016, 34(5): 771-780.
- [6] Nerkar A. Old is gold? The value of temporal explor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J]. *Management Science*, 2003, 49(2): 211-229.
- [7] Heeley M B, Jacobson R. The recency of technological input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7): 723-744.
- [8] 奉小斌. 集群新创企业平行搜索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管理者解释与竞争强度的联合调节效应[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6, 28(4): 11-21.
- [9] Berends H, Antonacopoulou E. Tim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4, 16(3): 437-453.
- [10] Lin C J, Li C R. The effect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o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3, 20(2): 93-113.
- [11] Arrfelt M, Wiseman R M, Hult G T M. Looking backward instead of forward: Aspiration-driven influen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allocation pro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4): 1081-1103.
- [12] Nadkarni S, Chen J H. Bridging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CEO Temporal focu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7(6): 1810-1833.
- [13] 奉小斌,王惠利. 新创企业搜索时机、即兴能力与创新绩效: 管理注意力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 2017,29(4):127-137.
- [14] Jason L Y, Wang Y D, SΦREN S. An inquiry on dimensions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earch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R&D Management*,2014,44(1):53-73.
- [15] Rosenkopf L, Nerkar A. Beyond local search: Boundary-spanning, exploration, and impact in the optical disc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4):287-306.
- [16] 奉小斌. 集群新创企业平行搜索风险的识别、度量与控制:基于 FMEA 原理[J]. *技术经济*,2015,34(4):42-50.
- [17] Miao Y Z, Song J Y. Search behavior and catch-up of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J]. *Seoul Journal of Business*,2014,20(2):71-90.
- [18] Ahuja G, Lampert M C.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ow established firms create breakthrough inventio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6 /7):521-543.
- [19] 李生校. 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技术经济*,2013,10(8):1185-1193.
- [20] Lopez-vega H, Tell L F, Vanhaverbeke W. Where and how to search? Search paths in open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2016,45(1):125-136.
- [21] Gavetti G, Levinthal D. Looking forward and looking backward: Cognitive and experiential search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1):113-137.
- [22] Chen W R. Determinants of firms' backward-and forward-looking R&D search behavior[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8,19(4):609-622.
- [23] 张军, 许庆瑞. 企业知识积累与创新能力演化间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1):128-138.
- [24] Lin H E, McDonough E F, Yang J, et al. Aligning knowledge assets for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and ambidexterity: A study of companies in high-tech parks in China[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7,34(2):122-140.
- [25] Grimpe C, Sofka W. Search pattern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Low-and-high-technology sectors in European countries[J]. *Research Policy*,2009,38(3):495-506.
- [26] Ross J M, Sharapov D. When the leader follows: Avoiding dethronement through imit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3):658-679.
- [27] Katila R, Chen E L. Effects of search timing on innovation; The value of not being in sync with rival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8,53(4):593-625.
- [28] Chen E L, Katila R, Mcdonala R, et al. Life in the fast lan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in new vs. established marke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13):1527-1547.
- [29] Boudreau K J, Lacetera N, Lakhani K. Parallel search, incentives and problem type: Revisiting th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link [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09-041,2008.
- [30] Luo R N, Lui S S, Kim Y. 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earch breadth and firm innovation [J]. *Management Decision*,2017,55(1):2-14.
- [31] Iyer D N, Miller K D. Performance feedback, slack, and the timing of acquisi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8,51(4):808-822.
- [32] Magni M, Maruping L M, Hoegl M, et al. Managing the unexpected across space: Improvisation, dispersion, and performance in NPD tea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3,30(5):1009-1026.
- [33] Siggelkow N, Levinthal D A. Temporarily divide to conquer: Centralized, decentralized, and re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exploration and adapt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6):650-669.
- [34] Yang W, Meyer K E. Competitive dynamic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Competitive pressures, resources, and the speed of ac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5,68(6):1176-1185.
- [35] Eggers J P, Kaplan S. Cognition and renewal: Comparing CEO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s on incumbent adaptation to technical change[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9,20(2):461-477.
- [36] Nadkarni S, Barr P S. Environmental context,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strategic action: An integrated view[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13):1395-1427.
- [37] Kammerlander N, Burger D, Fust A, et 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establish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effect of CEOs' regulatory focu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5,30(4):582-602.
- [38] Salge T O. The temporal trajectories of innovative search: Insights from public hospital services [J]. *Research Policy*,2012,41(4):720-733.
- [39] Nelson R R, Winter S 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25-31.
- [40] Li Q, Maggitti P G, Smith K G, et al. Top management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The role of search selection and intensity in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J]. *Academy of*

-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3): 893-916.
- [41] Crossan M, Cunha M P, Vera D. Time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1): 129-145.
- [42] Tippmann E, Scott P S, Mmangematin V. Problem solving in MNCs: How local and global solutions are (and are not) creat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8): 746-771.

## Research review on tim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search

YU Bin, FENG Xiao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ime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knowledge search strategy.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related to the tim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questions: “what to search”, “when to search” and “how to search”. The knowledge age and sequence, the speed and timing of knowledge search, and temporal cognitive decision of knowledge search ar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On this basis, internal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subject areas is discussed. Finally, four frontier issues about the tim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search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emporal boundaries, search timing selection, temporal cogni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search; time dimension; knowledge age; search timing; time pressure

(责任编辑: 钱一鹤)

## 近代上海钱庄的信用危机管理(1843—1949)

刘梅英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杭州 310018)

**摘要:**近代上海钱庄的发展经历了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作为金融中介机构,钱庄在自我发展与政府控制的两个阶段,主要面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与国家风险等几种信用危机的考验。为了化解各种危机,钱庄积极发挥自身信用风险控制优势和行业协会的同业监管优势进行管理;而政府以牺牲钱业利益为代价维护金融环境稳定的做法则使钱庄陷入前所未有的国家信用危机包围之中。钱庄在成长中积累的应对来自市场、同业、政府各种危机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将给当今金融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信用风险;内部控制;同业公会;政府

**中图分类号:** F8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19-09

近代上海钱庄作为从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经历了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并向中国推进的过程,历经近代中国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的历史。具体来看,1843—1927年是上海钱庄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开埠通商以来,外国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以后,借力钱庄熟悉市场、掌握较多信息、庄票流通广泛、通晓商业习惯等优势,使用钱庄庄票,拆借钱款给予钱庄贷放市场,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之后,华资银行落地生根,同样借助钱庄的优势,凭借同业拆借关系获得共同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政府或者支持、或者无力管控金融业。这给了钱庄繁荣发展的空间,使其成长为多功能的金融实体,一度与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三足并立。1927—1949年是上海钱庄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公债政策、法律制度、货币改革和监管政策全方位管制钱庄发展,致使其生存空间受到最大程度地挤压,从而全面走向衰落。上海钱庄尽管不断探索革新之路,以适应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但由于近代国民经济整体破产而最终走向被改造之路。

钱庄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发挥信用中介、支付

中介、信用创造、金融服务的作用同时,难以避免遭遇各种信用风险乃至危机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加深侵略、晚清民国政府不断更迭的政局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扩大干预金融,致使上海钱庄既有可能面临系统性信用风险危机——如经济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信用危机——的考验,又有可能随时面临与金融行业密切相关的非系统性信用危机的影响。从信用危机产生的不同趋动因素来看,主要影响钱庄发展的是以下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国家风险、等等。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外学界较多地考察了并认同政府政策对钱庄迅速衰落的影响<sup>[1]</sup>,而对于钱庄的其它风险危机类型及其表现较少全面论及。关于风险危机的管理,刘梅英<sup>[2]</sup>从钱庄内部控制,同业公会对钱庄进入退出和业务管理,政府法律对钱庄约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考察。杜恂诚等<sup>[3]</sup>从不同侧面证实钱业公会在钱庄危机管理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对钱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危机类型,以及钱庄如何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危机管理尚未有全面、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在此方面尝试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能够总结经验,服务金融改革的现实。

收稿日期:2017-09-30 网络出版日期:2018-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S047);浙江省教育厅师资发展项目(FX2012010);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培养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基地项目(2015YJYB07)

作者简介:刘梅英(1973年—),女,河北邢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 一、流动性风险危机及管理

### (一)流动性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流动性风险是指钱庄无力为负债减少或资产增加提供融资的风险,即用于即时支付的流动资产不足而丧失清偿能力的风险。当流动性不足时,钱庄无法以合理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盈利水平。实行独资或合伙为主的上海钱庄自有资本较少。其近代获得发展的新契机是外资和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拆借款项给钱庄进行各种金融业务,但也会因拆款随时被抽走而发生流动性风险。这是整个近代上海钱庄随时面临的最大的信用风险和危机之一。

上海钱庄自有资本白银多者几万两,少者仅几千两,存款额和贷放额往往是自有资本的几十倍甚至更高,这就必然产生流动性风险。钱庄融资的渠道一般是向熟人送折的方式存入款项,通过同业拆借借入款项贷放给熟悉的工商业者。外资入驻上海以来,钱庄通过买办居间向外资银行拆款,通过熟人向票号拆款,然后转贷出去,通过利差获益。如1878年,上海钱庄从外资银行和票号的拆票总额为300万余两,到19世纪末则超出了1000万两,在20世纪初,一些大钱庄每家拆进高达七八十万两。19世纪末以来,华资银行日益繁盛,又成为钱庄拆进款项的主要来源。据测算,1912至1935年,华资银行通过上海钱庄投放到国内工商业的资金总额高达3000~4000万元。<sup>[4]</sup>

巨量拆借款项便利了钱庄满足资方的流动性,但拆款贷放又扩大了负债方流动性风险。钱庄负债主要是熟人和关系户工商业存款,且不太注重吸收存款,而过分倚重拆款容易受制于人,从而造成钱庄流动性风险大大增加。如1911年10月社会动荡造成钱业危机,并使外资债权银行受到连累,其中6家大钱庄欠8家外国银行的拆票182万两无法偿还。到10月下旬,未偿还的拆票达到880万两。<sup>[5]61-90</sup> 买办许杏泉通过礼拜票拆款方式,把二十几万两拆给许家四大钱庄,收取短期拆息,结果四大钱庄遇到风险倒闭。外商银行公会质疑这次拆款的正当性,提出要由保人大丰号经理邵琴涛赔偿。<sup>[6]</sup> 辛亥危机以后,外资银行提出向钱庄进行抵押拆款,但双方在共同利益驱使下拆款交易一直都在进行着,如1924年,外资银行对上海钱庄拆款额又高达千万两之多。外资银行向钱庄拆款,在解决负债流动性时,钱庄的生死大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手中。外资银行一旦抽走

拆款,容易引起钱庄的挤提和歇业风险。如有记载称,辛亥革命前,叶澄衷所开的“各钱庄倒闭时亏欠银行拆票约200余万两,至今未理,银行遂停止拆票。之后数年间无银拆市面”。<sup>[5]61</sup> 辛亥革命后,银根奇紧,钱庄有多家倒闭清理。流动性风险随时可能会给上海钱庄的经营带来不稳定性。

### (二)流动性信用危机管理

#### 1. 应对流动性信用风险危机的资本金制度

钱庄股东自有资本数额不大,难以应对流动性风险危机。辛亥以来,钱庄“不能不赖固有之资本及仅少之存款为财源流通,资金异常缺乏。金融市面固未尝不可以此渐臻稳静,惟以小资本而营大交易之一庄,恐渐觉活动之难矣”。<sup>[5]61</sup> 各钱庄为增强实力,均通过建立正、附本<sup>①</sup>和内盘<sup>②</sup>制度来稳固资本基础。当正、附本不足时,钱庄将主要靠无限责任股东随时垫付款项应对风险。钱庄还通过内盘来提高本钱庄股东信誉。<sup>[7]106-111</sup> 股东之间订立合同彼此约束,邀请业界有声望者做“保人”聘用经理,以应付各种信用危险。根据钱业习惯,如果新钱庄要进行长期放款,其资本不敷分配时,则由保人尽力帮忙,代为垫付。

#### 2. 通过建立联号制度确保资本的流动性

联号指钱庄投资于多种事业或同种事业而开设的数家分店。各分店会计完全独立,业务上互为联络,在营业上互通有无。镇海叶氏在全国拥有103家钱庄和票号,还通过子女联姻,与宁波许春荣合资开设“四大”联号钱庄;镇海方家在上海开设联号钱庄共计17家之多,寿康钱庄经理屠云峰坚持稳健经营,常年是多单。如各联号庄遇有缺单,也多由寿康带头供给调剂,成为各联庄的总号。<sup>③</sup> 各联号钱庄之间通过头寸拆借和同业借贷两种方式互通有无,还代收各自的庄票,通过互轧平账<sup>④</sup>进行清算。联号业务往来有效解决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 3. 通过发行庄票,建立票据清算制度和现金储备制度增加资本流动性

钱庄借助发行庄票的优势代为外资和华资银行

① 正本是钱庄股东投入的资本金,是议单(合同)上订定的资本。正本既有股息,又有盈余分红。附本即护本,是由股东缴入作为定期存款另行存入钱庄并收取一定利息的股本。附本一般不准随意动用,只有钱庄不敷周转时才可启用。钱庄根据附本,年末结账时给股东一定的息金。

② 内盘是钱庄向其它钱庄存入的定期存款。

③ 做多单、缺单,是金融术语,如果看好未来价格上涨前景投资而买入就是做多单,缺单就是预测未来投资价格下跌,则通过更低价格买入就是多缺单。

④ 轧平账是指会计上账务支出和进账之间平账。

进行票据清算。在进口贸易中,华商使用钱庄庄票付款给外商进口货物,外商凭庄票到外资银行结算。外资银行把收到的外汇汇票折合成上海规元<sup>①</sup>与所收庄票相抵,完成进口结算;出口时,华商利用外资银行开给外商的支票到钱庄兑现,钱庄通过外资银行进行支票结算和票据互轧。庄票便利了钱庄与外资银行的业务联系,解决了资本的流动问题。为便利同业划账,1890年,上海钱业公会通过汇划总会使用“公单”<sup>②</sup>,进行业内和华资银行500两以上收解轧帐和清算。为此,华资银行须向钱庄预存巨款。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项汇划存款的总额约有7000~8000万两。<sup>[8]</sup>银行存款推动了钱业的兴旺发达。

票现基金制度则是为解决500两以下现银收解问题确立的制度。1925年,钱业公会成立了票现基金委员会,要求各庄交纳基金和银找基金。借以维持“金融稳定”。<sup>[5]</sup><sup>[531]</sup>1932年10月1日,钱业公会又成立了“钱庄的钱庄”——联合准备库。联合准备库成立财产保管委员会,登记、保管财产多缺状况;要求钱庄各自开设往来账户,缴存30万元以上的现金,并以缴纳立时变化的货物栈单、有估价的房产契据和现金条作担保等,用以抵御各种风险。钱业准备库“对内谋基础之巩固,对外则充实其力量为钱业之总枢”。一旦遇到金融恐慌,准备库调剂盈虚,使“人心于以安谧,金融赖以稳定数载以来成效显著”。<sup>[9]</sup>钱业联合准备库集中同业存款抵抵御风险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钱业的流动性危机。

## 二、信用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 (一)信用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信用风险是指上海钱庄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上海钱庄开展金融服务时,过分倚重当事人的声誉、信用和影响力的做法会使钱庄遭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危机的影响。加上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随时发生,信用危机无时不在。1927年前,上海钱庄与金融各业、工商各业联系密切,在双方遵守信用前提下通常不会出现信用风险。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则会产生各种信用危机;1927年以来,政府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又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因而信用风险贯穿钱庄发展始终的主要风险危机之一。

近代比较重大的信用风险事件包括1883年的倒账风潮、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和1920年的信交风潮。倒账风潮是由于工商各业经营失败导致钱庄贷出的款项无法按期收付,而导致大批钱庄破产

倒闭的风潮。1883年,金嘉记丝栈经营失败倒闭。这致使其从40家钱庄借贷款项高达56万两无法偿还。各钱庄为避免遭受更大牵连纷纷紧缩贷款,收回旧贷,停放新贷,结果使更多商户倒闭。接着,胡光墉囤积生丝投资生意失败导致自己的阜康雪记钱庄倒闭。有业务联系的外资银行、票号纷纷抽回借给钱庄的拆款,致使钱庄的大面积歇业。信用危机从丝绸业扩展至地产各业。当年,徐润经营地产拖欠22家钱庄250余万两无法偿还而使这些钱庄受到牵连,上海金融危机向全国扩展。1910年,中国橡胶股价暴跌导致“橡胶股票风潮”的发生。橡胶公司纷纷成立时,股价不断飙升。这引发大批钱庄加大信用放款力度,并接受股票质押,或大发庄票,间接参与炒股。在股价大跌、股市全面崩溃时,钱庄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从而引发更加严峻的信用危机的产生。另一个案例是信交风潮。1920年7月,虞洽卿创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开始了创办交易所的新时期。1921年,上海开设的交易所共达112家、信托公司12家,涉及的资本总额不下2亿元。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从商业行庄借贷进行股票交易投机。随着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纷纷倒闭,钱庄投机事业失败,其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64号经纪人,松泰、兆丰号主贾荫希倒欠益慎、生大等7家钱庄共计规元7万数千两之多”使钱庄大面种受到影响。<sup>[10]</sup>沙逊洋行买办程谨轩自己广置地产,其子程霖生、孙子程贻泽投资衡余、衡昌等6家钱庄为地产业融资,但这些钱庄未能幸免经营房地产失败而歇业的悲剧。钱业公会理事长秦润卿通过自己开设的四恒钱庄对程氏放款白银86.6万两也因程氏经营失败而发生倒账。在1931年负债清理账目中,程氏以房地产抵押的负债计规银1438万两,信用借款负债达631万两,合计达规银2069万两之巨,信用借款绝大多数来自银钱业。<sup>[11]</sup>这些案例说明,上海钱庄的信用贷放会受到工商各业流动风险危机的牵连,严重者会引发钱庄大批倒闭歇业。

### (二)信用风险危机管理

1. 通过合伙筹资,并以股东个人资产担保有效降低自身信用风险

多数合伙制钱庄股东按出资比例获取利益,承

<sup>①</sup> 上海规元是从1856年始通行于上海的一种作为记账单位的虚银名目,又称九八规元,是以元宝(实银)的重量,加以升水,再以九八除之,得之数即为上海通用的标准银(虚银)。

<sup>②</sup> 公单指上海钱庄在票据清算过程中用以划抵款项的凭单。

担风险,担负无限责任。无限责任制度是钱庄降低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之一。当钱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时,股东会按出资比例调动家产资金予以垫付。钱庄清理时,股东也同样会填补资产和负债的缺口。如程氏由于投资地产失败而致自家钱庄歇业后,为了清偿债务,钱庄“将程氏地产核实估计值银 2680 余万两,照市价以 8 折计,约有 2100 万两”,用以完成无限责任清偿,避免了更大的危机。<sup>[12]34-40</sup>钱庄通过无限责任制度有效抑制了行业内更大的风险出现,也使股东能够在筹资过程中权衡自身和合伙股东的实力,以求稳健经营,防止和杜绝各种信用危机。

## 2. 通过拓展关系网络,强化信用边界降低工商业各业的信用风险

上海钱庄与工商各业的信用交易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在熟人社会里,关系放款的达成和履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其制约力非常强。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道德约束机制,使任何一个交易对象如果发生违约,将付出比预期收益更大的成本。一方面,工商业和钱庄大多互相投资,要么工商业主就是钱庄股东或经理,要么钱庄多向自己熟悉的工商业关系户放款;另一方面,为避免信用风险,钱庄依照惯例,会事前通过“跑街”了解工商业者的经营状况,通过向来往工商户送折子,凭折加盖私人印鉴来办理各种业务。如有账目差额,钱庄则通过工商业者存款、票据保管等业务作抵平账。若与中外银行进行拆借,钱庄一方面通过关系网络如钱庄投资者进入外资银行当买办,或买办投资钱庄,或钱庄业经理兼做华资银行经理等形式构建稳固的关系;另一方面钱庄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与银行合作,如代办票据业务、代理中外银行推广钞票、领用华资银行兑换券、共组银团联合放款等方式达到互为控制、互为约束的目的。

## 3. 通过钱业公会,规范约束钱庄并协助追讨失信工商业者

一是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对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达到维护机构信用的目的。钱庄通过激励机制如红利制度、宕账制度,督促经理为钱庄整体利益考虑;也通过设置督理和年终结账制度决定是否继续聘用经理,使经理全力负责钱庄各种倒账事宜。<sup>[7]107-111</sup>为约束经理权力过大,1917年2月,钱业公会规定:如果经理造成呆账数目过高,则禁止该经理从事钱庄业。钱业公会还提出防范同业风险五项办法,明确禁止经理参与投机,要以身作则,存放款项须通盘计划,不准迁就滥放。<sup>[12]34-40</sup>

二是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遵守行业规程加强监管。钱业公会对于新成立的会员钱庄或“未入园”<sup>①</sup>的上海钱庄要求实行报告注册制,这些钱庄需要向钱业公会报告、注册。新成立的汇划钱庄,须要通过集股、请保证人、签订合同、报告钱业公会的4个程序才能入会。召集会员表决,需有出席会议 2/3 赞成方为合格。<sup>[13]</sup>《1923年钱业公会章程》又详细规定了入会程序:要求“开业前一个月,将资本总额、股东姓名、住址及所占股份,并经理人及合股时之保证人开单报告公会,召集会员投子表决,得投 2/3 会员通过,方认为加入同业,在会注册。”<sup>[5]662</sup>20世纪20年代后,入会程序既要详细报告,又要通过会员代表大会(后是先董事表决,后会员大会表决2道程序)的表决通过才算是会员。政府加强控制以后,钱业公会先要遵守政府文件要求,再要向政府呈准注册等,加强入会控制,这对风险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

三是上海钱庄既受钱业公会的违规惩罚机制限制,又受公会协助同业追讨欠款的信用保护。如果业内发生倒账,同业公会为维护行业信用,将会在同业中披露违规成员信息,处以罚金,取消钱行牌照资格;或者开除会员资格;严重者永远驱逐失信钱庄经理和股东。<sup>[14]</sup>如有工商业者发生倒账,则向全体同业宣布倒账事件,使同业无一机构再次向该倒账工商者业进行贷款,起到集体惩戒作用。但这种制约机制有一定的边界和临界点,一旦超出临界点,信用放款等软约束仍无法避免违约现象发生。假如受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钱庄的追账和集体惩戒难以起到约束作用。所以有评价称:“钱庄利益稳厚,经理多精明干练,些微利益,鲜有漏算,其唯一风险,只有倒账而已。倒账大都由于信用放款,危险殊难推测。”<sup>[15]</sup>对于本地的欠款,钱业公会一般会直接找到欠款者索欠;对于外地的欠款,则一般是通过上海商会与外地商会联合协助和督促,或取得当地钱业公会的支持和配合,向逃债人追讨欠款。<sup>[16]</sup>

## 三、竞争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 (一)竞争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竞争风险危机是指金融界同业竞争造成机构安全经营的可能性。近代上海钱庄既面临钱庄同业之间的竞争,又面临中外银行的竞争。自外资银行入驻上海以来,钱庄多过分依赖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

<sup>①</sup> 上海钱庄分为几类,实力最大者称为汇划钱庄,或入园钱庄;实力较小者称为未入园钱庄,未入园钱庄又分为元、亨、利、贞四级。

拆借款项,但是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往往会从合作转向竞争。20世纪20年代之后,华资银行整体实力壮大,开始与上海钱业竞争,从而发生相对严重的竞争性风险和危机。

钱庄早期主要通过与外资银行和票号的合作开展业务。“外资银行服务外商,票号服务于大商人汇兑和政府,资本有剩余,而钱庄由于规模较小,信誉不太高,吸收存款有限,但却又服务于整个中小商人……资金不足,只好依赖票号和外国银行的支持”。<sup>[17]</sup>外资银行接受钱庄庄票是二者合作主要原因之一。但1900年,钱庄推出的当日划账、隔日提现的汇划制度引起外资银行强烈不满,多次发起拒收庄票行动。1903年,外资银行又一次反对庄票隔日付现。1910年的上海橡胶股票风潮发生时,外资银行又提出拒收10日庄票,并试图修改钱业惯例,引起钱庄和商界群起抵制。1927年,国民政府为抵制日货,禁止现银出口。但外资银行却集中现银抢运国外,并决定从1927年8月1日起,要求商家出货一律不收远期庄票。在华商强力反对下,以外商接受70余家信用卓著的汇划钱庄庄票而告结束。<sup>[2]</sup>

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的业务竞争逐渐加剧。在存款业务上,随着银行竞争加剧,钱庄信用存款业务难以满足工商业放款需求,须要通过各种形式吸收更多的存款。这对银行占优势的存款业务提出直接挑战。在放款业务上,随着市场风险的扩大,钱庄的信用放款逐渐向抵押放款转变。而银行不仅遵循商业传统适度开展信用放款,还扩大抵押放款。双方放款业务方面均竞争加剧。工业发展扩大了融资,融资需求推动了银行发展,而钱庄因资力制约无法满足工业放款的数量。钱庄与商业的密切联系使商业放款占据相对优势,主要是因为商业放款单笔数额不大,使用期限较短,商家抵押品较少。在汇兑业务上,华资银行分支机构多和资金雄厚的优势成为取代钱庄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钱庄的申汇市场逐步被银行押汇业务所取代。1933年,银行业票据交换所的成立严重冲击了钱业汇划制度和票据清算业务。1935年金融风潮后,钱业联合准备库加入银行业票据交换所,迫使钱业向银行业交存的款项大大增加了。

## (二) 竞争风险危机管理

### 1. 锐意改革以图增强行业竞争力

一是不断扩大和改革经营范围。随着外资银行的控制和华资银行实力的增长,上海钱庄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发生改变。“废两改元”政策使钱庄银两

兑换业务顷刻间失去了市场。钱庄的存放款业务成为主要业务,上海钱庄增设储蓄存款、抵押放款、工厂放款等业务项目,兼营地产信托业务,推广使用承兑汇票,力求扩大经营。在存款方面,钱庄不仅扩大存款来源,还在存放款方式和利率等方面进行改革。在继续熟人存款方式之外,也广开门路扩大存款渠道。在放款上,钱庄既发挥信用放款的优势,又有意限制信用放款比例,扩大抵押放款规模,尤其是对工业的抵押放款。其中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经理的福源钱庄发展良好,其刚成立的前三年的放款全部是信用放款。从1900年开始,福康钱庄对丝茧、花纱布、房地产业等开始进行抵押贷款,当年抵押放款比重就占43.8%,1903—1904年两年抵押放款超过了信用放款,1927年抵押放款比重达到70%。<sup>[5]779-780</sup>钱庄还增加各种中间业务,如保管贵重物品,代客买卖有价证券等,以增加钱庄利润空间。到1936年时,仿效银行开展业务的钱庄已占上海钱庄总数的2/3以上。

二是钱庄努力改变组织形式,积极增资扩股。1933年3月以后,为贯彻执行“废两改元”政策,上海钱庄原以银两为单位的注册资本均改为以银元为单位重新进行注册登记,不少钱庄趁机增资扩股,以图增强自身资本实力。<sup>[18]</sup>有些钱庄尝试改组为银行,如正明银行由益丰钱庄改组而成,上海浦东商业银行在钱业巨子裴云卿支持下成立,福源钱庄曾改为豫源商业银行,等等。

### 2. 通过钱业公会调整营业规则,联合同行应对银行业的竞争

面对外资银行拒用庄票的行为,钱庄为维护行业利益,联合同业成员积极斗争,并借助上海商会的力量进行调停。如在橡胶风潮中,在上海商会调停之下,外国银行团不得不答应推迟1个月(实际上是无限期的推延)缩短庄票的期限。为提升钱庄同业抵押放款力度,钱业公会直接出面限制信用放款。1935年,钱业公会决定对于采办洋货的商号,尤其是以销售奢侈品的商号,不给予信用借款;在市场未复常态以前,各钱庄营业应采取慎重态度,对于业务的信用借款没有限制的情况,应更加谨慎,以能保存实力。面临被挤出的票据清算业务,钱业公会带头改变策略,积极利用上海票据交换所为本业服务。钱业公会代表会员钱庄接受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全权管理,并督促各个钱庄将各银行现存的各钱庄的汇划款项一律转存钱业联合准备库,并正式加入上海票据交换所,密切了钱庄与银行的联系。上海钱庄

锐意改革的作法,有效抵御了各种竞争风险的发生。

#### 四、投资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 (一)投资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投资风险危机是指钱庄在买卖动产、不动产及证券时,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以盈利为第一目的钱庄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各种动产及不动产的投资和投机经营,因而时常面临投资风险危机的考验。

上海钱庄把从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拆借来的款项大量投向工商业。同时,为扩大利润回报率,钱庄展开了对房地产和股票公债的投资活动。如1932年前,福源钱庄的投资为以公债为主,1932年后,则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公债的比重下降;1934年福源钱庄经营的房地产比重高达81%,1936年三者比重约为4:2:1,1945年三者比重为6:9:1。<sup>[5]809</sup>20世纪30年代以来,钱业出身的孙衡甫和常熟人孙直斋独资或者合资开设惠丰钱庄、荣康钱庄、惠昌钱庄以便更好为地产进行融资等。<sup>[5]768-769</sup>

上海钱庄对地产的投资热情随着上海地价的不断升值而愈加高涨。这种现象先后引发了19世纪80年代钱庄投资者徐润地产经营的惨败,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程氏房产停业清理。外商开辟的租界带动上海地价猛增,房地产投资与日俱增。外资买办徐润投资钱庄,并较早涉猎房地产业。他大量从外资银行和钱庄借款,最终在1883年金融风潮中遭遇惨败。徐润负债金额中,欠22家钱庄105万两,股票抵押借款42万两,洋行房产找头抵款72万两,各存户款33万两,总计252万两。<sup>[19]</sup>20世纪20年代,地产大亨程氏家族的多家钱庄利用程氏在沪的声望和房地产的厚实基础大量投资地产,并为地产融资,最终发生资不抵债,致使钱庄倒闭。在20世纪20—30年代,鼎牲钱庄存款数额为150万元,放出账款中地产押款占60%,信用放款占40%,但受到地产呆滞及信用放款愈期的影响而停业。<sup>[20]</sup>大量的地产投资及倒欠危机冲击钱庄,从而引发各种投资风险,严重者引发金融危机。

上海钱庄还积极投资股票和债券。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钱庄受辛亥革命风潮影响,投资橡胶股票引发倒闭及行业的歇业风潮即是明证。英商麦兰格志拓植公司发售的橡胶股票推高橡胶价格、推高股价。钱庄不仅向投机商人提供短期信用贷款,还大量购存投资股票。如新旗昌洋行买办、上海正

元钱庄主要股东的陈逸卿,调动与自己有往来钱庄的信用,又向外资银行拆借款项,借用川汉铁路公司总收入施典章存放公款……发动正元、谦余、兆康等十余家钱庄购存巨额股票。到1910年7月,外商失联致使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半年时间,十股橡胶股票价格从70两跌至7两,引发正元、谦余、兆康等数家钱庄倒闭,亏损公私款项达数百万两。其它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不计其数。橡胶风潮引起上海金融和商业系统巨大震动。

##### (二)投资风险危机的管理

1. 借助同业与交易方的关系信用和政府与商会的协调,避免更大危机

1883年金融风潮发生后,为了使徐润及时清还钱庄信贷,22家钱庄联合起来共同向其施加压力,集体紧缩贷款。徐润为了维护在行业界内的声誉,不得不低价抛售大量地产和卖出大量股票。面对橡胶股票风潮,上海钱庄纷纷求助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会长周金箴,后由政府出面担保,汇丰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钱庄借出350万两,钱庄押债票给银行,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担保,这样橡胶股票风潮才暂告一段落。但扣除所欠外资银行款项后,钱庄将其余借款存入源丰润票号和义善源银号。而依赖沪关库款和维持市面的借款开展业务的双方借款一旦被政府抽走,即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导致三个月后中国最大票号源丰润倒闭,牵涉倒闭的分号17家。1911年3月,义善源银号倒闭,累及分号23家。面对钱业危机,上海商务总会会同钱业公会请求中、交两行筹借500万两出面救市,向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并与外国银团交涉,阻止其停兑长期庄票,以缓和金融危机。<sup>[21]</sup>上海钱庄遭遇危机,最终尚需金融各业相互支持,共渡难关。

##### 2. 通过同业公会加强钱业管控严禁投机

信交风潮时,上海钱业公会召开会议明确要求同业不准组织交易所。经会长秦润卿提议,同业公决对内力劝同业:一勿贪图近利,二勿做股票押款;对外电部纠正各交易所股票投机。<sup>[22]</sup>钱业公会联合银行公会向北京政府发函,请求政府出面纠正不良风气,维护金融秩序;并通过上海总商会电请北京币制局停止铸造银元,以避免市面流通急需的白银流出上海。为防止同业卷入投机事业,1921年钱业公会连续召集钱庄经理会议,决定慎签银票,签字须由正副经理同时签字,或由经理选派监察常驻账房进行监视,防范风险随时发生。1924年,上海、北京等地公债交易价格暴跌,加上江浙战争一触即发,这导

致洋厘银拆<sup>①</sup>走高,从而引发一批钱庄倒闭。永春钱庄因投机亏损 10 万余两而倒闭,裕丰汇划庄、隆裕钱庄和庆丰钱庄相继卷入危机。钱业公会在《钱业月报》登载,推进裕丰钱庄的破产清理,决定“控制各钱庄的银款进出额度,以减少当时钱业的紧急情况”,要求同业通力合作,共渡难关。<sup>[23]</sup>为防止钱业过度负债加大投机风险,钱业公会要求废除拆票。秦润卿认为:“似应将拆票设法废除”,并决定:“函知洋银行公会请为注意,一面将去函分登西文各报,并于常会时提出追认。”<sup>[24]</sup>1925 年钱业公会再次讨论“银行拆票”问题,“务祈同业格外注意,同业幸甚,大局幸甚。”<sup>[25]</sup>但长期以来钱庄倚重拆票,所以只能强调钱庄尽量做“多单”,而不是缺单。

## 五、国家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 (一) 国家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国家风险危机是指因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政策变化及国家信用风险的存在造成的潜在金融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危机会对整个金融市场未来收益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政治环境变化、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转变对钱庄的影响,包括政府摊派公债承购对钱庄利润的影响等。晚清历次政治危机,尤其民国建立、北京政府政权频繁轮换,政府在金融法律法规上较少建树,但为财政需要而通过内外公债发行的行加强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钱庄受制于推陈出新的金融法律和政策,严重约束了业务经营空间。而政府公债摊派以及延迟还本付息的作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引发了钱庄面临的国家信用风险。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针对钱庄出台的法律法规直接剥夺了钱庄的合法生存空间。<sup>[26]</sup>

辛亥革命及新旧政权更替引起大批钱庄倒闭,而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的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又推动了钱庄的发展。但在 1927—1937 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的摊派公债政策,1931《银行法》的颁布、1933 年废两改元政策以及 1935 年的法币政策对钱庄生存造成了沉重打击。<sup>[27]</sup>1927 年 5 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及其下设的附属机构金融监理局,监理全国关于金融行政上的一切事宜,加强对钱庄的组织控制力度。1935 年 7 月,财政部设置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检查各钱庄账目,审核账表及押品,加强控制钱庄。抗战后期,英美等各国银行被日本接收导致上海游资泛滥。日据时期,钱庄投机盛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承认日伪金融机构的合法性而要求关闭伪钱庄重新登记等,从而使一

批钱庄再次遭受政局变动影响。1947 年,国民政府不仅颁布新《银行法》、《缴存存款准备金实施办法》加强法律规范,还规定票据制度和金圆券币制改革等,成立钱业全国联合会,直接逼迫钱庄走上破产倒闭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强行要求上海钱庄参与临时垫借款项和公债摊派开启了钱业通过垫款和购买公债转接国家信用风险的历史。1927 年,钱业公会决定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临时垫借款项各 100 万元(银行业各 200 万元),同意认购“二五库券”。之后南京政府不断要求垫款和发行债券借款。<sup>[28]</sup>国民政府还开出优厚的折扣条件吸引银钱业投资,致使钱庄负担沉重。钱庄因政府违约或延期还本付息而背上巨大的国家信用风险。1927 年以来,南京国民政府 5 年内共发行公债额达 10.58 亿元,实际公债只有面额的 53.5%。1931 年发行的公债延期还本付息,1932 年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债券。1933—1935 年 3 年内共发行债券 57800 万元。1936 年政府又一次对公债延期还本付息,发行“统一公债”,取代一切旧债。为了减少开支,国民政府以降低公债年息的办法进行支付,而使钱业蒙受重大损失。1927—1935 年间,上海钱业公会认购公债达 265 万元,押借公债款项达 2697.5 万元,共计押借承购公债达 2963 万元之多。<sup>[5]207-209</sup>面对各种国家政策和信用风险,钱庄不仅失去特色业务优势,还要承担国家转嫁的风险危机。

### (二) 国家风险危机的管理

1. 充分发挥钱业公会作用展开与政府的谈判和较量

以《银行法》颁布为例,1931 年的《银行法》明确规定钱庄设立运营资本额最低额、银行的职能和运作程序,这与钱庄长期以来形成的经营惯例相违背。上海钱庄实行合伙制的筹资形式,资本少、规模小,以人际信用为主开展业务,通过钱业公会的习惯法规运作,重信用而轻抵押,重合伙而轻股权,重惯例而轻法律。面对《银行法》的新规定,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呈请中央各部,历陈要求钱庄以抵押放款为主、将财产证明书呈报官厅审核、实行公司组织等规定不合时宜,强烈要求另订《钱庄法》,最终结果使《银行法》没有被全面推行,但是相关规则多数被

<sup>①</sup> 洋厘是用银两表示的银元的市价(每银元一元折合银两七钱二分二厘半,即洋 7.225 钱)。银拆是以银两表示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

实践。<sup>[29]</sup>到1947年新《银行法》推出时,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多次征求钱庄业的意见,进行多次修订,设计了符合钱庄业特色的法律条文。但即便这样,钱庄也已完全被控制在政府的监管之下。

## 2. 通过钱业公会联合银行同业公会共同应对国家信用风险

从政府要求钱庄垫付和承购押借款项来看,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与上海钱业公会讨价还价,要求其充足购买“二五库券”,钱庄和银行的同业公会多次召开同业会议和两业联席会议,商讨解决办法。1932年,面对政府公债延期减少止付的情形,上海钱业公会联合银行公会,一方面采取紧缩政策,严格限制押放;另一方面由各业团体联合反对政府延期支付方案,并联名致电平津汉杭等地银钱业公会,提出严肃抗议,最后妥协答应筹款,协助渡过难关。<sup>[30]</sup>但洋厘暴涨引发恐慌,钱业公会分头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请求支援,各行抛售现银数百万元,洋厘市价才恢复正常。

总体而言,无论面对南京政府的法律法规的推行,还是货币金融政策的落实,又或者是承购押借债券,上海钱庄都会从行业利益出发进行权衡和周旋。最终在钱业公会与政府的较量中,多数钱庄选择妥协让步,很多风险直接转嫁到银钱业身上。钱庄面临的国家信用危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面对顺应时代要求的法律和政策,钱庄多会适时调整和改革;需要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时,钱庄与政府也会联合起来积极应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作。

## 六、结 语

近代上海钱庄发挥着强大的多元化金融功能,但由于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无时不在,这又考验着钱庄的危机管理能力。为了化解各种危机,钱庄积极发挥自身信用风险控制优势和行业协会的同业监管优势进行管理;而政府以牺牲钱业利益为代价维护金融环境的做法则使钱庄陷入前所未有的国家信用危机包围之中。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钱庄自身的局限性又使钱庄应对和管理风险危机时,表现出一定的无力抵抗,但危机过后钱庄又能恢复经营,适时改革,保持顺应金融市场的变化。钱庄在成长中积累的应对各种危机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给予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上海钱庄作为金融机构,面临着金融系统所有的风险。尤其是在近代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在从自发演化向政府控制转型过程中,钱庄以

盈利为第一目的,业务范围广泛但不规范,制度规则以行业信用为前提,风险危机管理以探索和发展中遇到问题为契机。钱业公会以行业利益为准,在面对流动风险、信用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国家风险等各种风险时,才从应对的角度开展自救,或者从减少损害的角度事后弥补。这是钱业不断进行防范风险,风险却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政府对钱庄的控制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或者统治目的出发,因而不得不损害钱业的整体利益。尽管面对每一种金融风险,钱庄从自身到行业组织,包括政府层面都积极努力。但信用风险危机日益扩大,这是由于钱庄自身经营的特质,以及制度缺陷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的;而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环境动荡不定以及日趋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方式不完全适用于钱庄,也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矛盾纠纷中的风险不时呈现。

尽管上海钱庄风险危机管理具有历史特征和行业特征,但是,这对于当今民间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仍然有很大的警示意义,需要审慎而健全地进行内部控制和行业控制以及法律监管。一是金融机构首先要注重风险防范,经营原则以信用制度建设为前提,安全性为第一,盈利性为第二,审慎投资,做好事前调查、事中监督、事后弥补的制度建设;二是完善私营金融机构的资本筹集制度,加强准备金制度建设,组织结构建设和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避免过度倚重关系网络和信用融资;三是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无论从机构自身、行业协会,还是政府,其金融风险控制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而风险控制会因知识能力的有限而扩大。因此,要加强知识储备,完善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维护和惩戒职能;四是正确处理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能从金融机构的行业特色出发,以法律法规为前提,使金融业能够依法合规经营。

## 参考文献:

- [1] 朱荫贵. 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1): 58-70.
- [2] 刘梅英. 民间金融机构与政府: 上海钱庄研究(1843—1953)[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3] 杜恂诚. 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准入与退出管理[C]//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23-246.
- [4] 章乃器. 中国货币金融问题[M]. 上海: 生活书店, 1936: 297.

- [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 [6] 文昊. 我所知道的买办富豪[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51.
- [7] 刘梅英. 上海钱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控制机制研究[J]. 商业研究,2011(5).
- [8] 马寅初. 中华银行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35-336.
- [9] 上海钱业公会档案. 上海市钱业联合准备库档案[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78-1-8.
- [10] 上海钱业公会档案. 王廷圻致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函[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22,档案编号:S174-2-55.
- [11] 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64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3.
- [12] 杜恂诚. 近代中国无限责任企业的历史地位[J]. 社会科学,2006(1).
- [13] 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内园会议议案录[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19,档案编号:S174-1-1.
- [14] 杜恂诚. 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22.
- [15] 李权时. 赵渭人. 上海之钱庄[M]. 上海:上海东南书店,1929:59.
- [16] 杜恂诚.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1[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6.
- [17] 孔祥毅. 1883 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与钱庄:上[J]. 太原: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3):59-64.
- [18] 李一翔. 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231.
- [19] 徐矛. 中国十买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2-36.
- [20] 家珂. 鼎甦钱庄停业[J]. 钱业月报,卷 15 号 6.
- [21] 成九雁. 中国近代华商股市的监管结构:演变轨迹及其政治根源[D]. 北京:清华大学,2009:120-121.
- [22] 上海钱业公会档案[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74-1-1.
- [23] 陶水木. 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J]. 历史教学,2004(1):24-27.
- [24] 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董议事录[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24,档案编号:S174-1-2.
- [25] 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年会议案录[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25,档案编号:S174-1-2.
- [26] 刘梅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法律规制的考察:以上海钱庄为主线[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6(3):186-211.
- [27] 刘梅英. 政府行为对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影响:以 1927—1937 年上海钱庄为例[J]. 世纪桥,2013(9):66-68.
- [28] 吴景平. 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J]. 近代史研究,2004(6):56-86.
- [29] 钱业公会请订“钱庄法”呈文和对各埠同业通告[J]. 银行周报,1931,15(10).
- [30] 王晶. 1932 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J]. 档案与史学,2006(6):49-54.

## Research on th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in modern times:1843—1949

LIU Meiyo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in modern time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a financial intermediary, the native banks mainly faced the liquidity risk, credit risk, investment risk, competition risk, national risk and other risks etc. in the two stages: self-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control. In order to cope with various risks, the banks should not only take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own risk control system, but also utilize financial industry associati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at the cost of sacrificing the benefits, which made the banks caught in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redit crisis. The experience of the banks in coping with various risks from the market, the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s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legacy which will give current financial reform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redit risk; internal control; industry association; government

(责任编辑:任中峰)

# 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形成动因

孙文统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郑州 451200)

**摘要:**介词悬空是汉语中一类较为特殊的语法结构。现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该类结构的合法程度、结构分类与使用范围等描写层面,缺乏形式化的手段详尽地刻画该类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其形成动因。文章以形式句法学为理论框架,在对古今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以形式化的手段揭示其内部结构与生成机制,并对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关键词:**介词悬空;形式句法;生成机制;形成动因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28-05

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是指在介词短语中由于介词宾语缺失而产生的介词滞留现象。介词悬空在汉语中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在不同的语言中往往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在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中,介词悬空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语法现象,比如说英语的特殊疑问句和关系从句能够轻易地使介词滞留在句末而形成介词悬空结构:

**例 1:** Whom<sub>i</sub> did you borrow this book from t<sub>i</sub>?<sup>①</sup>

**例 2:** John bought a book which<sub>i</sub> h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sub>i</sub>.

上述两例均由 wh-短语移位而形成介词悬空结构,移位后留下语迹(Trace),在语义上与先行项同指。

汉语一般不允许介词悬空,即在汉语中,介词必须严格管辖(Proper government)其宾语成分,介词悬空通常会导致不合语法的句子产生,比如:

**例 3:** 教育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也对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例 4\*:** 教育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也对 e 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例 3 和例 4 中,例 3 合乎语法,例 4 不合语

法。原因在于例 3 中的介词“对”严格管辖其宾语成分“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例 4 中的介词“对”后面宾语缺失(e 表示缺失的介词宾语),在句子中找不到其语义所指,因此句子不合语法。

但是汉语中确实存在着数量有限的介词悬空结构,此类结构早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现代汉语中亦不乏用例:<sup>②</sup>

**例 5:**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

**例 6:** 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这是一个常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

关于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国内前辈学者围绕其结构特征、使用范围、悬空动因以及表达功用等方面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深入的描写。在形式句法学的理论框架下对该类结构进行科学的分类,揭示其生成机制,并对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

收稿日期:2017-09-28 网络出版日期:2018-01-11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专项课题(YB1734A06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CYY026);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7-PK-07)

作者简介:孙文统(1983-),男,河南郑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句法学方面的研究。

① 文中“t<sub>i</sub>”表示移位所留下的语迹,其下标表示在语义上与其先行项同指;“\*”表示不合语法;“?”表示语义不明确;“CoP”表示并列结构;“CP”表示标句词结构;“vP”表示轻动词结构;“PP”表示介词结构;“TP”表示时态分句。

② 本文例句均选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该语料库包括现代汉语语料、古代汉语语料以及英汉双语语料,为国内最大的语料库,数据详实可靠。

## 一、前人的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

国内语法学界已经对汉语介词悬空现象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董秀芳<sup>[1]</sup>以《史记》语料为基础,深入研究了古汉语中“与”、“以”、“为”等介词宾语缺失的情况,并将此类情况称为介词宾语的“零形回指”。彭睿<sup>[2]</sup>从构式语法化的视角探索了“从而”、“以及”等词的词汇化演变。刘丹青<sup>[3-4]</sup>对自然语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做出了统计,为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并且对框式介词以及先秦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现象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归纳与总结。何洪峰<sup>[5]</sup>深入研究了先秦介词“以”的悬空与词汇化,指出“以”字空位宾语的篇章功能在于回指上文话题和非话题性的事物、行为或事件。张谊生<sup>[6]</sup>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汉语中介词悬空的方式与句法后果,并详细论证了介词悬空的动因以及表达功用。此外,蔡吉利<sup>[7]</sup>也深入研究了介词悬空的性质和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和介词悬空密切相关的语法化现象。

经过对汉语介词悬空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学界对该类结构的语义特征、结构类型、句法后果及表达功用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一,关于介词悬空结构系统的、专题性的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往往在讨论词汇化现象时偶尔涉及到汉语介词悬空问题。其次,以往关于介词悬空的研究仍然以描写语言现象为主,缺乏形式化的手段对该类结构进行清晰的刻画并揭示其生成过程。第三,对该类结构形成动因往往从语用功能入手,尚不能从语言结构内部出发,从解释性的高度探索该类结构生成的形式化动因。

## 二、介词悬空的结构类型以及句法表现

### (一)介词悬空的结构类型

张谊生<sup>[8]</sup>指出,汉语中大概有“以、与、为、从、因、自、被、给、叫、据、按、依”等20多个介词可以允许其宾语缺失,形成介词悬空结构。由于汉语中的介词大都由动词虚化而来,根据上述介词的虚化程度及其语义特征,可以将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分为三类:宾语提升式、宾语脱落式以及凝固成词式。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古汉语中较为常见,在该类介词悬空结构中,介词宾语经移位提升(Raising)至句子的前部,介词之后并未使用“之、此”等复指代词,从而形成介词悬空的状态。古汉语中“以、为、

与”等表示对象和工具的介词通常以这种形式进行悬空。比如:

**例7:**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召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例8:**勾践心虞文种,故不为发兵,哀公遂死于越。(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

**例9:**晋武帝为中抚军,迎常道乡公于邺,志夜与帝相见,帝与语,从暮至旦,甚器之。(《三国志·魏书》)

表示来源和原因的介词如“自、因、用、由”等,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介词悬空结构,比如:

**例10:**惟俊风与旭日,俱东方自出也。(陆心源著《唐文拾遗》)

**例11:**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韩非子·存韩》)

**例12:**若从周家尊尊之文,岂宜舍其孙而立其弟?或文或质,愚用惑焉。(《北齐书·卷四十四》)

**例13:**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先秦至两汉之间较为常见,到唐宋时期之后就相当少见了。在现代汉语中,此类介词悬空结构被视为不合语法的表达方式。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在近代和现代汉语中均较为常见。这类介词悬空结构中的介词宾语于介词后脱落,在介词之前也没有明确地显现。表示被动的介词如“被、为、叫、让、给”等经常以这种方式进行悬空,比如:

**例14:**路易十六被弑之后,皇后也被捕下狱。(苏雪林著《棘心》)

**例15:**张无忌身上常脉和奇经隔绝之后,五脏六腑中所中的阴毒相互不能为用。(金庸著《倚天屠龙记》)

**例16:**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说:“哈!看你问得多傻,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冯德英著《迎春花》)

**例17:**这种丢三落四别说会成就“大事情”,就是他学生生涯中唯一当上的一次“官”也让弄丢了。(韩仁均著《杂文》)

**例18:**朱延年给问得无话可说,他转过口气来说:“当然要配货,不要一个劲屁股后头追……”(周而复著《上海的早晨》)

和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不同的是,此类表被动的介词宾语由于脱落而在文中找不到明确的语义所指,即介词的悬空对象隐含在句中,在形式上难以补出。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由于介词宾语的悬空而致使介词与其后的成分紧邻共现,久而久之,其间的边界消失,最终凝结为一个独立的双音节词汇。比如介词“用、拿”等可以和其后的连词“以、来”等凝固为“借以、用以、拿来”等双音节词汇,比如:

**例 19:**以后大妃又几次送去亲手烧成的饭菜,更使代善想入非非,不由得前去登门致谢,借以了解她的真意。(李文澄著《努尔哈赤》)

**例 20:**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李宗吾著《厚黑学》)

**例 21:**100 倍的收益成为华尔街的一个经典案例,很多风险投资家都愿意把它拿来给自己打气。(张剑著《世界 100 位富豪发迹史》)

而“据、按、照、依”等介词可以和其后的动词性成分凝固为“据说,据传,按说,照说”等双音节词汇,比如:

**例 22:**文章不通的人,据说,多数会打牌。(老舍著《四世同堂》)

**例 23:**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陈廷著《蒋氏家族全传》)

**例 24:**按说,来了一位客人,实在不应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老舍著《老舍短篇小说集》)

**例 25:**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照说呢,倒也是应该……”(张爱玲著《倾城之恋》)

在例 19 至例 25 的例句中,由于介词宾语缺失而造成介词与其后的成分长期紧邻共现,最终凝固成为独立的双音节词汇。

## (二)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与语义特征

上文讨论了汉语中介词悬空结构的三种主要类型,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及语义特征。上文提到,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宾语经移位提升至句子的前部,从而使介词的宾语缺失而形成介词悬空结构。在这类介词悬空结构中,介词宾语必须在句子的前部出现,宾语提升移位所留下的语迹在语义上必须与其同指。如果介词在语义上的宾语在句子前部缺失,则会导致句子不合语法或者语义不明确等情况产生。比如:

### 例 26:

a. 魏元忠<sub>i</sub>,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宗与 t<sub>i</sub> 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刘肃著《大唐新语》)

b. ? 高宗与 t<sub>i</sub> 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

在例 26 中,a 句经替身移位后的介词宾语语迹与其先行项在语义上同指,句子合乎语法。b 句中

由于介词后的宾语语迹找不到与其在语义上同指的先行项,因此句子不合语法。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形式上与第一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其缺失的介词宾语在文中有可能找到其明确的先行项,但由于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大多为表示被动语义的介词,其缺失的宾语在语义上大多不甚明确或不宜说明,因此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宾语在多数情况下隐含在句子中,找不到其明确的语义所指,比如:

### 例 27:

a. 晋人<sub>i</sub>,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 t<sub>i</sub> 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b. 公子围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韩非子·难四》)

在例 27 中,a 句介词“为”所缺失的宾语在语义上与“晋人”同指,而 b 句中缺失的介词宾语隐含在文中,找不到其明确的语义所指对象。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被动的介词如“叫、让、给”等的介词宾语有较强的悬空趋势,如无特别的语义要求,一般不会将其宾语明确地显现在句子中。而缺失宾语的介词与其后的动词性成分在线性上形成的“介词+动词”结构,具有一定凝固性,有时可以独立使用:

### 例 28:

a. 被打受辱成了矿工的家常便饭。(潍坊晚报,2014 年 3 月)

b. 小坡看了看小英的身上,并没有被打的痕迹。(老舍著《老舍长篇小说集》)

c. 她被打了,她也不后悔。(矛盾著《林家铺子》)

d.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胡适著《我的母亲》)

在例 28 的各项例句中,“被打”分别做句子的主语、定语、谓语和补语,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与独立性。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独立性最强,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宾语缺失以后,介词与其后面的成分经过长期的紧邻共现而凝固成词,最终实现了句法与词法的跨结构转换。如下例证明了“因而”一词从紧邻共现到凝结成词的演化历程:

### 例 29:

a. 适人恐惧。而有疑必<sub>i</sub>。因 t<sub>i</sub> 而离。(《墨子·备城门》)

b. 太子竟见废<sub>i</sub>。隋室因此<sub>i</sub> 而乱。(《太平广记》)

c. 当清兵进村时,她便把婆婆和子女藏到洞中,因而,全家人安然无恙。(曹秀君著《古今情海》)

在例 29 中, a 句中介词在语义上的宾语位于介词之前, b 句中介词后使用了复指代词“此”来指代其语义先行项, 而 c 句中“因而”已经凝固成为一个连词, 用来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在此类介词悬空结构中, 缺失了的介词宾语往往隐含在篇章中而无须明确显示出来, 介词作为一个黏着语素, 可以与其后的动词性成分凝固成为一个双音节复合词。比如上文提到了“借以、用以、因而、据说、照说、按说”等。除此之外, 由于此类介词已经高度虚化, 此类语义相近的单音节介词还可以相互结合而形成双音节的复合介词。比如“按、照、依、据”等单音节介词可以两两组合, 形成“按照、依照、依据”等复合介词, “依按”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虽然不常见, 但古汉语中却有用例:

**例 30:**拔追悼诛伐之人, 或所嗔畜物, 皆依按道法格律, 不可轻慢也。《《道法会元》》

因此, 本文将此类介词悬空结构中的介词视为一黏着词素, 其先与其后的单音节成分合并成词之后方可进入句法推导。

### 三、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机制以及形成动因

上文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及语义特征, 本节将分别探讨其结构的生成机制与形成动因。

上文指出,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常出现在古汉语中, 其结构中的介词宾语经提升移位至句子的前部, 移位留下的语迹在语义上与其先行项同指。这是由于汉语介词与动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依存于演化的关系, 古汉语中表示对象和工具的介词诸如“与、以”等的虚化程度较低, 尚保留着较强的动词性。以下是此类介词做动词使用的例句:

**例 31:**

a. 则与一生彘肩。《《史记·项羽本纪》》

b. 大小之狱, 虽不能察, 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

在进行句法推导时, 运算系统倾向于将此类“介词+宾语”的结构和“动词+宾语”结构等同视之, 介词宾语的提升移位并不会违反“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 ECP)”<sup>[9]</sup>而导致句子不合语法。而下面一例可以作为为此类结构中介词宾语提升移位的有力佐证:

**例 32:**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诗经·干旄》》

这句话的正常语序应为“以何予之”。介词宾语“何”经提升移位至介词“以”的前部。因此, 以“克明

俊德, 以亲九族”为例,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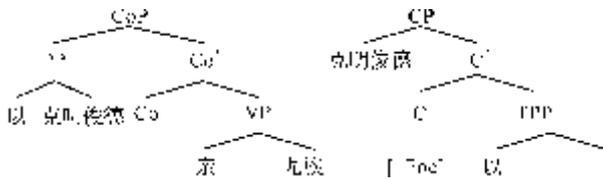


图 1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过程如下: 由于古汉语介词的动词性较强, 运算系统先将介词短语和动宾短语合并生成一并列性结构<sup>[10]</sup>, 然后整个结构继续以左向合并的方式依次与功能性语类 T 和 C 合并生成一完整的句子, 之后, 介词宾语经提升移位至 CP 的标识语位置<sup>[11]</sup>, 原位置的宾语经系统删略, 形成其表层线性表达式。该结构的形成动因在于宾语通过提升移位的方式核查功能性中心语 C 所携带的焦点语义特征 [+Foc]。

第二类和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宾语大多隐含在篇章中, 往往找不到明确的语义所指。此外, 这两类结构中的介词较为虚化, 只能作为附加成分 (Adjunct) 进入句法推导。将其视为宾语提升会违反“移位的局域性限制 (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 CED)”<sup>[12]</sup>。因此, 本文认为, 这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与其后的句法成分以直接合并的方式进入句法推导。以“张三被杀”为例,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过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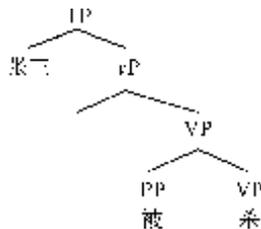


图 2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推导过程为: 句法系统从词库中提取词项, 生成词汇序列 {张三, 被, 杀, v, T}, 以左向合并的方式依次生成上述例句。根据“主语内在于 VP 假设”<sup>[13]</sup>, 主语“张三”基础生成 (Base generate)<sup>[14]</sup>于轻动词 vP 的标示语位置, 然后经提升移位至 [spec, TP], 形成表层语言表达式。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在于悬空介词宾语的语义自足性、双音化<sup>[15]</sup>的韵律要求以及句法推导的经济性要求。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更加虚化, 比如说“据 X”已经成为一个较为能产的词汇表达式。这类结构中的介词与其后成分的凝结发生在词库中, 进入句法推导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词项。比如“据

说,他学习努力”的生成过程可以用图3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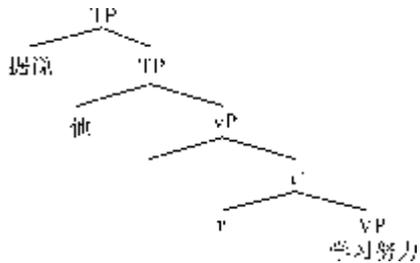


图3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在进入句法推导之前,介词“据”和动词“说”在词库中已经凝固成一副词性词汇,上面例句的词汇推导序列为{据说,他,学习,努力, $v$ , $T$ }。该序列仍然按照左向合并的方式进入句法推导。词项“据说”作为状语,在主语提升移位至[spec, TP]后,左向附加至 TP 左侧,从而生成完整的句子。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动因在于此类结构中的介词已经虚化为以黏着语素,在双音节化的韵律要求下,先与其后的单音节词汇凝固成词,然后进入句法推导。此外,该类结构的语义自足性、句法推导的经济性也是该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形成动因。

#### 四、结 语

作为汉语中一种较为特殊的语法形式,介词悬空结构拥有自身较为独特的句法及语义特征。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汉语中主要存在三种介词悬空结构。按结构中介词的虚化程度,可将其分为宾语提升式、宾语脱落式以及凝固成词式。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经宾语提升移位、语迹删略生成,旨在核查所提升宾语的焦点语义特征[+Foc]。第二类和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推导按照左向合并与左向附加生成,其形成动因在于介词宾语的语义自足性、双音化的韵律要求以及运算的经济性要求,其不同之

处在于第二类结构中的介词结构生成于句法运算,而第三类结构中的介词与其后单音节词素在词库中已经凝固成词。

####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 古汉语中介词宾语位置上的零形回指及其演变[J]. 当代语言学, 1998(4): 32-41.
- [2] 彭睿. 语法化的机制与后果: 以“从而”、“以及”和“及其”的演变为例[J]. 汉语学报, 2007(3): 31-43.
- [3] 刘丹青.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J]. 当代语言学, 2002, 4(4): 241-253.
- [4] 刘丹青. 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关照[J]. 语言研究, 2004, 24(1): 37-46.
- [5] 何洪峰. 先秦介词“以”的悬空及其词汇化[J]. 语言研究, 2008, 28(4): 74-82.
- [6] 张谊生. 介词悬空的方式与后果、动因和作用[J]. 语言科学, 2009, 8(3): 288-303.
- [7] 蔡吉利. 介词悬空的作用[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8-10.
- [8] 张谊生. 介词的演变、转化及其句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44-145.
- [9] Vivian C, Newson M.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7: 177-178.
- [10] Zhang N. Coordination in Syntax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31.
- [11] Radford A. Minimalist Syntax Revisit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9-214.
- [12] Huang C T J.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 Cambridge Mass: MIT, 1982: 503-515.
- [13] Radford A. Analysing English Sentences: A Minimal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1.
- [14] Ouhalla J.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9: 61-62.
- [15]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演化与发展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 39-42.

##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preposition stranding of mandarin Chinese

SUN Wento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Zhengzhou Chengg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1200, China)

**Abstract:** Preposition stranding is a quite special syntactic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Current analyses mainly focus on the grammatical degree, structural types and application range of such structures and lack formal mean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such structur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rmal syntax, this paper categorizes such structures scientifically reveal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such structures.

**Key words:** preposition stranding; formal syntax; generative mechanism; formation motivation

(责任编辑: 任中峰)

## 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

王正成,李丹丹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目前短文本情感分类主要采取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语义特性两种方式,而将这两种方式相结合进行情感分类的研究较少,故提出将这两种方式进行结合,设计基于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方法。首先利用 Word2Vec 模型训练词向量,以相加平均法合成短文本向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基于情感本体所得出的每条短文本的情感值,构建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短文本表示模型;最后采用 K 最近邻分类算法完成短文本情感分类。相比传统的基于词向量、基于情感本体或其他单一技术路线的分类方法,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分类方法在准确率、召回率、F1 值均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短文本情感分类;词向量;情感本体

**中图分类号:** G35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33-06

目前以微博等众多平台为代表的自媒体不断涌现,用户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动者,在网络社区中分享知识、经验和感受等,于是大量主观性的评论数据爆发性增长<sup>[1]</sup>。从大规模的文本数据中挖掘用户情感价值信息具有重要意义,而挖掘用户情感价值信息前提在于判别用户情感倾向。情感倾向的判别是在给定的文本分类模型下,依据文本内容所体现的情感特征,自动地对文本进行分类,从而帮助人们组织文本、挖掘文本信息。

### 一、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是根据文本内容所体现的用户意见的情感极性,将带有相同特定情感倾向的短文本归为一类,即文本情感分类<sup>[2]</sup>。目前短文本情感分类主要采取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语义特性两种方式<sup>[3]</sup>。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是指利用文本中情感词的权重等特性对分类器进行训练来识别文本。Pang 等<sup>[4]</sup>的研究表明,文本分类中若采用布尔值作为权重的 Unigram,分类效果最好。Isidoros 等<sup>[5]</sup>所设计的集成分类器架构是利用统计机器学习分类方

法,确定情感的极性。杨锋等<sup>[6]</sup>根据词语顺序共现随机网络和情绪词表对短文本进行情感分类。杨小平等<sup>[7]</sup>对用户评论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和分析,通过构建网络节点和拓扑连接关系的知识图谱进行情感分析。

根据情感语义特性进行分类的方法是指利用情感词极性来判别文本情感倾向。Philipp<sup>[8]</sup>根据情感词极性将人类的情感划分成 6 种基本类型,包括愤怒、厌恶、恐惧、欢乐、悲伤和惊喜。Gamon<sup>[9]</sup>采用了 NLPWin 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利用情感文本的句法结构特征来进行文本分类。Tong<sup>[10]</sup>建立了电影评论情感词典,对每一个情感词汇的情感极性进行人工标记,以评论中情感词的极性判别情感倾向。桂斌等<sup>[11]</sup>根据情感词在正负微博文本中出现的概率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史伟等<sup>[12]</sup>在划分情感本体(分为评价词本体和情感词本体)的基础上,构建了模糊情感本体作为分类依据。唐晓波等<sup>[13]</sup>对微博表情符号进行情感分析,构建了某微博产品的领域情感词典,进行微博产品评论的文本分类。

此外,张群等<sup>[14]</sup>提出了词向量与 LDA 相融合

的短文本分类方法,将表示文本情感分类的两种方式相结合,解决了短文本特征稀疏问题及主题聚焦性差的问题。这表明情感分类可将情感词与统计处理两者不同的技术路线相结合进行。目前将这两种文本特征表示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大多数情感分类方法都是采用单一技术路线进行。因此本文以微博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结合两种方式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即将情感词语义特性进行量化,与基于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分类方法相结合,利用情感本体词库的语义特性,融合基于 Word2Vec 的词向量,形成新的文本特征向量,之后通过 KNN 分类器进行短文本情感分类,查看分类效果评估该方法。

## 二、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

Word2Vec 采用神经网络语言模型 (Neural network language model, NNLM) 和 N-gram 语言模型,将每个词都表示成一个实数向量<sup>[15]</sup>。而情感本体则是对某个中文词汇或短语予以特性的描述。本文的情感本体主要借鉴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整理和标注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其词汇情感共分为 7 大类 21 小类,并标注各个词汇的词性、情感类别及极性<sup>[16]</sup>。

本文将以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其方法过程描述如下:

### (一)基于 Word2Vec 的词向量合成

采用向量相加平均法得到文本数据集  $D$  的基于词向量的短文本特征,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d_m' = \sum_{w_j \in d_m'} C(w_j) / N_m \\ = \{C(w_{m1}), C(w_{m2}), C(w_{m3}), \dots, C(w_{mj})\},$$

其中: $d_m'$ 表示  $D$  中第  $m$  篇短文本的基于词向量合成的短文本表示, $N_m$  为词数, $w_j$  为当前短文本第  $j$  个词( $j=1, 2, 3, \dots, N_m$ ), $C(w_j)$  是经过 Word2Vec 模型计算得到的词  $w_j$  的词向量, $C(w_{mj})$  是经过相加平均后得到的第  $m$  篇短文本中词  $w_j$  的词向量。

### (二)情感值计算

每条评论的情感值是由其情感词的数量和在情感本体中指定的强度来决定,定义公式如下:

$$d_m'' = \sum_{i=1}^n N_i \times Q_i,$$

其中: $d_m''$ 表示数据集  $D$  中第  $m$  篇短文本的情感值, $N_i$  表示短文本中第  $i$  个词的情感极性, $N_i$  的取值

范围为  $\{-1, 0, 1\}$  ( $-1$  表示贬义, $0$  表示中性, $1$  表示褒义), $Q_i$  表示第  $i$  个情感词的情感强度。

由于中文情感本体库中情感词数量有限,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情感词,特别是微博表情库。微博表情是在微博评论文本中常见的一种抒发用户情感的途径,而对于某些表情,无法在情感本体库中找出对应的情感词进行计算。因此,对于无法进行情感值计算的表情,本文采用与这些表情相近的且是包含在情感本体库中的情感词进行代替,例如微博表情库中的“[亲亲]”,在情感本体库中找不到与之直接对应的情感词,但可以用“亲热”这一相近的词进行代替,该词在情感本体库中属于“乐”这一大类,“快乐(PA)”这一小类,情感极性为褒义,情感强度为 5。此外,针对网络词汇,很难能够权威地肯定该词的情感值,本文通过 Word2Vec 词向量模型,根据词向量之间的余弦距离,查找与之相关的近义词来判断该新词的情感极性和强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网络词汇情感值示例

网络词汇	最近词	余弦距离	情感极性	情感强度
坑爹	郁闷	0.94390	贬义	5
萌萌哒	可爱	0.91689	褒义	5
腹黑	黑心	0.96465	贬义	7
心塞	难受	0.93084	贬义	5
吐槽	抱怨	0.90823	贬义	9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微博表情无法确定其情感倾向,例如“熊猫”、“咖啡”、“话筒”等表示静物或动物的微博表情,很难确定其情感极性以及情感强度。故本文将这一类微博表情的情感极性定为中性,即不计入评论文本的情感值计算。

### (三)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相融合的文本特征表示

将所得到的每条评论文本的情感值,记为  $d_m''$ ,作为该文本的除词向量以外的一大特征,与基于词向量合成的模型  $d_m'$  进行顺序拼接,得到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结合的短文本特征,公式定义如下:

$$d_m = \{d_m'; d_m''\} \\ = \{C(w_{m1}), C(w_{m2}), C(w_{m3}), \dots, C(w_{mj}); d_m''\},$$

其中:“;”表示向量顺序拼接操作, $d_m$  为文本数据集  $D$  中第  $m$  篇短文本的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结合的向量表示。

## 三、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过程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现对如何应用该方法提出对应的短文本情感分类过程,其方法流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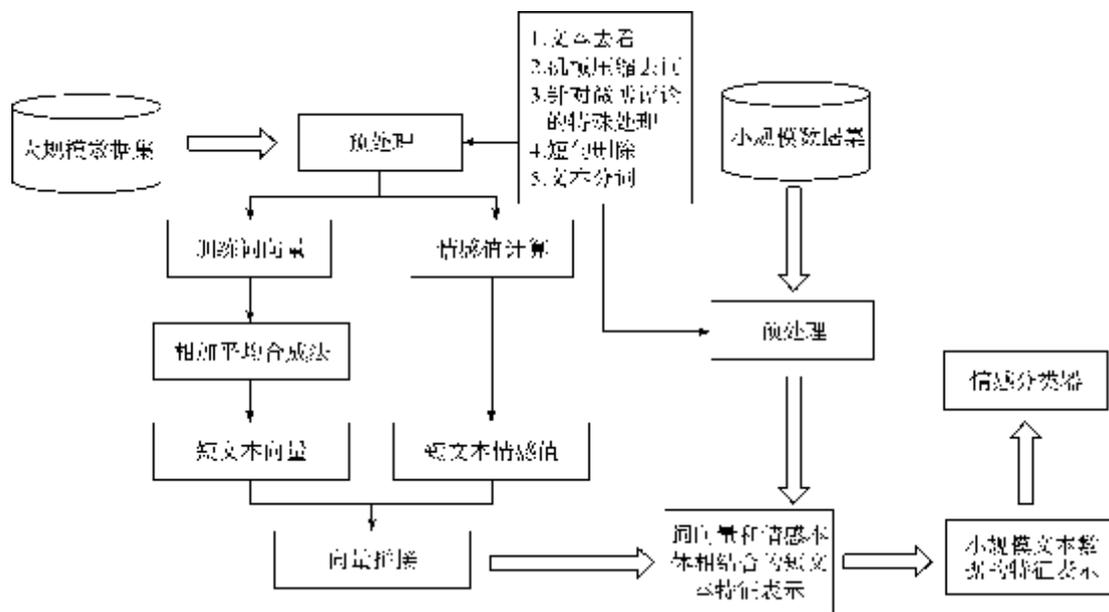


图 1 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流程

### (一) 文本数据集构建

本文的小规模数据集用于训练文本分类器,需要进行标注。而大规模数据集用于训练生成词向量和情感值相结合的模型,所需数据并不需要标注。因此本文分类流程属于半监督学习。

由于本文是以微博评论文本为例进行研究,故大规模无标注数据集和小规模有标注数据集都应来自微博的评论文本,其所包含的领域与分类任务一致,且大规模无标记数据集应包含足够的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社会、金融、互联网等)。

### (二) 评论文本预处理

#### 1. 文本去重

文本去重即是去除文本评论数据中重复的部分。针对微博平台,有些用户在转发微博时系统可能会自动进行评论,评论内容为“转发微博”;其次同一用户由于想要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进行重复评论;再者用户在评论时存在复制他人评论的可能性,导致出现不同人的评论内容相同。因此需要删除重复的文本数据,但为了存留更多的有用语料,文本去重只对完全重复的语料进行处理。

#### 2. 机械压缩去词

机械压缩去词的目的就是去掉一些连续重复累赘的表达,将多个连续重复的词语压缩至一个。由于微博的评论文本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没有意义的文本数据很多。例如,“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以及“好呀好呀好呀”。这类语料的特点是在于将某些词语连续地重复地进行表达,这对基于本文方法的短文本特征结果产生较大的干扰。

#### 3. 针对微博评论文本的其他处理

删除评论中存在的大量网页链接,这些对于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挖掘没有意义。除此之外,用户在评论微博时会@其他用户,或是用户在回复其他用户的评论时,该用户所抓取的评论内容形式为“回复@其他用户名: + ‘该用户的评论内容’”。并且,用户在评论某微博或回复他人评论时,该用户的评论会多次出现,意味着用户多次进行情感表达,这会对情感分类产生影响。故在进行文本数据预处理时,不仅需要把每条评论的用户名删除。另对同一用户的多次不重复评论进行处理,只保留该用户评论中最长的一条,避免用户的评论重复次数对分类结果产生影响(在此视同一用户多次对同一微博评论的情感倾向是一致的)。

#### 4. 短句删除

虽然精简的辞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比较好的习惯,但是由语言的特点知道,从根本上说,字数越少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就越少,要想表达一些相关的意思就一定要有相应量的字数。因此,要删除掉过短的评论文本数据,以去除掉没有意义的评论。根据实验经验,4~8个国际字符都是较为合理的下限。故此,经过前三步预处理后得到的短文本评论若小于等于4个国际字符,则将语料删去。

#### 5. 分词

进行预处理以后,主要对短文本数据进行分词。本文选用Python的中文分词包“jieba”进行中文分词。经过实验测试,“jieba”的分词精度高达97%以上。

### (三)短文本特征表示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计算预处理后的文本数据相对应的短文本特征,后将短文本特征数据输入情感分类器进行情感分类。

### (四)分类器选择

情感分类器主要有支持向量机、 $K$ 最近邻和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对处理样本量少的数据效果较好,但大样本时优势并不明显,且这种非线性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较高,也不适合在大样本数据上做训练。贝叶斯分类是根据某对象的先验概率,利用贝叶斯公式得出后验概率,以最大后验概率的类作为该对象所属的类。而KNN分类器是根据距离度量个体间的差异性,将距离相近的归为一类。而本文所提出的对某条短文本数据的特征表示的本质就是 $n$ 维向量,可依据向量之间的距离来进行短文本分类。故本文将选用KNN分类器进行分类。

##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 (一)实验设置

通过Python对微博平台数据进行网络爬虫,爬取不同领域(包括科技、社会、财经、互联网等)下的热门微博评论,本文总计收集50万条微博评论样本作为训练生成词向量和情感值计算的大规模样本,另收集3万条微博评论作为情感分类的样本数据。使用Python进行短文本预处理,包括文本去重、机械压缩、短句删除、包括针对微博文本的特殊处理以及评论文本分割。

经过以上处理,最后总计得到大规模数据集201245条,小规模数据集16832条。

本文将利用Python进行Word2Vec的词向量训练,根据经验设置词向量维数为50、100和150,用以测试不同维数下在KNN分类器下的分类效果。

### (二)评价指标

#### 1. Precision、Recall、F1分数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准确率 $P$ (Precision),召回率 $R$ (Recall)和F1值。为了方便描述三种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建立分类结果表2。

表2 分类结果

归属类别	属于此类	不属于此类
实际属于此类	$TP$	$FN$
实际不属于此类	$FP$	$TN$

表格中 $TP$ 、 $FP$ 表示分类系统与实际分类结果一致的文本数, $FN$ 、 $TN$ 则表示分类系统与实际分

类结果不一致的文本数。

准确率 $P$ 表示分类的正确率,计算公式为:

$$P/\% = \frac{TP}{TP+FP} \times 100.$$

召回率 $R$ 表示分类的完整性,计算公式为:

$$R/\% = \frac{TP}{TP+FN} \times 100.$$

F1值综合考虑准确率和召回率,计算公式为:

$$F1/\% = \frac{2PR}{P+R} \times 100.$$

#### 2. AUC(Area under curve)评价指标

AUC是指ROC曲线下的面积,取值范围一般在 $[0.5, 1.0]$ ,且其面积越大,分类效果越好。而ROC曲线是指对于某分类器在不同的阈值下,会得到一组 $(FPR, TPR)$ ,以 $FPR$ 作为横坐标, $TPR$ 作为纵坐标,作出曲线图。其中对 $FPR$ 和 $TPR$ 定义如下:

$$FPR/\% = \frac{FP}{FP+TN} \times 100,$$

$$TPR/\% = \frac{TP}{TP+FN} \times 100.$$

为消除本文小规模数据的样本数目对本文分类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AUC评估不同样本量下的分类结果。

### (三)结果分析

针对不同维度下(50维、100维、150维),测试本文方法的AUC值随样本量大小变化的情况,并比较其他两种分别基于情感本体和词向量模型的方法。其中样本量从已预处理好的16832条小规模数据中随机抽取2000,4000, ..., 14000,16832条进行实验。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比例依照 $K$ -Fold Cross-Validation( $K$ 取常用值,即 $K=10$ )方法进行10次交叉验证,最后得到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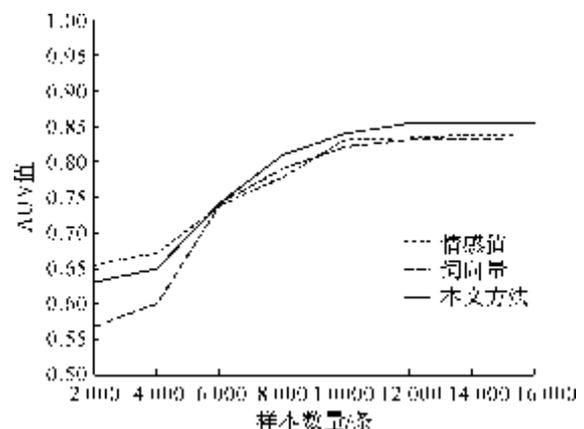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50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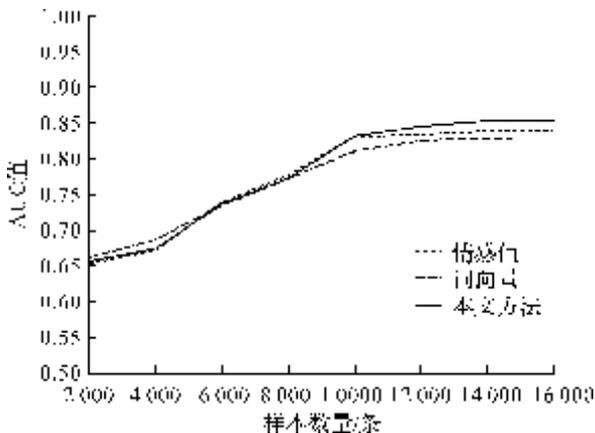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100 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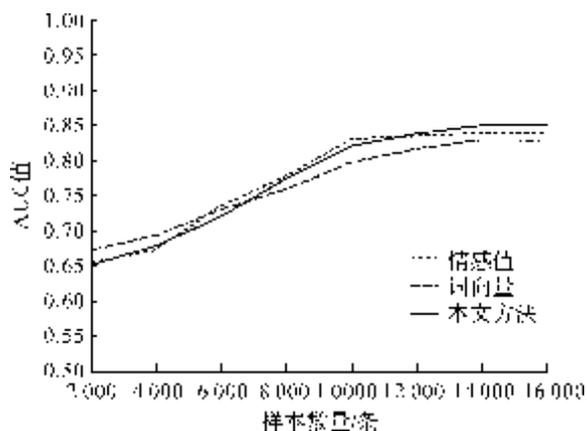


图 4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150 维)

由图 2—图 4 可知,当样本数目大于 12000 时,三种分类方法的分类效果达到较好的水平,并且此时维数对分类效果的影响较小。因此从计算效率的角度考虑将维数设置为 50,样本量设置为 12000,对三种分类方法进行测试,取 10 次 10 折交叉验证结果的均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分类结果比较(50 维)

分类方法	F1 值/%	P/%	R/%
本文方法	76.6	76.7	76.4
词向量	73.3	73.2	73.4
情感本体	75.1	74.9	75.3

从表 3 可以看出,相比其他两种分类效果,本文的分类效果较佳,F1 值至少提升 3.3%,准确率 P 至少提升 3.5%,召回率 R 至少提升 3.0%。并且从图 2—图 4 可看出,本文方法的 AUC 值在样本量大于 12000 时,均较优于其他两种方法。综上,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可有助于提升短文本情感分类效果。

## 五、结 语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即综

合情感词特征和词向量的文本特征表示。实验部分探讨了不同词向量维数以及分别基于词向量和基于情感本体在 KNN 分类器上的分类效果,综合得出本文方法的优势。然而本文方法不足之处在于,一是仅简单地将情感值与词向量拼接作为文本的特征项,二是缺乏对网络词汇情感倾向判定是否恰当的评估。后续将对某一领域和网络词汇的情感强度和极性判定,以及词向量和情感值的其他结合方式等情况展开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夏火松,刘建,朱慧毅. 中文情感分类挖掘预处理关键技术比较研究[J]. 情报杂志,2011,30(9):160-163.
- [2] Yu N. Exploring co-training strategies for opinion detection[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 65(10):2098-2110.
- [3] 唐晓波,朱娟,杨丰华. 基于情感本体和 KNN 算法的在线评论情感分类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39(6):110-114.
- [4] Pang B, Lee L. Seeing stars: exploiting class relationships for sentiment categorization with respect to rating scales [C]//4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ichigan: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5.
- [5] Isidoros P, Ioannis H. Recognizing emotions in text using ensemble of classifiers[J].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 51(C):191-201.
- [6] 杨锋,彭勤科,徐涛. 基于随机网络的在线评论情绪倾向性分类[J]. 自动化学报, 2010, 36(6):837-844.
- [7] 杨小平,马奇凤,余力,等. 评论簇在网络舆论中的情感倾向代表性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6, 32(z1): 51-59.
- [8] Philipp M.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in automated emotion classification[D]. Cambridge: Churchill College, 2003.
- [9] Gamon M.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on customer feedback data: noisy data, large feature vectors, and the role of linguistic analysis[C]//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4.
- [10] Tong R M. An operational system for detecting and tracking opinions in on-line discussion[C]//the 2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New Orleans: ACM, 2001.
- [11] 桂斌,杨小平,张中夏,等. 基于微博表情符号的情感词典构建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4, 34(5):537-541.
- [12] 史伟,王洪伟,何绍义. 基于知网的模糊情感本体的构

- 建研究[J]. 情报学报, 2012, 31(6): 595-602.
- [13] 唐晓波, 兰玉婷. 基于特征本体的微博产品评论情感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6(16): 121-127.
- [14] 张群, 王红军, 王伦文. 词向量与 LDA 相融合的短文本分类方法[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6, 32(12): 27-35.
- [15] Mikolov T, Chen K, Corrado G, et al.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Word Representations in Vector Space [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Scottsdale: the Computational and Biological Learning Society, 2013.
- [16] 徐琳宏, 林鸿飞, 潘宇, 等. 情感词汇本体的构造[J]. 情报学报, 2008, 27(2): 180-185.

## Shor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word vector and emotional ontology

WANG Zhengcheng, LI Dand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wo ways are mainly adopted for shor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motional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is few. Thus, this paper will design a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at i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word vector and emotional ontology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word vector was trained by Word2Vec model and short text vector was synthesized by adding average method. On this basis, short text expression model which integrates word vector and emotional ontology wa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emotional value of each short text. Eventually, shor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was completed by using KNN algorith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word vector, emotional ontology, or some other single technical route,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combining word vector and emotional ontology gets an obvious improvement on precision, recall rate and  $F1$  value.

**Key words:** shor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word vector; emotional ontology

(责任编辑: 任中峰)

## 书写和隐喻的力量

### ——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壁纸》

何 靛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 从米尔斯提出的女性主义文体学相关理论的视角,对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吉尔曼的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壁纸》进行文本细读。讨论了小说的日记体写作手法和吉尔曼作为女性、女性阅读者和女性写作者三重身份之间的关系,以选词和语句层面的分析表明女性阅读和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仍被置于男性权威之下,进而与女性的身份一样受到压抑和消声;从“黄色”和“壁纸”的隐喻意义入手,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写作与阅读与其身份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探讨了建立独立女性文学表达的可能性与其在重构女性精神世界、帮助女性获得独立自由中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体学;《黄色壁纸》;日记体;隐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39-07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是美国最早的女性主义先锋作家之一,曾担任《先驱》月刊出版人,同时身兼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商业艺术家、教师等多重职业身份。除曾入学罗德岛设计学院之外,吉尔曼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但她的家族却是女性先驱辈出:姨祖母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被称为“引发了南北战争的女人”,其作品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吉尔曼的作品中渗透着她痛苦的生活体验:两段婚姻,困扰终身的产后抑郁症,折磨身心的乳腺癌。罹癌三年后,吉尔曼在加州帕萨迪纳自杀,那里也正是吉尔曼短篇小说代表作《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的诞生之地。

《黄色壁纸》和凯特·肖班(Kate Chopin)的《觉醒》(*The Awakening*)被视为女性文学经典必读之作,也是吉尔曼的成名作,初版发表于1899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美国中上阶层的一位知识女性由于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而被内科医生丈夫约翰

安置到一座偏僻孤立的深宅大院里进行“休养治疗(rest cure)”<sup>[5]</sup>。这种疗法使她不得不与刚出生的孩子分开,不得随意出门,不得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事情(譬如写作),只能整日呆在贴着黄色壁纸的育婴室中。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约翰让自己的妹妹珍妮“照顾”“我”。珍妮尽职尽责,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如实地报告给约翰。“我”的精神在监狱般的生活中走向崩溃,渐渐对墙上的黄色壁纸产生了幻想。“我”总觉得有很多女人藏在壁纸的图案后面,她们挣扎着想出来却又被阻隔拉扯。最终,“我”决定帮助女人从壁纸中出来,甚至融入了她们。“我”撕碎壁纸,把房门锁起来,在地上四处爬动。匆匆赶来的约翰费力打开房门,却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倒在地。“我”从他的身体上爬了过去。

小说从女性的视角,以日记的文体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女性是怎样在男性看似关心尊重,实则被压制被消声,被剥夺身心自由,逐渐陷入癫狂的心理状态。吉尔曼以她个人受诊于心理医生并接受“休养疗法”的经历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在十九世纪初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以往对《黄色壁纸》的解读往往

从女性主义批评和哥特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或者从精神病治疗与女性话语的关系,以及使用福柯“权力与规训”的理论来细读文本。但是对文本内容的解读很容易产生主观倾向,使得带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渗透痕迹。因此,本文希望从女性主义文体学这一比较新的视角,通过将文本分析和语言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审视吉尔曼的这篇杰作,希望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

##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

1995年,英国语言学家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出版《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 Stylistics*)一书<sup>[13]</sup>,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论述女性主义文体学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著作。在引言中,米尔斯不仅阐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还指出了传统文体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米尔斯认为“语言和读者是文本意义产生的一部分,每个读者或评论家因个人背景、经历或关注点的不同会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何大部分文学评论倾向于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实际上也显示出菲勒斯中心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很难真正摆脱因意识形态对文本产生的割裂。因此,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多少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理论的建构,使得批评变得客观起来,使得‘即使不同读者阅读也能产生一个相同结论’变得可能”<sup>[2]</sup>。因此,米尔斯详细分析了阅读阐释对文本意义建构产生的影响,提出应该更加重视女性读者对某些文本的阐释,允许多种结论的产生。

西方女性主义文体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语言学多个分支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批判性语言学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sup>[12]</sup>(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结合。米尔斯拓展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与文本的选择范围,认为“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问题相联系。……同时,我也建议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分析对象应不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应包括其他一切能够服务于论点的文本形式,比如广告或新闻报道”<sup>[12]</sup>。这种广阔的视角为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近年来,女性主义文体学飞速发展,已“自然成为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一个分

支”<sup>[13]</sup>。

《女性主义文体学》分为理论和方法两大部分,系统的结构也反映出米尔斯希望女性主义文体学能够作为一种有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被运用于实践之中。在理论部分,米尔斯讨论了女性主义文本类型、语言的性别区分以及性别和阅读的关系。之后从语词层面、句子层面以及语篇层面进行了丰富的文本分析。通过将语言学分析方法与文学批评方法相结合,女性主义文体学试图从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中另辟蹊径,从语言的细微之处发掘出女性阐释与表达的可能性。同时,米尔斯所选用的文本不拘泥于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广告、海报等其他文本形式,大大拓宽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而《黄色壁纸》作为女性主义著名的代表作,自1892年发表以来就被许多文学批评家进行解读,文中“我”的形象更是在此过程中被定义、反思以及重塑,成为某种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英雄”。

## 二、日记体:文学、性别、身份

苏珊·兰瑟在其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黄色壁纸》是许多因意识形态原因险些被埋没的众多作品之一。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作品内容是否具有冒犯性,是否会引起争议。比如《黄色壁纸》最早投稿的《亚特兰大月刊》的编辑就拒绝了这部短篇小说的刊载,原因是‘如果(他)使得读者变得跟读完了这篇小说的自己一样痛苦,那么(他)将无法原谅自己’。”<sup>[8]</sup>但是,类似于“让人绝望”或者“给人痛苦”的评价也同样被给予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然而坡的作品却一直再版,并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者。

兰瑟的评论将问题的关键聚焦于为何相似主题的作品会因为作者的性别而受到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对《黄色壁纸》感到恐惧和焦虑的多数是男性评论家,而正是众多女性批评家对《黄色壁纸》从女性主义角度做出的解读将其中的“我”塑造成了19世纪反抗男权的“女英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单单以性别歧视简而话之,需要考虑吉尔曼所处的时代和她的女性身份。但吉尔曼在《黄色壁纸》中毫不掩饰地对女性写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进行了探讨,利用最隐私的日记体手法对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份意识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揭示。虽然是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但是《黄色壁纸》包含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仿佛吉尔曼在邀请着女性读者和她一起在

私密的空间中(即日记体小说特有的私密性语言)展开一场对文学、性别和身份的精神分析。

吉尔曼利用日记体对“我”最深刻最隐私的身心体验进行细致的公开叙述。在中国五四期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利用日记体的形式描述出处于边缘状态和弱势地位的个体,具有某种异己性质。和吉尔曼的小说作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部作品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性别,他们的作品却具有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在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女人”还是“疯人”,他们都被剥夺了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权力;反过来说,他们讲出任何大逆不道或荒诞不经的话语,也因而都拥有了某种合理性<sup>[6]</sup>。

在写作日记的过程中,读者和作者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独特、封闭的阐释循环。日记的内容不会进入公共领域,又赋予了日记作者某种程度上的言说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吉尔曼会让囚徒般的“我”使用日记这一文体来呈现隐含作者的心理状态:书写本身成为一种对男性压制的反抗,“我”也得以在日记中发声,写出对约翰所代表的男性力量最真实的感受。

在小说开头,“我”便告诉读者“约翰是极其现实的。约翰对信念这一说法无法忍耐,对迷信怀有强烈的恐惧,而且言及任何无法感知、未经目睹且无法以数字记录的诸事,都会遭其公开嘲笑”。由此可以看出,约翰的性格使其对妻子的病情具有先在的偏见和无知,在他看来,妻子的病是源于她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源于她“编故事”的能力。所以,他面对妻子的质疑“感到好笑”,“我”也认为或许“我”无法更快好起来的一个原因正是:“你瞧,他不相信我生病了!”<sup>[10]205-206</sup>。

在这句感叹句中,吉尔曼使用了“你瞧”来直接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句尾的感叹号加深了句子讽刺又无奈的意味。在此,吉尔曼想要“拉拢”的读者显然是女性,因为在她的时代,女性被认为是脆弱的,敏感的,和“歇斯底里”天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吉尔曼自己正是这种观念下的受压迫者。因为产后忧郁症,她被丈夫送到当时著名的心理医生威尔·米切尔(也就是“休养疗法”的创始人)处接受诊治,被迫放弃一切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工作。因此,《黄色壁纸》也正是吉尔曼自己真实的心理写照。正如小说中的“我”无法被理解一样,吉尔曼在现实生活中也因为这次治疗濒临崩溃。

日记体在文本内部消除了除“我”之外的存在,

因而能够最有效地作为个体的“我”发出自己声音的媒介,探讨在面对男性的物化和拒绝时,“我”作为女性内心真正的愿望和反应。日记体由此被认为是女性私语式的情感话语,它为女性大胆表达自己提供了一种“私人场域”。但另一方面,日记体又因这种隐蔽性使得其话语内容的权威性岌岌可危。其太过自我的表达很容易让读者质疑其客观真实性而将其置于边缘。

这种二重性也同样成为小说中“我”之处境的隐喻。一方面,日记是她在丈夫的剥夺监视下唯一能够保有的言说途径;另一方面,又因为它的私密性无法成为和外界沟通交流,诉说自己的媒介:“我不知道缘何要写这些。我不愿去琢磨。我琢磨不透的。我还晓得约翰会觉得荒唐。但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诉说我的感想——这将如释重负!”<sup>[10]216</sup> 句尾的感叹号再次展现了“我”矛盾压抑的心情,寻求理解,寻求自由,又没有办法表达这种诉求。和约翰几次的沟通都以失败告终,这也预示着日记体虽可为女性表达自我却又在无形中成了男性权力的帮凶,不断消解压抑着“我”的话语和诉求,再次显示出女性被剥夺和压制的边缘地位。

日记体成了女性写作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文学创作传统、女性被赋予的从属地位的一种体裁表征。小说中的“我”虽然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看似关心,实则强迫和忽视的真相,但仍旧因为在言语中的弱势和对自身意义的不明确而不能真正打破丈夫和其所营造的空间的束缚。因为“我”不停告诉自己“亲爱的约翰!他特别疼爱我,不愿我生病”,所以在每次谈话的对峙中最终都是“我”在约翰的强势和拒绝中败下阵来,“我又没能给自己找出充分的理由反驳”<sup>[10]216</sup>。

而约翰的“爱”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对于“我”这个个体的爱?这是“我”无法区分清楚,也不想去揭示的。“我”的日记中,只有约翰的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保留下来,伴随着和约翰一次次沟通的失败,“我”的病情也一步步加重,陷入“倾诉——拒绝——自我安慰——倾诉”这一没有结果的循环中。

在“我”最后一次尝试告诉约翰自己的情况,希望他能带自己离开时,他答道:“(1)家里的维修还没完工,我此刻也离不开镇上。(2)当然了,若是你病得厉害,我定能而且也会带你走,但亲爱的,不管你自己意识到没有,你的确好多了。(3)我是位大夫,亲爱的,所以我看得出。(4)你在长胖,也有气色了,胃口也好多了,我确实对你要放心得多”<sup>[10]219</sup>。

这段话可谓层层推进,揭示出男性语言对于女

性表达的压制和解构;第(1)句中表明约翰不带“我”走的真正原因。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好丈夫”的形象,他在第(2)中又强调了自己的拒绝是为“我”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句中,约翰使用了“真的”和“的确”,暗示他根本不相信妻子的话,也不相信妻子拥有描述自己客观病情的能力,他的判断全部是基于他的自以为是。第(3)句进一步以“大夫”的身份来压制妻子,巩固自己作为男性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最后,在第(4)句中,他再次以自己所认为的事实来解构妻子的主观感受,并用“我确实对你要放心得多”给“我”进行心理强化。自始至终可以看出,约翰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其看问题的角度完全是处于他自身的考虑,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和理解妻子的病情。

“我”想以“或许身体上好些了——”来继续谈话时,约翰因为睡眠持续被打断显示出了不耐烦的神情,并且“打量我的目光里含有那么一股怨嗔苛责的意味”。破折号的使用表明“我”的谈话被打断,同时表现出“我”对约翰那带有苛责的凝视产生的恐惧。“我”感受到了约翰的拒绝,“以至于我吐不出一个字来了”<sup>[10]219</sup>。

约翰之后的一段话更使“我”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完成了对“我”的消声:“(5)‘亲爱的,’他说,‘我求求你了,看在我的份上,也看在我们孩子的面子上,同样也是为着你自己,你绝不要有一瞬间让那想入非非的念头蹦到你的脑子里去!(6)对于像你这般性情的人,这是再危险、易入迷不过的事儿了。(7)这是某种虚幻不实的愚蠢幻觉。(8)我作为一名医生这么嘱咐你,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么?”<sup>[10]220</sup>

第(5)句中,约翰用恳求的语气放低了自己作为男性的姿态,动摇“我”渴望诉说的决心。之后先说“看在我的份上”,提醒“我”意识到自己“妻子”的身份和责任;再用孩子提醒“我”作为母亲的身份和责任,最后才是“我”作为个体的身份。对“妻子,母亲,女人”三个身份的先后排列不仅表明约翰并没有将“我”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个体来看待,更一步步解构了“我”作为个体女性的独立性,再次使“我”符号化,模糊化。句尾的叹号暗含命令的语气,显示出男性对女性的规约欲望;第(6)句的主语不是表示个体的“你”,而是“像你这般的人”,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高人一等的姿态;第(7)句中“我”的病情等同于“愚蠢的幻想”,充满了贬义,显示出男性权威对女性的蔑视;第(8)句中则再次强调自己“医生”的权威地位,同时,反问句又提出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男人的压

倒性的力量。至此,“我”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所以我当然说就此不再提及”<sup>[10]220</sup>。这段对话是小说中为数不多“我”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转述,表明了这段话对“我”精神产生的难以遗忘的冲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鼓起勇气向约翰表明自己想要离开的愿望,但却遭遇了约翰最粗暴和直接的忽视与拒绝。“不再提及”既表明“我”完全失声,也表明了“我”对约翰不再抱有希望。“我”更加退入内心世界,是之后“我”精神状况失控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日记中使用了大量的感叹号,直观地表明“我”内心的不安与愤怒。日记写作通常是平静的回忆式陈述,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多为句号。其写作通常与叙述之事间有一个时间沉淀,也意味着一段感情沉淀的时间。再者,写作日记通常是在比较私密放松的环境之中,比如夜晚的卧室或书房,因而下笔相对也更从容。但“我”的日记却既要偷偷地写,又是在近乎封闭、充满监视的环境里——“我”丧失了情感沉淀的时间和来自私密空间的安全感——感叹号提醒着读者去揣摩“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同时,对转折词如“但是”“却”“然而”等的运用也鲜明地展现了“我”真实想法与外界现实的反差:转折词前经常是约翰或珍妮认为、希望“我”能如何如何,而在下一行的转折词之后往往会是“我觉得”“我想”。“我”的真实诉求被长期搁置、延宕,这才是“我”生病的根本原因。

作为日记体呈现出来的小说不仅呼应了作为病人的“我”像日记一样无法被他人阅读和理解,也因为“我”的女性身份表明男性的压制和束缚中,女性最终将陷入沉默,所有的自我书写都相互抵消,自我的存在面临消失和分裂的困境。日记体既像女性作家面临的语言困境的隐喻,又像整个女性身份错位与缺失的隐喻:女性写作无法以男性语言进行构建,也无法传达女性真正的心理需求,因为她既不被允许写作,写出的日记从本质来说也不会被他人看到;同时,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在19世纪是痛苦的,因为这些写满诉求的日记除了让她更加陷入自己的困境之外,没能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 三、黄色壁纸的隐喻:伴随阐释的重构

如果说读者从小说中看到“我”作为女性个体一步步崩溃的解构过程,那么透过“我”对壁纸孜孜不倦的阐释尝试却表现出一个新的女性形象以读者和解码者的身份进行重构。苏珊·兰瑟认为:“《黄色壁纸》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文

本的新途径,这篇短篇小说实际上是这种修正性阅读的一个认知过程。因为叙述者本身就亲身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解读——她一直试图弄清壁纸的意义。”

这实际上是将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进行了转换和类比。面对复杂难辨,迷惑人心的壁纸,叙述者“我”就像面对复杂文本的读者,想要通过自身的认知和思考,将自我建设投射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中。但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那么顺利,特别是在充斥着男性主导权的语言结构中构建起女性独立的言语阐释空间更加困难。正如女性主义文体学家所提出的:“女性读者应当秉持这样一种阅读理念,即不应把文本当做意义承载的容器,而是作为作者所留下的一系列充满模糊可能性的踪迹,读者需要不停地质疑和询问,去试图抓住这些踪迹”<sup>[1]</sup>。

之所以在此强调女性读者的地位,是因为《黄色壁纸》巧妙地展现了男女之间在阅读和写作行为上的差别。《黄色壁纸》详细展现了吉尔曼完成这篇文稿的过程——即作为女性作者的心理——这是一篇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写下的故事,从中读者可以窥视到吉尔曼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对女性写作的看法。同时,她笔下的“我”对壁纸的研究与解读又仿佛是女性读者阅读行为的一个镜像,其描写深刻地反映出在面对男性语言主导的文本时女性读者感受到的迷惑、压抑以及愤怒。如果把文中的“我”对壁纸意义一步步的构建解读为写作的过程,那么“我”最后的癫狂则表明了吉尔曼自己对女性作家身份的矛盾态度:癫狂究竟是源于对创造力的压抑还是过分纵容?

在《女性文体学》中,米尔斯认为女性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以某种类型的隐喻出现,比如鸟,尤其是笼中鸟。<sup>[2]40</sup> 娇小、柔弱、美丽、顺从,这些特质似乎总是被反复类比于女性,而且是某种理想的女性。她们需要依附于饲主并要尽力赢得饲主的欢心,以期被给予更舒适的生活,却从不会想要从笼子里出来。即便有些冲出笼中的鸟儿,她们的下场也往往以悲剧告终,成为某种反面教材——更加巩固了“笼中鸟”的形象。吉尔曼所处的19世纪正是第一次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女性获得了相对多的教育权,同时也引发了对女性是否适合工作的争论。而写作,作为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前提下首先想到的职业,首当其冲受到了社会传统观念的质疑。在中产阶级男性的意识中,“女士发表作品只为三种理由:爱听赞扬,爱金钱,或是有做好事的愿望。”<sup>[1]51</sup> 写作,会从精神和经济上赋予女性前所未

有的独立性,而这无疑会威胁到男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如在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女作家夏洛特·扬的父亲似乎做出了某种让步,表示“如果夏洛特愿意写教诲性的小说,并把挣到的钱赠送出去,那么他会不吝赞赏之词并克制住怒火。”<sup>[1]51</sup> 但很显然这是种以退为进的妥协,因为“教诲性的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不需要想象力、最容易被反过来利用为宣扬某些男性传统道德的类型,而分文不取则意味着要求女作家自愿放弃经济自立的可能性。

写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的某种对立自1850年后就让许多立志于成为作家的女性感到焦虑。<sup>[1]60</sup> 这种焦虑也经常反映在女作家的创作中:比如作品反复出现的和房间(比如伍尔夫讨论女性写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屋(比如《黄色壁纸》一开始就对房屋的外观进行了详细描写),土地以及大海(伍尔夫《到灯塔去》中大海的象征意义)相关的描写。这些重复的意象既暗示了她们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显示了家庭生活对女性经验的束缚,即她们只能写她们所熟悉的东西。壁纸也是这一系列“房屋隐喻”中的一个。但《黄色壁纸》中的“壁纸”意象需要和那个“壁纸背后的女人”意象联系起来理解:两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演变,显示了“我”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精神运动。

初始时“我”想勉力以所谓的理智来思考壁纸的图案,以克服对它的厌恶和恐惧,此时壁纸的图案在“我”看来是“折断的脖颈”和“两颗眼白上翻的眼球”<sup>[10]212</sup>,分别象征着“扼杀”和“监视”。我虽然不喜欢壁纸,但是又庆幸图案阻隔了它们接近“我”的企图。而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约翰表明想要离开却遭到拒绝,壁纸成了“我”唯一的兴趣对象,“我”不再厌恶它。上面图案也产生了变化,“凭借月色,花纹的肌理演变、幻化成了栅栏!”<sup>[10]221</sup> 月色在文学传统中经常和女性与癫狂联系在一起,这里表明了“我”精神的进一步崩溃。而“栅栏”则隐喻着“禁闭”与“隔离”,此时“我”肯定地认为“那个图案里朦胧黯淡的暗纹是一个女人。”<sup>[10]221</sup> 图案从监护者开始转变为镇压者,“我”开始同情“栅栏”后的女人。最终,“我”认同了她们,此时所有原本是“那个女人”的动作开始以“我”为主语,读者慢慢不再能够分辨描述的究竟是“我”还是壁纸后的女人。壁纸已经完全变为邪恶的存在,是“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尽力尝试着褪去的束缚。”<sup>[10]226</sup>

“我”对壁纸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知重构,隐喻的一系列变形既是“我”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的显现,伴

随着“我”对与约翰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建构;也象征了在创作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我”即吉尔曼作为女性对艺术的渴望与受到的压抑。壁纸既是叙述者形象和生活的隐喻,又是其打破封闭,建构自我的突破口。最初的厌恶是因为壁纸肮脏沉闷,模糊不清的状态正好影射着叙述者不能掌控的生活现状。“我”此时还寄希望于约翰身上,相信他对自己的爱护,相信他最终会带自己脱离这种生活。但是随着言语交流的一步步崩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和约翰身份上的不对等,他不可能理解“我”,也不可能帮助“我”痊愈。

壁纸上的图案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它慢慢变成“我”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唯一和思维与精神活动相联系的部分。当“我”把精神投注在壁纸上时,它便开始具象化为“我”的形象,和叙述者的状态形成一种对应:

夜里,在任何光线下,于黄昏的薄暮中,烛光下、灯火里,还有最糟糕的便是凭借着月色,花纹的肌理演变、幻化成了栅栏!我的意思是指壁纸外在的图案,而隐藏于其后的那个女人简直呼之欲出,再清晰不过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壁纸背后呈现的影像是何物,那个图案朦胧暗淡的于模式,但现在我可以很肯定那暗纹是一个女人。在白昼的天光下,她显得柔韧克制,安宁平和。我以为是那时呈现的图形使得她能如此沉静。好生奇怪。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持守缄默。<sup>[10]</sup>

在隐喻结构中,日光象征着男性的力量,理性和活力,而月光则总是和女性相对应,预示一种潜在的疯狂的力量,温柔和神秘。同时,两种时间与心理状态上的呼应也和“我”的抑郁症状表现产生对照:白天病情相对稳定,晚上则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时段,伴随着失眠和幻觉。

不论是“我”的病症还是对壁纸的解读,实际上都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根源——男性权威的束缚和压制。小说中作为“我”的对立面的女性形象,约翰的妹妹珍妮,即是传统社会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她是位理想完美、尽心尽职的女管家,看来没啥职业比这个更适合她了。我完全相信,她肯定认为正是写作让我惹病上身的!”<sup>[10]</sup>珍妮对待壁纸的态度和约翰如出一辙,她与“我”的关系正如壁纸和图案后面的女人。

珍妮代表着认同男性统治传统的女性,她们顺从命运,安于做男性身后沉默模糊的影子。《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小说中“屋中天使”

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存在的意义在于体现出男性心目中女性应该具备的勤奋、贤淑的理想品德。女性天生就该属于家庭,属于丈夫,属于孩子,她可以成为任何身份除了她心中真正的自己。因此,与“屋中天使”相对应的“疯女人”形象其实象征着镜子另一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让男性权威感到恐慌,也让珍妮这样的传统女性感到恐惧。小说中珍妮对“我”的不认同并帮助约翰对“我”进行监视实际上表明了女性在内外语境中对自我的双重异化,她们既是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又是自我的“他者”。

显然,珍妮代表的传统女性和约翰代表的男性权威都不是女性主义文本的理想读者。他们不可能理解壁纸真正的奥秘,因为壁纸已经成为一种质疑男权,反抗传统对女性禁锢的隐喻,唯有具有相同认知结构的“我”(也代表着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读者)才能解开壁纸的秘密。

因此,虽然大多数的解读认为小说最后“我”最终进入疯癫的状态,但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视角下却可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我”在最后终于和壁纸后面的女人合二为一,象征着“我”完成了在男性权威中对女性文本含义的独立构建,“我”终于打破了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束缚,从“壁纸”后走入现实的生活。

黄色本是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但是文中壁纸的黄色却是“种极陌生的黄色……它让我联想起一切我见到过的黄色的东西——不是像毛茛那类漂亮的植物,而是些老旧污秽、腐败恶劣的黄色。”<sup>[10]223</sup>壁纸的黄色隐喻着女性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萎缩,女性写作很难在这种受到限制的环境中产出有意义的作品,甚至连她们独立的精神个性都开始走向崩坏。吉尔曼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论述繁琐封闭的家庭生活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她本人也极力想要摆脱这种无形的幽闭,希望到户外去创作、去建立和他人(尤其是女性之间)的社交关系。正如文中的“我”最终和壁纸后的女人融为一体,得以“到了外面,一切事物都是绿色而非黄色了。”<sup>[10]230</sup>绿色和衰败的黄色再次在视觉和心理寓意上形成对比,表达吉尔曼对打破家庭生活束缚和压抑的渴望。

在现实生活中,吉尔曼最终下定决心结束原先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她与丈夫华特协议离婚,结束了“休养疗法”。此后,她热衷写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在各大社会集会进行宣讲促进社会福利、妇女权力等相关议题,并在《黄色壁纸》发表二十五年后

出版了探讨女性乌托邦可能性的著作《她的国》(*Herland*)。吉尔曼已然从身心的折磨和痛苦的逃避中的涅槃,以文字为利刃一点点撕破了覆盖在自己身上的壁纸,重获新生。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黄色壁纸》中,吉尔曼展示了女性话语的缺失和重建的必要性及其对女性突破束缚和压迫的重要意义。而女性主义文体学为《黄色壁纸》提供了一种紧密联系文本的解读方法,使得理论分析得以以文本为依托,从文本最基本的语词构成处切入吉尔曼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之后再从隐喻的选择、生成和发展中分析女性作家对特定意象的关注,揭示出更大层面上女性写作的局限和困境。可以说,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解读下,《黄色壁纸》既是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也是关于女性通过写作与阅读争取自由的珍贵史料。

#### 参考文献:

- [1] Mills S. *The Gendered Sentence*[C]//CAMERON D.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1990:65-78.
- [2] Mills S. *Feminist Stylistics* [M]. London:Routledge, 1995:40,97-164.
- [3] Goodman L. *Approaching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Gender*[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4] E.安.卡普兰.两种妇女乌托邦——吉尔曼和皮尔西的

- 两部小说[C]//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2-116.
- [5] 洪流.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J].外国文学,2006(3):59-64.
- [6] 宋晓萍.公共性和私人性:丁玲前期创作的悖论[J].妇女研究论丛,2004(3):53-57.
- [7] 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0-78.
- [8] 王淑芳.壁纸与疯女人:女性之境:美国《黄色壁纸》文学评论综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5):76-80.
- [9] 王志伟.论女性主义文体研究[J].时代文学,2012(8):142-143.
- [10]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她的国[M].朱巧蓓,王骁双,康宇扬,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205-231.
- [11] 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M].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1-64.
- [12] 张平.文体学中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文体学》简介[J].妇女研究论丛,2008(6):85-87.
- [13] 张平,刘银燕.《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女性在场的缺席[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36-141.
- [14] 张平.女性话语的力量:《同命人审案》的女性主义文体学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54-57.
- [15] 周翔,吴庆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女性主义文体学[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208-209,215.

## The power of writing and metaphor: Analysis of *The Yellow Wallpaper*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stylistics

HE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amous short story *The Yellow Wallpaper* of feminist pioneer writer Gilman is interpreted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stylistics proposed by Sara Mills.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ry-style writing method of this novella and Gilman's ternary identities-woman, female reader and female writer is discussed. The analysis from word selection and sentence level shows women's reading and writing language system are still suppressed by the male authority just like their gender position. Starting from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yellow" and "wallpaper", this paper further reveals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 between women's writing, reading and identity,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female independent expression and its special function in reconstructing female spiritual world and helping the female gain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Key words:** feminist stylistics; *The Yellow Wallpaper*; dairy style; metaphor

(责任编辑:任中峰)

#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中的女性关怀

陈蔚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主旋律。七十多年来,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反思,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彰显。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不仅反思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反人性,还着重探讨和挖掘了女性在战争语境下的生命价值和审美理想。作家通过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肯定。《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西耶维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女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46-07

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三个浪潮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个主题贯穿始终。人道主义主题则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反思而逐步深化。重视人的价值和个性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渐渐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不可忽视的新的思想倾向。然而,作家们对作为战争中的“人”的组成部分和有着独特体验的女性的关注仍然较少。为了书写女性历史、为战争中的女性群体发声,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西耶维奇耗时四年,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苏联女性,让“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口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悲欢离合,表达对战争和生命最原始的感受和看法。作家笔下既没有贯彻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线索,也没有主观的心理分析,只留有女兵们朴实的话语和真挚的情感。《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摘取战场上最为细小的马赛克,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女性战争图景,诠释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苦难。而作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评价既谱写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新篇章,

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 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女性空白

由于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被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两大主题占据。苏尔科夫、列别杰夫·库马奇、西蒙诺夫等为首的一批作家以积极乐观的笔调大力歌颂苏联儿女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痛击法西斯邪恶势力的英雄事迹。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战争开始了苏联文学的新阶段……战斗中的人民在一次次流血奋战中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苏联文学在战争时期成为真正的人民艺术,传递出人民的英雄气概。”<sup>[1]</sup>然而,众多歌颂战争中英雄的丰功伟绩和描绘胜利画面的文学作品虽富有极强的战斗号召力,却难掩自身对战争原因的深层思考和对人物内心情感挖掘的不足,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都有待提升。

在战火平息之后,随着斯大林逝世、第二次苏联

作家代表大会举行和苏共二十大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苏联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的思考逐步深入。以肖洛霍夫的“揭示了普通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sup>[2]</sup>的《一个人的遭遇》为起点,一小部分富有社会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重新审视哪怕被称为“正义”的战争,更多地挖掘战争的残酷性、荒谬性和反人性。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兰诺夫等人一反过去集中描写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喜悦场景的文学惯例,通过书写战争中平凡个体的不幸遭遇,揭示出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身心重创,让人们陷入沉思:当一个个平凡的人为集体、国家献出一切之后,集体和国家又该对他们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尽管从最初的概念化、片面性的框架和大肆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调走向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与肯定,但“从整体上说,战争的英雄主义题材始终被陈旧观念和陈旧的方式反复表达着,尽管有极少数作品对卫国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质疑,却很少有作家全面、严肃、深刻、哲理地重新反思这一场战争以及与其有关的众多理念。”<sup>[3]</sup>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重视程度和挖掘力度与西方战争题材文学相比仍有较大的不足。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的送儿上战场、为孩子日夜祈祷的母亲形象,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照料家庭的妻子形象和对战事一无所知却充满美好希望的女儿形象既反映出俄国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和东正教思想对广大作家的荼毒之深,也体现出人们当下对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境遇所作思考和阐释的不够深入。哪怕是在极少数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里,如瓦西里耶夫的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鼓舞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女性形象的真实感与立体性仍较显单薄。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书中,尽管作家有意将作品的主人公由男兵改成女兵,但由于受男性视阈的局限,作家笔下的女兵的生命逻辑略显生硬和牵强。女性敏感、温柔、娇羞的天性一律被男主人公瓦斯科夫视为与军事操典格格不入的品质,而他对女兵们表现出的爱护有加、遗憾惋惜等态度表面上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实则却体现出其以自我为中心,对女性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作品中隐含的不

平等的男女级差观念使小说在表达人性主题时稍显乏力。而在名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虽打破了以往作家惯于刻画男性英雄和描写场面宏大、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的写作手法,但依旧难逃样板化、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意识和为国捐躯的政治号召使卓娅这一本该灵动有趣的少女形象迷失在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洪流中,成为了“高大全”的典型代表,沦为了政治宣传的强大工具。总而言之,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还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问题。女性在时代剧变语境下所独有的心灵体验与感悟仍是一个问号。在绝对理念的驱动下,作家们忽视了对战争中的女性生存境遇和精神成长的挖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仍存在不少空白。

## 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从俄国文学诞生之初到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蓬勃发展,俄国女性除去作为男性视角下被创造出的空洞能指外,始终未能获得“真实”的解放。随着农奴制废除、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再到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以及苏联国内人权运动的兴起,俄国女性运动一路高涨,妇女们渐渐走出家庭,接受教育,投身社会变革,女性意识强势觉醒。以阿列克西耶维奇、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丽茨卡雅、托尔斯塔雅、托卡列娃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 20 世纪下半叶正式踏上历史舞台,由此打破了俄国文坛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她们从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出发,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自觉地探寻俄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性别意义,逐步丰满了女性符号的语义内涵,彰显出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其中阿列克西耶维奇以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基础上,揭露女性苦难、书写女性史诗的创作手法独树一帜。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看似只是一部战争中的女性的回忆录,实则却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精心构筑的一部反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命运的作品。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冷峻风格详细地描写了苏联女性在战前、战时、战后所经历的种种折磨与苦难,将战争的恐怖与性别压迫的残酷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如阿列克西耶维奇本人所述:“承受苦难是一门艺术,必须承认,女性是有勇气踏上这一历程

的……”<sup>[4]408</sup>

在战前,面对兵力紧缺的困境,女性们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于战场。有不少女兵都是跟随自己的爱人、父亲或兄长的步伐,抛下原本宁静的生活,拿起武器,瞄准敌人的头颅。女飞行员邦达列娃为了追随第一批就上了前线的丈夫,留下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申请作战。狙击手丹尼洛夫采娃则为了和心爱的人一同奔赴战场放弃了成为一名演员的梦想转而学习射击。残酷的战争迫使女性将男性那付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了自己柔弱的肩膀上,走上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她们出于家庭责任感和宗教信仰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道德力量令人肃然起敬,却也同时反映了在父权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依靠和追随男性、甘愿放弃个性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女性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战争中的女性盲目地从“追随”中提炼出一种“幸福”,将与男性同生共死,为男性赴汤蹈火看成精神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

在战时,尽管作家笔下的女性有着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但从她们的叙述里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共同点,即从踏入战场的那一刻起,大多数女兵便下定决心与“自我”中的女性化特质决裂,力图与男兵一争高下,建功立业。女兵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sup>[4]23</sup>;面对战场上男兵们的冷嘲热讽,她们则时刻要求自己:“比男兵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不比男性差”<sup>[4]235</sup>“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sup>[4]62</sup>从表面上看,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对战功的向往体现了女兵们积极上进、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却从深层反映出女性内心深处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生存,才能赢得与男人的“平等”。父权文化虽早已日益丧失了它的外部约束功能,然而它却深深地渗进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引导着她们做出一些非自觉的归顺于父权压迫的价值判断。

尽管女兵们始终秉持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坚定信念,但一些专属于女性的个性却会在战争这个特殊场景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使她们不得不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做出更为惨烈的牺牲。首当其冲的便是母性的撕裂与分离。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论述的那般:“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生存。”<sup>[5]</sup>

对孩子自发的热烈的爱是一切母亲的本能。然而为了完成任务,身为母亲的联络员拉丘卡维奇不得不将战争物资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甚至不惜“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sup>[4]48</sup>以求通过关卡;游击队的女兵切尔诺娃怀着身孕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母性的撕裂给战争中女性的命运添上了一抹更浓厚的悲剧色彩。其次被摧残的还有女兵爱美的天性。在战争中,“不管女人们简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是说到死,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sup>[4]216</sup>对于射手阿赫梅托娃而言,“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士内裤”;<sup>[4]73</sup>洗衣姑娘们则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指甲脱落;步兵斯特洛采娃竟会在同伴不幸身亡后发出惊叹:“她躺在棺材里是那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sup>[4]216</sup>对美的格外关注与追求使战场上的女兵有别于漠视一切、冷静理性的男兵,经历了更多的挑战,深陷在美与摧毁一切美的战争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除了母性和爱美的天性,女兵们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求是她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个性。2013年莫斯科时代出版公司再版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几乎是作者的重新创作……作家把许多曾被报刊检查部门禁止或被迫自我删去的内容发表了出来,率直地写出了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都让人噤若寒蝉的话题,比如战争的残酷,战争中的女兵感情和男女关系……”<sup>[4]441</sup>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爱情常被认为是一种隐秘地被埋藏起来的“糟粕”。女性个人的命运一旦与社会变革力量结合起来,以爱情为代表的女性的个性意识总会被“革命意识”或“民族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描写女兵对爱情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以彰显女性的个性意识,宣扬抗争精神,呼唤个人自由,从而打破了爱情外面罩着的冠冕堂皇的革命主义外壳,用爱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权话语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一系列案例揭露了战争中爱情悲剧的实质:男人与女人对爱情乃至整个人生追求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战争中的女性比男性少了选择,多了负担。不少女兵甘愿为男性铤而走险、放弃自我,而男兵们的感情则显得相对短暂和凉薄。许多男兵为了逃避责任或是保持自我的完整性而竭力挣脱女人意愿的缠绕,战争一结束就抛弃了自己战时的伴侣,另觅他人。男女两性在对感情和人性的理解方面的隔膜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进一步

加深。女兵们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承受着一种绝对的困感和悲凉。

胜利的钟声敲响，女兵们本该在战后迎来幸福圆满的大结局，殊不知，苦难的梦魇却仍不愿离去。男兵们享受着鲜花与荣誉，沉醉于回忆往事，对自己英勇杀敌的传奇故事津津乐道，女兵们却不得不“像鱼儿一样沉默，谁都不承认自己在前线打过仗”，<sup>[4]125</sup>有的女兵甚至会因为佩戴了和男人一样的战争勋章而遭到质疑。战场上的胜利仿佛只属于男性，女兵们则拖着残疾的身躯，神经衰弱，噩梦连连。除了肉体上的伤痛，女兵们的心灵也承受着巨大的打击。战后，男性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她们，只愿与未参军的女性约会、结婚；连那些本该给予更多包容和体谅的同性也对她们大加指责：“女人们就都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用你们的年轻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sup>[4]295</sup>直到过了几十年，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在《真理报》上写到这些孤立无援的女兵，提出她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sup>[4]109</sup>人们才多多少少对这些参与过战争的女性予以关注。残酷的战争使女兵们的内心发生了异化。怯懦与勇敢、绝望与希望、世故与单纯、冷漠与温情，在同一个女兵身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与品格。而战争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给女兵带来的异化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永恒的孤独。这份孤独包含着双重意味，一方面，它触及到女兵的生存和精神处境。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被时间遗忘，化为历史的尘埃使女兵的孤独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女兵自我的选择。面对社会风气的改变，面对人民对战争的看法的改变，一些女兵“不肯脱掉军大衣”，<sup>[4]182</sup>甚至选择以独居的方式反抗异化的社会，拒绝异化的话语，以孤独来表达社会意识形态力图抹煞的女性的个性。女兵的异化与孤独标志着战争语境下女性和个性的双重受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绝非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并未否定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确捍卫了俄国神圣的国土和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但战争的胜利也掩盖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尤其是女人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作为一个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意图消解国家和阶级层面的战争观，通过揭示战争的最广大

参与者，也是最直接受害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无助与无奈，重塑人类共同的战争观，即战争是对个体价值的否定与撕裂，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践踏和扭曲。作家也并非一个眼中只有苦难与不幸的悲观主义者。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看来，苦难与生命的奥秘有着最直接的联系。通过搜集和记录苏联女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苦难事迹，阿列克西耶维奇意图揭示出女兵们所承受的伤痛不仅来自于战争本身，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也是令女兵们陷入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一悲剧性的主题。历史的前进、胜利的到来掩盖了女性的苦难与功绩，浸润着性别压迫策略的文学传统也将鲜花与掌声献给了浴血奋战的男性。阿列克西耶维奇以一种新的艺术真实证实并阐释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未曾书写过的女性苦难，揭示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层悲剧性。

### 三、深切的女性关怀

阿列克西耶维奇以直白的笔触血淋淋地揭开了掩埋在胜利之下的女性之殇。正视历史与伤痛、肯定和赞颂女性在战争中的顽强奋斗和巨大贡献是作家和女兵们的共同诉求。作家从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三个方面入手，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对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平等与爱的世界的向往。

俄国自 19 世纪以来，一大批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文学大师争相涌现、一部部闻名遐迩、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令世人折服。俄国作家笔下那一系列温婉动人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人性的典范的理解，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中国人的理想是智者，印度人是苦修者，罗马人是统治者，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是贵族，德国人是士兵，俄罗斯人的理想则是妇女。”<sup>[6]</sup>然而在千年父权制社会和古老又根深蒂固的东正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俄国女性意识长期处于被压制甚至扼杀的困境。作为现实生活里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的投射，俄国经典文学中为人赞美和歌颂的“理想女性”形象总是具有温顺、忍让、宽恕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到《贵族之家》里的丽莎，再到《活尸》中的露凯丽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一直延续至拉斯普京创作的纳斯焦娜，男性作家往往将笔下的正面女

性人物塑造为精神救赎的化身,在她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审美、宗教和道德理想。“理想女性”大多笃信上帝、乐于奉献、拥护宗教禁欲主义精神。从这些在男性身边总是默默无闻、温顺忠诚的“附庸品”角色身上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女性形象的原初所指即便有过,也被偷换抹煞了……被偷换成物,偷换成雌伏于人的、从属性的‘地位’,或从属性的文化等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劳拉·莫尔维语)。”<sup>[7]</sup>男作家们认同和赞美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本身,而是延续千年的父权文化为女性所规定的职能。

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一个个女性形象已褪尽了俄国传统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完美与柔弱。严酷的战争将人性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弱点与矛盾通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坦克兵、机枪手、火车司机、拖拉机手……战场上的女性不过是一群有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顽强的求生欲望的普通人。她们时而顽强拼搏、英勇杀敌,时而迷惘彷徨、失去前行的方向。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记录战争中一个个极富个性、活泼生动的女性的故事,打破了俄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刻画出一幅光辉夺目的艺术群像。由此,我们对战争中的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的精神状态有了更透彻、更本质的了解。

除了重塑女性形象,阿列克西耶维奇还积极建构女性话语,为战争中的女性争取话语权。依据福柯“话语即权力”的理论,话语和权力不可分割,话语是掌握和运用权力的关键。传统社会中男性牢牢地把持着话语权,建构起各式四处渗透的权力,以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女性在年复一年的沉默中,被驱逐到话语的边缘,沦落至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为了跳出传统男性话语的牢笼,寻找女性话语的重构方式,阿列克西耶维奇首先严厉抨击了传统男性话语的片面与阴暗。她不仅多次在自己的创作摘录中表达了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传统男性话语的不满,还借用女兵之口控诉了传统男性话语的冠冕堂皇:卫生指导员杜布尼亚科夫嘲讽战争影片中穿得整整齐齐的护士形象;冲锋枪手柳步契克则诉说自己对战争书籍和英雄书籍的厌恶;而战地军医扎贝利娜直接使用“虚假”<sup>[4]245</sup>一词控诉传统男性话语操控下的战争书籍和影片。真实的战争远不是一两个男性英雄迅速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的童话故事,而是由一个个女性的“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

肮脏不堪,衣衫褴褛”<sup>[4]51</sup>拼接而成的心酸血泪史。而通过几次穿插不同的女性在接受采访、回忆往事时被身旁的男性打断、指正甚至责骂的细节,阿列克西耶维奇揭示出凌驾在战争这一阴性名词之上的男性霸权。

接着,作家积极响应法国女思想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提出的“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号召<sup>[8]</sup>,以女性的身体为载体来描写女性在战争中的独有的体验,打造出属于女性的经验世界,从三个方面解构了俄国文学传统的男权话语体系:阿列克西耶维奇先是毫不留情地扒开男权制度为男性打造的强权铠甲,通过塑造一系列比男性更勇敢和进步的女兵形象和穿插战场上女救男的情节,犀利地揭示和嘲弄了一部分男性自身的虚伪、软弱和无能;其次,作家采用与大多数男性作家史诗性、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把目光集中于女性私人的生理和心理世界,将女性意识隐藏于字里行间,以充分的个人化、碎片化、情绪化和反逻辑化叙事实现了对男作家严肃、理性的叙事方式的解构。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有在战场上第一次经历初潮却误以为自己受伤了的少女侦察员汉吉穆洛娃,有虽然饥肠辘辘但仍把鸡蛋打碎用来清洗靴子的工兵排长沃尔科娃,还有偷走男兵衬衫用作女性月经用品的通信兵卡贝尔达。

通过挖掘这些独特而私密的女性经验,作家将女兵们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而通过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描写男性的一举一动,则将战场上男性的真实行为与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阿列克西耶维奇由此又解构了以往男性作家笔下男性士兵趋向英雄化、模范化却苍白无力的创作规范,将男性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活和立体;除此之外,阿列克西耶维奇还描写了大量女兵之间的同性情谊以解构传统的异性爱情神话。在小说中,男性并不是女性获得精神满足和实现自我成长的唯一源泉,同性间的相互扶持和鼓励是女兵们积极向上,英勇作战的不竭动力。在骑兵连一起担任卫生指导员的瓦西里耶夫娜两姐妹相互扶持、齐心协力,在战火中分离又重逢的故事感人至深;而对被盖世太保迫害致死的女性战友们充满敬意的地下工作者维列夏克时刻不放松警惕、英勇奋战;柯娜柯沃城五姐妹在战场上一同出生入死,最后却只有维什涅夫斯卡娅得以存活。而她自己独活的意义便是给后人讲

述那几位亲如姐妹的战友的故事。尽管战争的黑暗与残酷令闻者伤心、听者落泪,但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对极端环境中美好人性的挖掘与讴歌和女性群体自强不息的美好品质的描写,从谴责暴力、反思战争的基本思想上升到了关怀生命、关怀全人类的高度。女性人物在苦难中的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毅力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再次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与阿列克西耶维奇设想的不同,苦难与血泪并未带给女兵自由,反倒成了束缚她们的枷锁。在接受作家的采访时,有的女兵不愿回忆往日的辛酸历程,生怕再次陷入痛苦的泥沼、难以自拔。有的女兵则选择美化过去,如做公开的演讲般“将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sup>[4]101</sup>甚至有时从同一个女兵身上,作家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阿列克西耶维奇对尊重和敢于回忆的女性持肯定态度,赞扬她们珍藏过去的相册、保留战争留下的勋章的做法。而对那些“企图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换和替代生活本身”<sup>[4]101</sup>的叙述人,作家则通过运用不同的谈话方式、设置不同的问题等方法引导她们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归最真实的自己。被采访女性在回忆往昔的过程中反复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阿列克西耶维奇对女性历史的寻找与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同步展开、相辅相成,女性在战争中的精神成长轨迹和伟大功绩愈加明晰。而在帮助女兵们“除掉无用的岩层,找到闪光耀眼的金子”<sup>[4]86</sup>之后,作家又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选择、人物及其叙述的筛选和排列、角色和环境的统筹和描写等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战争中的女性的精神谱系,将战争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自我的成长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既是一部女性心灵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战争与女性的关系的演变史。通过追溯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变迁,阿列克西耶维奇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肯定与赞美之情,对战争的残酷和顽固的父权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抒发了对爱与平等的向往与呼唤。

一直以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男性士兵饱含关注和关怀,却遗忘了正是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才诞生了一批新的阴性名词。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解构了传统的男性话语,为女性发声,并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故事汇聚成了一部英雄史诗。《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以对战争中的女性的深切关怀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长廊中熠熠生辉。

#### 四、结 语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植根于世世代代俄国人的记忆之中。七十多年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创作历久弥新,展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越来越多的俄国作家逐渐超越民族文化和阶级立场的视点,崇尚人性,敬畏生命,发掘蕴藏在普通个体身上的美好价值。阿列克西耶维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文学传统,运用“阴性书写”,结合女性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经验,向前更进一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在战争与父权制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女性群体,对战争发出了更为深刻的质疑与责问。正如瑞典文学院写给她的颁奖词一般:“她的多声部书写,是纪念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sup>[9]</sup>

作家笔下鲜见宏大的枪林弹雨,多是女兵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强调平凡与伟大的统一,女性与人性的和谐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最终诉求。作家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为战争中女性争取言说权利的尝试,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 参考文献:

- [1] Толстой, А. Н. Собр. Соч. В 15 Т. Т. 14 [М]. Моск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0: 346.
- [2] 吴萍. 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嬗变 [J]. 俄罗斯文艺, 2015(1): 62-67.
- [3] 张建华. 战争英雄神话的消解: 后苏联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中的思想向度 [J]. 外国文学, 2010(5): 39-48.
- [4]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 [M]. 吕宁思,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 [5] 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550.
- [6] Рябов, О. В.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софии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0 (3): 28.
- [7]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1.
- [8]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88.
- [9] Nobel Media. Svetlana Alexievich-Facts. [EB/OL]. [2017-12-31].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5/alexievich-facts.htm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5/alexievich-facts.html).

## Deep concern for woman in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War's Unwomanly Face*

CHEN Weiqing

(School of Russ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Nationalism and heroism are the main themes of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As Russian writers have comprehensively rethou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s and huma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has been shown in more literary works. In her *War's Unwomanly Face*, 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 not only reflected on the cruelty and anti-humanity of the war, but also explored women's life values and aesthetic ideals under the context of war. The author expressed her deep concern and high affirmation of women in war through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shaping mode, reconstructing female discourse and composing female spirit. The work *War's Unwomanly Face* fills in the blanks of female history in Soviet Union's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and lifts the humanitarian spirits embodied in the literature to a new peak.

**Key words:** *War's Unwomanly Face*; Alexievich; the Soviet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woman

(责任编辑:任中峰)

# 新阶段“东向政策”下印度-东盟关系 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对策

曾泳心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新阶段“东向政策”下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全面得到深化,从地区格局变化以及地缘因素考虑,印度—东盟关系的强化将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产生双重影响。中国既要认识到中国—印度—东盟三者关系仍然是以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为主流,同时亦要认真研究印度—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猜忌进而可能存在着牵制中国的意图。因此,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妥善预防和规避这种风险。

**关键词:**东向政策;印度-东盟;中国;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 K35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53-07

地缘政治视角中,地缘政治格局及特征变化是基于地理环境的动态性质,其中包括气候变迁、资源转移、产业变化、人口及资本流动。<sup>[1]</sup>印度与东盟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及文化联系,当前在“东向政策”的框架下两者的关系实现全面深化。新阶段“东向政策”运行的地理范围由南亚-东南亚扩大至更为广泛的亚太地区,印度与东盟的相关活动一定程度改变了区域格局。而与此同时,印度-东盟关系的变化及对地区格局的作用将对作为近邻的中国产生双重影响。当前中国正处和平崛起关键时期,更新周边环境形势变化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角度,本文尝试探讨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加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并提出解决方案。

## 一、新阶段“东向政策”

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为吸引外资进而缓解经济危机推行了“东向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强与东盟的经济往来。在“东向政策”的帮助下,1993—2003年间,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由29亿美元提升至121亿美元。<sup>[2]4-5</sup>印度藉此迅速扭转了经济危局。因此,印度历届政府对这项政策保持着较好的延续性。随着地区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变化,印度

开始对这项政策进行调整。2003年,时任外长亚施旺特·辛哈宣布“东向政策”步入新阶段,其内容与此前有着显著区别。新阶段合作对象仍以东盟为核心,并拓展至澳大利利益及中国等东亚国家。具体合作领域也从纯粹的经济问题转向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尤其重点加强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及建立自由贸易安排方面的合作。<sup>[3]</sup>新阶段“东向政策”存在以下明显的战略性转变:

第一、政策被提升至战略高度,并作为印度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向政策”由原先短期的、被动的政策转变为具有长期规划的、主动的战略。相较于90年代印度政府将“东向政策”作为突破经济与外交困境的试探性政策,新阶段印度政府在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不断对此政策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更好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布局,甚至在外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将其视为对外战略的主要支柱之一。

第二、亚太地区战略地位凸显,印度意图在该区域发挥重大影响。基于对自身国际地位、角色的认识与现实的需求,亚太地区显然是未来印度实现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地缘依托。而东盟占据亚太地区重要的地缘位置,东盟围绕自身所建立的系列合作机

制为印度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提供关键的平台。由此,印度借助“东向政策”而规划出南亚-东南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突破路线。

第三、不再满足于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及安全领域的份额开始提升。伴随国力提升,印度渴望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追寻世界性大国地位。因此,仅限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已难以满足印度的需求。而在新安全形势影响下,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保障自身安全并维持稳定的外部合作环境,印度必然需要与相关区域组织和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

第四、重视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并与之在东盟地区展开竞争。中国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不断突出,当前印度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即使在综合国力方面印度难以与中国匹配,难以谈及进入东南亚地区能从根本上遏制中国。但两国同时作为东南亚地区邻国的地缘事实导致了两国平行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竞争。<sup>[4]</sup>

2014年,莫迪政府宣布对“东向政策”再次进行强化和升级,称为“东向行动政策”,在主要内涵未改变的情况下,意在通过东盟为跳板更为积极的参与到亚太地区的合作当中。实际上,这表明“东向政策”为印度带来多方面的实质性利益,印度政府将长期依赖于此项战略。因此,值得中国重视并将其长期置于研究视野当中。

## 二、印度-东盟关系现状

通过新阶段“东向政策”的发展,目前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加强与深化。双方全方位的合作呈现出多、双边相结合,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多轨并行的特征。

### (一)政治合作

新阶段印度-东盟政治合作主要呈现几个特征。其一,互相借助对方影响力。东盟围绕自身为核心,建立包括东亚峰会、“10+1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这为印度进入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舞台提供重要的平台与介质。而基于印度的崛起速度与增长潜力,东盟希望印度能够平衡东南亚地区各方力量。同时,东盟整体化日渐加深,对国际地位与角色产生新的要求,增加与地区大国互动可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二,双方合作保持多、双边模式。印度与东盟长期维持和平、进步、共同繁荣的伙伴关系,并定期更新双方合作行动计划纲要,以应对不断变幻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2012年,印

度-东盟宣布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两者合作步入新阶段。而不仅如此,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新加坡在接洽印度参与东盟地区合作上发挥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东盟国家利用大国支持,希望主导东盟地区事务。这从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与东盟关系不断升温可见一斑。<sup>①</sup>

### (二)经济合作

发展经济贸易合作仍是新阶段“东向政策”的核心内容。相比以往,经济合作的方式、时效及空间距离具有较大的提升。首先,推进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启动建立自贸区(FTA)的进程,更加开放地接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利用更加稳定的合作机制增强经济安全,推进经贸发展。<sup>②</sup>而印度也及时抓住区域经济一体化契机。2003年10月,双方签订《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意建立印度-东盟区域贸易和投资区,着力在货物、服务和投资领域实现自由贸易。此后在2009签订了《货物贸易协定》,这几乎连接了18亿人口、GDP总值4.6万亿美元的综合市场,超过90%的产品实现贸易自由化,4000种产品将免除关税。<sup>[2]</sup>2015年,双方签订《服务与投资自由协定》,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收效显著。其次,加强区域间互通对接。在双方领导人看来,改善和构建地区间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益,往往要比降低关税大得多。<sup>[5]</sup>新阶段印度-东盟在增强区域连接方面做出诸多实质性动作。例如,加快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与印度-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一路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同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到铁路及物流网络构建。此外,发展海运物流网络与海事服务也是重点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缅甸作为“东向政策”通向东南亚的“金色大门”正引起印度较大的重视。印度及时调整对缅政策并

<sup>①</sup> 在这期间,印度与东盟关系进展明显。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署《印度-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加入东盟《联合反恐合作宣言》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多次会议中东盟国家领导人欢迎印度与东盟国家加强联系。参见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3-2005 [R].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2014.

<sup>②</sup> 张蕴玲的研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投资-贸易网络使东亚经济体联系起来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而自贸区的建立是东盟寻求在经济方面的机制建设,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东盟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一体化安排,而是带有综合功能的经济合作机制。参见张蕴玲. 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J]. 当代亚太, 2008(1).

加大对缅甸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东盟则乐于接收外部资源以尽快推进东盟地区一体化,着力实现内部平衡发展。

### (三)防务安全合作

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是印度-东盟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与海盗,维护东南亚海域航行安全。首先,反击恐怖主义威胁。2015年美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全球恐怖主义索引》中,印度排名第6位,而泰国、菲律宾分别排在第10、第11,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sup>[6]</sup>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与组织的严密性导致打击难度增大,印度与东盟对此保持长期性合作。2003年,双方签署《联合反恐宣言》加强情报交流和信息共享。同时,两者在东盟地区论坛当中频繁交换经验,双方的反恐演习已形成常态化、机制化。其次,打击东南亚海域海盗。由于马六甲海峡及其他东南亚海域海盗猖獗,严重影响印度与东盟间的经贸合作与航行安全。因此,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与巡逻成为双方的常规性手段。例如,印度与印尼在安达曼海域常年保持一到两次的联合巡逻。

### (四)社会文化合作

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与东盟文化相互交融,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前双方的社会文化合作水平较高,主要涉及自然灾害管理与紧急状况处理、环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健康与疾病防御、教育与文化、人员交流等方面。双方在官方及民间层面俱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例如,2007年印度向东盟发展基金捐献1亿美元,用于鼓励开发双方的社会合作项目。2012年11月印度东盟在雅加达举办印度-东盟文化之夜,开展文化、艺术、宗教交流活动,旨在加强双方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特别要提到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环境等问题的解决机制,印度多次表示对东盟所成立的社会文化部门的尊重和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到其中。

## 三、印度-东盟关系加强可能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印度-东盟关系在新阶段“东向政策”的框架下突飞猛进,从地区格局与地缘角度考虑,中国的外部环境将会受到双重影响。一方面,地区格局力量对比因印度-东盟关系的加强而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同时,作为中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两者关系加强也为中国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基于印度

与东盟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两者对于中国的崛起仍然保持着怀疑、防备的态度,其关系的加强可能有着联合牵制中国的意图。考虑到印度与东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因此,根据印度-东盟的利益判断,在不与中国产生正面对抗的基础上有限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并在地缘安全、南海问题等领域对中国施加一定压力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第一,印度“大国战略”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在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存在利益契合点。面对中国的崛起,印度《不结盟2.0》报告中提出,印度未来的对外战略与安全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影响力将会严重地冲击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sup>[7]</sup>而东盟方面则认为印度是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关键力量,对于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就东盟而言,各国俱是根据本国利益制定对印政策,但平衡中国的意图不尽相同,因此与印度需求一拍即合。2015年,莫迪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重申“东向政策”的升级,而作为回应,印尼副总统优素福·卡拉表示:“希望东方(中国)与西方(印度)能够实现更好的平衡。”<sup>[8]</sup>印度对于大国地位孜孜以求,其希望在东盟地区与中国展开竞争,大幅扩大在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影响力。而东盟认为多元化合作将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弱化潜在的“威胁”。针对于此,中国面临如何与印度在东盟地区实现合理竞争合作的难题。同时,在中国-印度-东盟三方关系中,中国如何调整角色定位也触及能否妥善处理中印及中国-东盟关系。

第二,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军事防务合作加强,可能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压力。例如,印越双方都疑虑中国的崛起,以期通过双方紧密的军事合作换取自身的安全。延续冷战时印越关系,越南得到印度的高度重视,印度视越南为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消减中国影响力的重要筹码,双方的防务关系已深化和扩大到防务合作的所有领域,包括军工产品生产。<sup>[9]</sup>2016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越南时宣布向越南提供5亿美元贷款,用于两国间的防务合作。<sup>[10]</sup>显然,印越对于认为应合力应对“中国威胁”已在军事领域做出较多举动。而越南作为中国邻国,因其对中国的认识不足与防备之心,并被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筹码,将对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不和谐因素。

第三,印度插手南海问题,对南海问题复杂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4年,印度与越南两家油气公司签署南海两个区块油气资源的勘探协议,越南石油首席执行官杜文后称:“这个协定将为印越扩大

越南其他近海区块的合作铺路”。<sup>[11]</sup>2015年,印越签署了《2015—2020年印越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旨在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和军事训练活动。不仅如此,印度还与印尼等东盟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意图给中国施加压力。一方面,印度与东盟国家开采南海争议区块油田有损中方正当利益和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印度试图以插手南海焦点事务而扩大国际影响力,使得南海问题复杂化程度加深。尽管印度现今在南海问题上仍处于敲边鼓的状态,并不急于像美国意图全面插手,但其在南海的举动将对对中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 四、中国面对印度-东盟关系 加强潜在挑战的对策

在印度-东盟关系加强并有可能对中国形成挑战时,中方应未雨绸缪,秉承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框架下妥善预防和规避这种风险。鉴于印度对华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印政策以保持平稳为主。而东盟作为三方关系的中轴,将是处理三方关系的关键。因此,中国应更加拉近与东盟的距离,将这组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根据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现状,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 (一)以经济手段拓展中国-东盟经济关系

1. 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扩大在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的基础设施现状已难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通讯网络、电力以及交通设施建设的缺口无法匹配东盟国家的发展速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5—2016》,在全球基础设施排名中除新加坡、文莱与马来西亚排名靠前,剩余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排名均不理想,并且在这份榜单中印度也仅仅排在 81 位。<sup>[12]</sup>东盟共同体正式建立后,促使东盟各国加快实现东盟内部互联互通的步伐。而目前印度在基础设施存量上“自身难保”,尚且无力深入涉及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依靠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投资建造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比印度更有技术和基金优势,可以争取投资建设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 1%,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1%。<sup>[13]</sup>如此一来,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中国在更高水平上与东盟展开经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在东盟的经济话语权。

2. 主动承担地区经济发展大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诚然印度与东盟在各层级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取得进展,但与中国相比,其与东盟的贸易体量还相距甚远。当前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仍有大量的分歧和矛盾亟待解决。而反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启动 6 年,双方在经贸方面优势互补,已在长期合作中建立了一定的默契并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为满足扩大贸易的需求,双方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完成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并签署升级《议定书》。<sup>[14]</sup>2017 年,中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前 5 个月贸易额达到 1956.6 亿美元,大幅增长 16.2%。<sup>[15]</sup>显然,中方应对与东盟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保持关注,及时更新落后的协定、合作机制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贸易体量及要求。

此外,除了保持对贸易形势更新的警觉外,我们还应注意地区经济逐渐加强的一体化趋势及东盟在此方面的新需求。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被视为其共同体的主要支柱,东盟重视推进其内部及与非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举措。而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承担拉动增长的重任。<sup>[16]</sup>因此,中方应加强利用其所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发挥在整合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强大综合能力,进一步强化对于东盟的经济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如此难得的机遇,应加快推进与沿线国的接洽与具体项目的落实。

##### (二)以安全合作巩固自身权益

1. 加强与东盟军事互访和高级将领会晤,谋求共同安全

东盟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军事实力的上涨常常处于忧虑和防备状态,军方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不足。中方应增进与东盟的军事交流,加强与东盟国家军方的战略互信。2014 年,“海上合作——201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中国青岛举行,该演习由中国主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举办,旨在推动各国海军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务实合作,为及时应对日益突出的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打下牢固基础。2016 年 11 月,中国海军赴新西兰参加东盟海上安全演习;2017 年 5 月 6 日,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胡志明市进行友好访问。诸如此类能够增进双方关系的活动中中国应积极

地承担和参与。关于共同安全,中国-东盟俱有诸多共同利益与可实现基础。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之一,东盟希望利用东盟部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10+3 机制”、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保障东盟地区及其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sup>①</sup>而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愿与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绘就睦邻友好的美好蓝图”。此举旨在加强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同安全。<sup>[17]</sup>基于两者在共同安全的需求与愿望,推进安全共同体建设将是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实质性提升。<sup>[18]</sup>而涉及构建安全共同体面临诸如南海问题、个别国家利益、传统安全思维等困难,国内学者认为加强共同安全观宣传推广、促进合作领域由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以及加强安全交流等手段可发挥重要作用。<sup>[19]</sup>

## 2. 坚定中国立场,掌控南海问题主导权

南海争端时至今日仍然悬而未决,域外国家的介入是重要原因。前文提及印度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在南海的举动影响南海争端的解决,针对于此,中国仍应坚持“双边机制”解决争端,与南海主权国进行双边谈判。而在涉及具体行动上:第一,扩大海上巡逻范围和频次。中国的永兴岛在南海区域中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其面积足够用于建造广阔的军用机场和军用港口并可控制周边辽阔的范围。中国可以永兴岛为基地加强巡逻,对印度和东盟国家制造威慑,回应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联合军演。第二,加强南海巡航抑制非法取油活动。越南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占领万安滩(越南称为思征滩)建立油井进行非法油气资源开采。2012 年,中国海监南海总队南海定期维权时共发现了在中国南海管辖区域内共有外国非法油气平台 30 余座。<sup>[20]</sup>为保障南海资源不被非法窃取南海资源,中国方面的战机、潜艇、海监船应制定合理巡航方案,增强威慑。第三,将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作为维权资本。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越南与马来西亚分别花费 5 年和 30 年时间在南海区域修筑 60 亩土地,而中国仅在 18 个月内就修筑了 3000 多英亩。<sup>[21]</sup>中国以遵循南海各方宣言为前提,扩大了美济礁、永暑礁和渚碧礁等岛礁的面积,其建设活动主要是为了改善驻岛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sup>[22]</sup>但尽管如此,中国如此高效的建设还是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坚定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2015 年度《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中披露:“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最终会在这些修筑过的岛礁建设什么,但可能包括港口、通

信和监控系统、物流支持和至少一个机场。”<sup>[23]</sup>可以肯定,中国当前的填海造陆潜藏着巨大的军事潜力。基于对中方实力的忌惮,印度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势必有所顾虑,将会更加谨慎地做出决策。

## (三)以文化软实力强化中国-东盟关系

印度与东盟互动之时,印度政府积极运用印度与东南国家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诸如民主政体、宗教、哲学传统等是印度所具备的丰富资源。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两者文化存在共同的理解,在传统友谊方面中国并不落印度下风。东盟至今对中国存在防备的心理,一定程度上表明双方的了解仍旧不足。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将周边外交提至与大国外交并重,且尤其把东南亚作为当前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和急务。<sup>[24]</sup>仅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还不足以保证双方在不断演变的国际、地区关系发展中保持稳定。通过促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作为双方关系的基础,有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长期性发展。除了在外交政策上开拓与东盟的关系,中国还应从加强文化交流入手。

首先,找寻合理利用华人华侨群体力量的途径。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人口数量巨大,他们同时熟悉掌握母国与居住国的语言文化,许多华人华侨事业有成,在东南亚当地有着广泛的政商关系与社会人脉网络。<sup>[25]</sup>故此,中国国务院侨办、商务部、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与华人华侨群体建立联系,商洽如何高效推动中国与东盟更深层次的合作。其次,积极落实好中国向东盟国家承诺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鼓励东南亚学生到华留学。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双方的理念,能够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桥梁。再次,广西、云南等省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区域内部合作,共同发展。广西南宁在承接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各式交流项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和变通能力,有利于双方合作更加有效地开展。国家软实力在国家关系发展中所承担的任务愈来愈重,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中国与东盟同处中华文化圈,两者的传统友谊是双方文化合作的有机土壤,增强文化交流将持续推动东盟国家以更加开放、信任的态度对待中国。

① 参见 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R].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 五、结 语

与旧的东向政策不同,新阶段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加强是基于双方利益基础上各取所需,印度力图扩大影响力进而实现大国梦,而东盟则为了保持东南亚地区稳定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地缘位置接近的中国势必受到印度-东盟关系发展的影响,及时研究这两者关系加强对于中国可能出现的“弊”以尽早防御,这样方能帮助中国建立起和平、稳定的地区崛起环境。但中国还应认识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乃是三者关系的主流,在面对可能存在的挑战时应把握好分寸,从实际意义上帮助亚洲实现共同繁荣。

### 参考文献:

- [1]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 严春松, 译. 上海: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11.
- [2] The ASEAN Secretariat. Overview ASEAN-India Dialogue Relations[R].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1.
- [3] Shri Y S. Remarks by Shri Yashwant Sinh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of India at the Plenary Session Second India-ASEAN Business Summit[EB/OL]. (2003-09-04) [2017-11-28].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4843>.
- [4] 孙现朴.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 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J]. 南亚研究, 2012(2): 66-84.
- [5] 张蕴玲. 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J]. 当代亚太, 2008(1): 4-20.
- [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R]. Sydney: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5: 10.
- [7] Khilnani S, Kumar R, Mehta P B,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R]. New Delhi: Penguin Viking, 2012: 7.
- [8] 新华网. 莫迪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 意在遏制中国影响力[EB/OL]. (2015-11-21) [2017-01-1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21/c\\_1284532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21/c_128453240.htm).
- [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15-2016[R].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2015: 35.
- [10] 环球网. 印度越南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EB/OL]. (2016-10-12) [2017-01-10].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10/9509951.html>.
- [11] 新华网. 越南将两块南海油田承包给印度[EB/OL]. (2014-09-16) [2017-02-10].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9/16/c\\_126991264.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9/16/c_126991264.htm).
- [12] Schwab K.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1016[R].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10.
- [13]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 [R]. Washington: WorldBank, 1994: 1-10.
- [14]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中国与东盟结束自贸区升级谈判并签署升级《议定书》[EB/OL]. (2015-11-23) [2017-10-15].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dm/chinadmnews/201511/29456\\_1.html](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dm/chinadmnews/201511/29456_1.html).
- [15] 新华网. 中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EB/OL]. (2017-07-11) [2017-10-15].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7-07/11/c\\_129652045.htm](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7-07/11/c_129652045.htm).
- [16] 中国外交部.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5-11-16) [2017-02-15].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15054.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15054.shtml).
- [17] 凤凰网. 习近平: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EB/OL]. (2013-10-03) [2017-11-28].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jipingapec/content-3/detail\\_2013\\_10/03/30059002\\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jipingapec/content-3/detail_2013_10/03/30059002_0.shtml).
- [18] 阮宗泽. 中国东盟关系的点睛之笔[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10-07(1).
- [19] 李洪才, 杨光海. 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J]. 和平与发展, 2015(2): 15-26.
- [20] 中国新闻网. 中国海监南海总队巡航发现 30 多座外国油气平台[EB/OL]. (2012-03-20) [2017-02-10].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3-20/3758715.shtml>.
- [21] Erickson A S, Bond K.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Why China's Huge Dredging Fleet Matters[EB/OL]. (2015-08-12) [2017-02-12].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south-china-sea-beyond-why-chinas-huge-dredging-fleet-13562>.
- [22] 中国外交部. 2014 年 9 月 9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 (2014-09-09) [2017-02-12].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189387.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189387.shtml).
- [2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1-4.
- [24] 周桂银.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J]. 东南亚研究, 2017(1): 75-91.
- [25] 江峡. 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依靠海外华人华侨发挥新作用[C]//邱少华. 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务办公室, 2015: 8.

##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dia-ASEAN relations to China under the “Look East Policy” at the new stage

*ZENG Yongx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has been deepened comprehensively under the “Look East Policy” in the new stage. The strengthening of India-ASEAN relations will have a double effect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in view of regional pattern changes and geopolitical factor. China should realize that China-India-ASEAN relations are still based on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seriously study India-ASEAN’s suspicion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may contain the intention of containing China. Therefore, China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in the premis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o properly prevent and avert this risk.

**Key words:** Look East Policy; India-ASEAN; China;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任中峰)

# 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

鲁知先

(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杭州310000)

**摘要:**传统民间手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自然与人生的对话中积累下的文化瑰宝,但在时代与社会的变革中,我国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文章从内部原因、外部冲击与时代变革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手工艺产业发展的局限,并针对其局限性从政府支持、教育提升、科技进步、品牌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同时,从区域公用品牌的角度讨论了传统手工艺营销的可能性,为传统民间手工艺产业的复兴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民间手工艺;传统文化;市场营销;区域公用品牌

**中图分类号:**J528;F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3851(2018)02-0060-06

在我国传承数千年的璀璨文化中,建立在发达的农耕文化与手工业基础上的手工艺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技法与作品,不仅是经济文化的象征,也是当地人民最独特的记忆。在人性断裂的工业文明时代,传统手工艺是复归人性的最佳方式之一<sup>[1]</sup>。手工艺,即“以手工劳动制作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工艺美术”<sup>[2]</sup>。我国手工艺品样式与类别纷繁复杂。手工艺品按照行业分,有雕塑、印染、刺绣、编织、陶器、剪纸、风筝、皮影、木偶、首饰、服饰、年画等;按社会属性关系分类,主要分为宫廷手工艺、民间手工艺与民族手工艺;按历史范畴分类,则主要分为原始社会手工艺、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手工艺。

## 一、传统手工艺发展现状

在当代,传统手工艺是指新石器时代至前工业时期开创制作的手工艺<sup>[3]</sup>。按照产品价格,传统手工艺品又可分为高档品与实用品。高档品即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与收藏价值的手工艺品;实用品则更加普及,价格比高档品低,多出现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sup>[4]</sup>。

在民间,手工艺技法与相关知识如工序、标准、

秘诀等,多通过父子、师徒之间以作坊等形式一脉相承<sup>[5]</sup>,流传文本较少。按照撰写者意图与身份划分,传统手工艺的留存文本主要分为官方规范文本、工匠述录文本与文人研究文本。官方规范文本代表,如《考工记》,代表着传统手工艺最高水平;工匠述录文本一般只流传于专业手工艺人之间,外行难以接受与理解;文人研究文本为将文人情趣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作品,是流传范围最广的手工艺文本,代表作有《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sup>[6]</sup>。2008年第一次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显示,全国普查的1881种工艺美术产品中,发展情况良好的为998种,占总数的52.23%,其中生存困难的535种,已停产的114种<sup>[7]</sup>。

对于我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的现状,学界观点颇具争执。一种观点认为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不容乐观,正在逐渐消失;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手工艺已经开始转型<sup>[8]</sup>。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简单地用以概括我国手工艺发展现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贫富差距显著,经济发展方式也多有不同,所以不同地区、不同品类的手工艺发展现状差异悬殊。有些地区的手工艺,比如赣南客家的香包、绣鞋、漆器等,由于产品实用性在现代社会中严重下降,审美趣味又跟不上年

轻人步伐<sup>[9]</sup>,虽然历史悠久产品丰富,也难逃没落的境遇。而在天津,以任金生为代表的毛猴手艺人,将毛猴与天津六、七十年代城厢老院,小品《不差钱》等故事相结合,创作出了不同系列反应现代生活与情趣的作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sup>[10]</sup>,将天津毛猴的创新发展引向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不同的手工艺传承人,不同的地区政府与专业机构会为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力开展,手工技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振兴传统工艺”列为国策,彰显着人性与个性的手工艺品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开始扮演起独特而重要的角色<sup>[11]</sup>。

## 二、手工艺发展局限原因

虽然在近年传统文化热潮下,通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扶持及一批手工艺从业人员与爱好者的努力,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与我国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模式等诸多原因,手工艺产业弘扬、发展的局限性依然不容小觑。

### (一)内部原因

我国传统民间手工技艺大多以父子、师徒形式一脉单传,核心技术均属秘密不会外传。而且学徒学习周期很长,多为边学边做。虽然传承人技艺学习基础扎实,但从入门到出徒大多需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成本过高,必然会导致技艺传承与发扬面临困难。同时,很多民间技艺如烧陶、柳编等,对当地气候、原料等因素有很强的依赖性,大部分有经验的匠人都久居故土,生活与当代都市距离较远,教育水平与思维眼界也相对局限<sup>[12]</sup>,导致作品的审美与创意水平难与时俱进。很多作品只是对固有传统纹样进行模仿与重复,与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的喜好脱节。手工艺品的供给情况无法适应现代消费观念和需求的变化。

同时,由于国家教育经费对于工艺美术项目投入不足,行业内获得国家全额拨款的教育单位仅占14.7%,导致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水平偏低<sup>[3]</sup>。尤其改革开放后,国内艺术院校大范围引进国外现代化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与我国传统手工艺相分离。习惯了计算机设计的学生很难认真投入到手工艺的学习与创作中去。

现在早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宣传与营销在任何行业、领域均有其必要性。而传统的手艺人往往只是埋头苦干,对当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知之尚浅,而且单人或者单个作坊的效率较低,产品无法批量生产,产品虽然制作精美富有历史文化价值,却很难培养高忠诚度的固定消费群或形成大规模市场影响。

### (二)外部冲击

首先,现今各大旅游景区已成为民间手工艺品的主要销售平台之一。很多景区为了创收,盲目地将手工艺品甚至是打着手工艺旗号的工业制成品打上旅游纪念品的标签,无视传统手工艺品本身的文化内涵与故事特性<sup>[13]</sup>。这种行为无形中便降低了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品位。而且由于部分不法商贩的存在,手工艺市场山寨现象泛滥,粗制滥造产品众多,价格机制混乱,产品质量监管匮乏,市场环境亟待改善。

其次,现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审美趣味也随之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普及,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也早已“工业化”。传统手工艺品与工业制成品相比,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先天不足。而且作为反工业化代表的传统工艺美术艺术风格与现代的室内装修风格<sup>[9]</sup>、服装配饰风格等经常难以搭配。即便某些单品的审美价值可以被消费者肯定,也会因与大众生活的脱节而难以激发更广大更长久的市场需求。

随着市场结构变化,部分手工艺传承人为了开拓市场增加利润,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以安徽黄岗柳编为例,2016年区域产业已实现产值50亿元,但绝大部分产品均销往欧美市场,国内市场几乎无处寻觅黄岗柳编的身影。增收纵然可喜,但此类经营模式会直接导致产品设计为满足外国消费者喜好而丧失本土韵味,虽然产品数量得到了扩大,但实际上文化却产生了断代。

### (三)时代变革

民间手工艺最初源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可被视为艺术品,但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实用价值。但随着时代变革与科技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很多曾活跃于百姓生活中的手工艺品都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失去了生存根基。例如,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州米塑艺术,源于宋盛于清,常见于婚庆、祝寿、建新房、祭祀等活动<sup>[14]</sup>,但随着现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婚庆祭祀等习俗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巨大改变,

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西式的婚礼庆典,同时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被大大弱化,所以米塑的市场自然也会随之萎缩。

再者,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自然环境变化,民间手工艺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渐萎缩。随着某些地区手工艺需求的萎缩,经营情况恶化,原本依靠手工艺品为生的村民纷纷进入城市打工,放弃了手工艺生产。从业人员流失与原材料缺失直接导致手工艺品生产难度与生产成品加大,进一步威胁着手工艺产业发展。

此外,市场化的今天,无数手工业者不得不在市场与初心中纠结。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中,各类明目的挑战下,不免会有很多作品在妥协中失去了原有的味道<sup>[15]</sup>,也丧失了传统手工艺的核心价值与发展机会。

### 三、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路径

####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政府可为传统手工艺提供更多经济支持,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努力完善专利、商标的注册与保护体系。此外,政府可参考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成立专业的协会与生产合作社等组织,为手工艺发展提供专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支撑<sup>[3]</sup>。

老艺人是传统手工业传承的根基。很多民间手工业技艺流传至今只有几位老艺人可以完整掌握。政府应对老艺人进行积极有效地保护,给予生活、医疗、创作等多方面的扶持<sup>[16]</sup>。组织培养年轻传习人队伍,并鼓励面临手工艺传承危机的老艺人将经验知识进行书面化整理,改变手工业“不立文字”的传承模式,阻止失传现象的发生。

此外,作为当地特色手工艺对外传播窗口的旅游景区,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对景区手工艺销售与宣传情况进行整治与管理。首先应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对劣质山寨仿冒手工艺品进行管理与控制。其次要为真正能代表当地文化历史特色的手工艺品提供销售上的扶持与帮助,结合景区与地方特色,构建特色手工艺品购物旅游区、传统手工艺产业园、手工艺主题旅游节等宣传销售平台,打造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感的特色精品传统手工艺产业。

#### (二)促进现代化工艺美术教育

现今我国的教育体制至少要求学生进行16年的全日制学习才能完成高等教育,而手工艺人的培养也需要从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开始,跟随师傅进行

十余年的苦练。两个体制时间上与教学方式上的冲突导致民间手艺人只能夹缝中求生存,众多艺人都错过了接受良好文化的机会。但民间手工艺不只是技艺的传承,对传习人的行业道德、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都有很高的要求<sup>[14]</sup>。所以如何弥补手艺人文化教育水平的缺陷是当今的重中之重。

笔者建议,首先,各类相关高等院校,应积极开展传统手工艺方面专业的教育与人才的培养,开发适应手工艺学习的教学体系与教育环境,在对专业技术进行学习的同时重视学生的文化、历史、美学、市场营销与道德伦理教育,让新时代的手艺人发展成具有高超技艺的综合型艺术人才。当今的手工艺已不仅仅是用来满足温饱的手段,更是民族与地区文脉和历史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手工艺传承人,应当树立更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力求将蕴含着传统情怀与现代志趣的文化与美学元素融入我国的工艺美术作品中,让手工艺成为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名片。

成熟手艺人可由政府、协会等机构组织高层次培训学习,开拓思路、更创新高。近年来苏州镇湖刺绣产业与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等知名院校合作,让绣娘们有机会与国内著名画家直接接触学习,用美术为刺绣提供了新的优秀创作灵感与素材<sup>[17]</sup>,为隐居民间的技艺打开了学院艺术的天窗。

#### (三)与科技、新媒体相结合

科技相结合并不是指鼓励机器化批量生产,而且鼓励手艺人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与媒体平台对自己的产品进行营销、推广。一个产业,一个公司,一种产品如果无法完成消费者群体的更新于传承,就无法完成自身的延续。对于我国的传统民间手工业产业来说,难点不仅仅在于传播与弘扬,更是在于要在年轻人中进行传播与弘扬。如果不能把在青年消费群体中扎根,那无论如何产品也没有未来。

苏州85后团扇匠人李晶所创立的嗜闲居工作室,就是具有新思维的成功典范。他们将传统缂丝技艺与现代审美和消费形式相结合,对传统纹样进行现代化提升,以微商、淘宝店作为经营的主战场。他们摆脱传统手工艺品经营的桎梏,嗜闲居的姑苏团扇成功走出了文玩爱好者的“小众圈子”,与影视剧、时尚芭莎、超模刘雯等的合作,让几千年前的缂丝团扇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今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者模式与媒介接触点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手工艺品也不能只依赖着传统小农时代的销售方

式,应对新科技新媒体多接触多学习,与电子商务接轨,做到线上与线下联动,扩大自身产品的认知度与传播范围。青年市场代表着未来市场,如果手工艺的发展不能适应当下青年人的消费模式,变会在未来的市场中无法立足。

#### (四)促进品牌化发展

众多学者皆认为品牌化是传统手工艺发展的可行之选。品牌作为“物质产品”、“情感利益”、“意义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共同载体<sup>[18]</sup>,是传统手工艺产品向现代市场进军的必经之路。确立品牌开发体系可能帮助现有的粗放经营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明确自身的品牌价值,细化产品分类,树立产品差异化理念,明确发展方向,提升消费者忠诚度,能够帮助手工艺产品更好地融入现代市场。

品牌化与产业化是相互推进的。品牌化可以推动手工艺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也会为品牌化的完善奠定稳固的基础。我国有很多传统手工艺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当市场扩大时,由于人力与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大批量订单的需求,而难以扩大经营。我国很多民间手工艺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集群性,如果能将当地手艺人集中起来,以合作社或产业园的形式,进行产业化发展,会有效增强手工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经济带动能力。

同时,品牌化经营也是对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保护。品牌的建立能够促进手工艺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增强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推动商标体系建设与品牌视觉系统标准化。但由于传统手工艺产品大多具有地域性与公共性,其知识产权的归属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sup>[13]</sup>。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成都地区出产的丝织提花织锦蜀锦为例,在其源远流长的发展传承史中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技巧艺法都是由所有的蜀锦传承人、生产者所共享的,没有哪一个企业或个人可以完全代表蜀锦或决定蜀锦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符合现阶段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需求。

目前学界对于区域公用品牌的界定尚不明确,但不同学者间的观点相差并不大。浙江大学胡晓云教授认为,区域公用品牌是指“特定区域内相关组织和机构所共有的,在品牌建立的地域范围、品牌品质管理、品牌使用许可、品牌行销与传播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以联合提高区域内外消费者的评价,使区域产品与区域形象共同发展的品牌”<sup>[19]</sup>。区域公用品牌的相关权益不归某个企业或集团、个人拥有,而为区域内相关

机构、企业、个人等所共有,品牌命名方式多为地域名称加产品名称,如“盘锦大米”。目前我国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主体多为相关行业协会,品牌的组织建设模式多为政府支持与协会主导。

近几年我国农产品品牌化的推进如火如荼,众多带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农产品品牌都进行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但目前手工艺品牌的发展与研究依然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区域公用品牌是建立在一定区域内的独特资源基础上,对该区域有代表意义,并能为该区域的美誉度、形象与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品牌<sup>[20]</sup>,所以区域公用品牌的特性和要求与传统手工艺的特点是非常吻合的。我国民间能够流传至今的传统手工艺,大多是基于本地的历史、地理、文化、生活、物产等特点所衍生出的,能够代表当地特色的文化产品,而且手工艺品的成功推广所带来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势必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形成积极影响。以手工艺品牌公用品牌“宝鸡凤翔泥塑”为例,近年来凤翔泥塑的兴起推动了众多当地相关企业的崛起,带动了刘营村70%以上的农户家庭从事泥塑产业,不仅解决了众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整个凤翔县的经济的发展<sup>[21]</sup>。

李秀丽、董珺<sup>[21]</sup>认为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具有五个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即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与个人有权共享品牌效益。第二,非竞争性:一家企业的扩张并不会影响区域内其他企业对该品牌的使用,同时其他企业使用该区域品牌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第三,权利主体分离性:即手工艺区域品牌的申请人与所有使用者相分离。第四,外部性:即手工艺区域品牌的某些使用者或使用单位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与产生的相关影响会同时对区域内其他手工艺品生产人或企业产生影响。第五,继承性:与其他新成立的品牌不同,手工艺区域手工业品牌形神但是神不新。手工艺区域公平品牌必然是通过区域内某些群体和个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发掘逐渐发展形成的,是一代代手工艺人对传统技艺与文化不断传承的结果。

此外,由于对原产地的依赖性与使用主体的公共性,地理标志产品与区域公用品牌成为了两个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概念。地理标志又名原产地标志。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起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法国<sup>[22]</sup>。在我国,地理标志是指“某商品来源于某一国家、地区或特定地方,且该商品的品质、信誉等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sup>[23]</sup>。《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地理标志产品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特定地区种植或养殖的产品,二是原材料

来自特定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或加工的产品。所以,区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的内涵联系紧密,很多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与内容就是由地理标志产品,比如“烟台苹果”既是一个水果的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又是地理标志产品。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分为瓜果蔬菜、粮食油料、畜禽蛋奶、水产品、茶叶、中草药、烟草、食品饮料、酒、轻工产品等十余类,其中多数为农产品。轻工产品中包括瓷器、纺织品、乐器、服装等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体系不仅可以保护手工艺品知识产权,监督产品品质,维护市场秩序还会有效增加产品的溢价价值。一项研究现实,葡萄牙消费者愿意为有地理标志证明的葡萄酒多付30%的价钱<sup>[24]</sup>。目前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网公示的地理标志产品总计1744个,其中手工艺品仅有92个,与农产品相去甚远。这并非我国特有的情况,在以艺术闻名于世的法国与意大利,手工艺品牌的品牌建设与地理标志产品发展面临着同样尴尬的局面<sup>[25]</sup>。

我国手工艺的经营者多为个体艺人、工作室或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建设与维护品牌的资源与资本,难以形成强大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完善区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建设,以区域的知名度为依托,能够大大加深消费的品牌记忆与品牌认知,从而加速品牌的推广进程。同时,以区域的名义发展手工艺,能够激发手工艺品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更好地丰满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乡土特色。

区域公用品牌成立的前提是政府的扶持,行业协会的有效管理与相关部门的配合<sup>[26]</sup>,如这三者能够有机运转,即可为现今粗放式发展的民间手工艺产业进行精细化转型,为生产与经营提供科学的指导与支持,同时能够将“散户”的手工艺人的联动起来,扩大产出,提高生产效率,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化发展带来可能。

#### 四、结 语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发迹之初依靠的就是传统手工艺品。他们之所以能完成从小作坊到顶级奢侈品的转型,就是因为采用了现代化的品牌运营与设计理念,才使得产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最大的升华<sup>[12]</sup>。传统手工艺品并不是与现代元素接轨就会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以传统文化为精髓,以现代化营销为手段,通过政府扶持、教育跟进、科技结合与品牌化打造,传统手工艺品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扬。此外,本文借鉴如今我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成功经验,建议传统手工艺产业也应结合自身特色走上一条区域公用品牌化的创新发展道路。

现阶段,区域公用品牌的研究依然处于新兴阶段,手工业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方面理论与实践均存在很大的空白,未来在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的可行性、操作流程、实践意义、价值评估等方面依然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 参考文献:

- [1] 陈芳. 浅析传统手工艺存在的价值[J]. 浙江工艺美术, 2002(3):4-6.
- [2] 赵晖. 民间手工艺品开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研究[J]. 经济师, 2011(8):39.
- [3] 宋清洁, 康培莲, 侯惠哲, 等. 关于我国传统手工艺产业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J]. 中国集体经济, 2014(35):22-25.
- [4] 李新月, 姚世奕. 浅析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与发展[J]. 散文百家, 2016(8):6.
- [5] 徐艺乙.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5):223-228.
- [6] 张西昌.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 西安:西安美术学院, 2013.
- [7] 吕行佳, 宋世桢. 民间手工艺文化传播考察:兼论新媒体环境下民间手工艺的产业化实践[J]. 文化艺术研究, 2017, 10(2):29-35.
- [8] 袁东升. 近20年来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研究述评[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7(5):62-67.
- [9] 李艳. 客家民间手工艺品的没落与救赎[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8(4):125-128.
- [10] 王艺湘, 吴超. 民间手工艺品毛猴在天津的新生[J].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12(2):73-74.
- [11] 戴清材. 浅议工艺美术的现状与发展之路[J]. 大众文艺, 2017(6):127.
- [12] 俞焯操. 为传统手工艺创造品牌新形象[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3):109-112.
- [13] 宋生辉. 传统手工艺文化产品的品牌策略:以知识产权营销为视角[J]. 价值工程, 2014, 33(4):194-195.
- [14] 叶崇凉. 城镇化背景下民间手工艺传承保护研究[D]. 温州:温州大学, 2011.
- [15] 韩雷. “互联网+地方传统手工艺”品牌战略研究:以吉林省传统手工艺为例[J].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7(16):186.
- [16] 张泽涛. 北京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思考[C]//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 2013年中国民族法学年会论文集. 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 2013:10.

- [17] 秦潇璇. 刍议传统手工艺在现代产业中的转型[J]. 农业科技, 2015, 28(11): 32-33.
- [18] 胡晓云. “品牌”定义新论[J/OL]. 品牌研究, 2016, (02): 26-32, 78. [2017-9-2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6&filename=PPTT201602004&v=MTUxNzdiekFOVDNmZXJHNEg5Zk1yWTlGWUISOGVYMUxleFI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MmVaZVJ0Rnl2ZlY=>. DOI: 10. 19373/j. cnki. 14-1384/f. 2016. 02. 003.
- [19] 胡晓云, 程定军, 李闯, 等.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评估研究[J]. 中国广告, 2010(3): 126-132.
- [20] 边剑霞.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保护和提升中的政府职能[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4.
- [21] 李秀丽, 董珺. 手工艺区域品牌价值评估: 以“潍坊风筝”为例[J]. 财会通讯, 2016(6): 124-128.
- [22] 刘之杨, 孙志国, 胡再. 陕西秦巴山片区特产的地理标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OL]. 山东农业科学, 2014, 46(1): 127-130. [2017-9-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14&filename=AGRI201401037&v=MzE1MDhIOVhNcm85R1k0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DJlWmVSdEZ5dmdXNzNQSkNyWlo3RzQ=>. DOI: 10. 14083/j. issn. 1001-4942. 2014. 01. 041.
- [23] 刘金花, 刘洁, 吉晓光. 基于原产地效应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2): 74-79.
- [24] Bhat I H, Singh S. A study on branding of handicraft through geographic ind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kashmi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17, 9(4): 275-283
- [25] Marie-Vivien D, Biénabe E.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 worldwide review[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8: 1-11
- [26] 贾泉.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果菜, 2015, 34(9): 36-37.

##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pa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LU Zhixian

(Center for China Agriculture Brand, Hangzhou 310000)

**Abstract:** Traditional folk handicrafts are significant cultural treasures accumulated by Chinese people in life.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is faced with serious surviv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limitations of current handicraft industry from three aspects-interior reasons, exterior impacts and social changes,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such aspects as government support, education promo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brand building. Furthermore, the author discusses po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marke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mon brand and provides a new way for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folk handicraft industry.

**Key words:** folk handicraft; traditional culture; marketing; regional common brand

(责任编辑: 任中峰)

#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周 超,龚素璠,陈建勇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培养符合时尚产业发展需求的纺织品设计人才是当前纺织教育的迫切要求。针对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以服务“纺织产品链”创新为基础,创建起“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起“二段进阶型”路径。以“时尚任务”驱动为要求重构课程体系,实施“积极课堂”教学模式;整合校内外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建立“双跨界”教学团队及促进机制;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来培养具有纺织品创意设计能力和引领时尚消费的纺织品设计人才。

**关键词:** 时尚;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66-06

中国是纺织制造大国,“十二五”末纺织工业年生产总值达 7.07 万亿元,产能和市场份额世界第一,但纺织产业仍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低端<sup>[1-2]</sup>,要实现从纺织大国到纺织强国的转变,以“纺织+时尚”为理念的“时尚纺织”是实现产业转型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根据《中国制造 2025》、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浙江省时尚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精神,传统纺织业将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从纺织产业链的低端制造迈向高端智造,从贴牌加工迈向以创意设计为核心的时尚产业<sup>[3]</sup>。要引导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人才培养是关键,因此,培养能够通过纺织品的创意设计来引领时尚消费的纺织品设计人才成为纺织教育的迫切要求。剖析当前高校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现状,研究和实践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为例,分析改革思路、措施和实效。

## 一、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背景

时尚产业是指涵盖时尚理念和时尚信息的传播

与服务,时尚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等系列与时尚生活相关的经营活动,横跨文化、传媒、设计、制造、咨询、服务等多种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的产业集合体<sup>[4-5]</sup>。时尚产业不是单一产业,是能引领时尚生活和流行消费的高创意、高市场掌控能力的高附加值产业<sup>[6-8]</sup>。以接轨“时尚纺织”为目标来实现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其关键是开发满足时尚纺织生活需求的产品,即时尚纺织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时尚纺织品与一般纺织品的区别在于满足不同消费层的消费需求,一般纺织品满足的是消费者纺织生活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时尚纺织品需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时尚纺织生活需求。因此,要达到开发时尚纺织品的要求,培养的纺织品设计师必须具备“艺工商”融合创新的知识和能力,集纺织品创意设计、创新技术、市场营销于一体。

分析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与纺织产业发展脱节。随着时尚产业的快速发展,接轨“时尚纺织”的传统纺织业转型升级急需大批纺织品设计人才,现有纺

纺织品设计的人才培养方式是:按工科类或艺术类进行分类招生,采用工科类和艺术类进行分类培养,因此,分类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短板明显(如图1)。工科类纺织品设计学生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逻辑思维,重视产品的加工工艺和产品内在质量,但由于“艺”的知识和能力短缺,使开发的纺织品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题;艺术类纺织品设计学生注重培养学生感性自由的发散思维<sup>[9]</sup>,追求产品外在的美观效果,但由于“工”的知识和能力短缺,使开发的纺织品往往与生产工艺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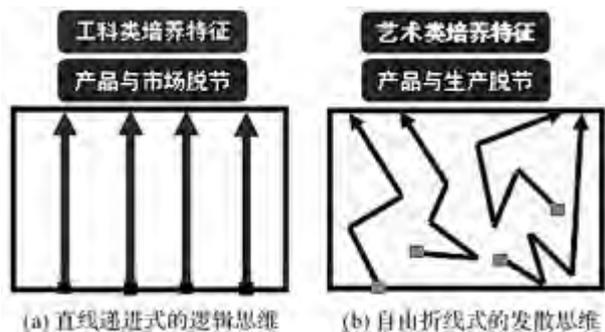


图1 纺织品设计人才分类培养特征和主要问题

2.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方法欠缺。“时尚纺织”是以“纺织+时尚”的理念来引导传统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由于时尚产业是一种新型产业业态,加上分类招生和分类培养的限制,国内纺织院校接轨“时尚产业”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方法至今尚处探索阶段,尚未构建起与时尚产业快速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未能有效培养“既有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能力,又能够通过产品开发引领时尚消费”的纺织品设计人才。

3. 接轨“时尚纺织”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方法欠缺。虽然目前国内纺织院校建设了大量优质的校内外教学资源,如校内的各级精品课程、多层次实验室和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等,但是缺少有效方法和机制,能够让校内外优质的教学资源聚焦到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上来,特别是缺乏接轨“时尚纺织”的校内外教学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源于1897年创办的蚕学馆,是中国最早创办的新式纺织教育,一直在为中国的纺织丝绸行业培养专业人才,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1979年,浙

江理工大学首创“艺工课程叠加”的模式进行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时尚产业快速发展对纺织品设计人才的需求;2008年,结合境外纺织院校的成功经验,开始着手面向时尚产业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2010年,以启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为契机,针对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工程技术教育过多,审美教育和时尚教育缺乏的现状,进一步探索以“纺织产品链”创新为核心的纺织品卓越设计人才培养方法;2012年,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获得教育部高教司批准,正式提出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是“纺织品+时尚”,即需要培养的纺织品设计人才不仅具备纺织品的设计能力,而且要具备通过开发产品“引领纺织品时尚消费”的能力。

## 二、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针对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构建起与“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保持一致的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思路,主要体现如下:

### (一)明晰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改革整体思路

时尚产业不是单一产业,是横跨文化、传媒、设计、制造、咨询、服务等多种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的产业集合体,时尚产业具有跨越第二和第三产业界限的特征,因此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必须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将“纺织+时尚”的产业升级理念和“产品+时尚”的产品创新理念融合,确立以“纺织品+时尚”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的纺织品设计人才需要具备通过时尚纺织品的开发来引领时尚纺织生活消费的知识和能力,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改革整体思路如图2所示。时尚纺织品的开发需要依托纺织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的“纺织产品链”来完成,针对“纺织产品链”各环节的创新要求,从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出发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为:精通纺织产品链各环节的创新(纺织原料创新、纺织面料创新、面料造型创新)、掌握领先的纺织加工技术(纤维加工、织造加工、染整加

工)、通晓流行纺织艺术(造型、纹饰、色彩)、又具备通过纺织品开发引领时尚纺织生活(个性化需求、差异化消费、针对性营销)的知识和能力,能在纺织原料、纺织面料到面料造型产品(服装服饰和家纺装饰产品)的创新中引领纺织品“技术时尚、艺术时尚和消费时尚”的发展方向。



图2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整体思路

### (二) 构建起“纺织品+时尚”的“二段进阶型”人才培养路径

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以“纺织品+时尚”为核心理念,针对人才培养目标制订培养方案,构建起与传统培养模式不同的、以接轨“时尚纺织”为特色的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二段进阶型”培养路径。在专业基础教育中除了工程基础教育,增加艺术基础教育;在专业教育中融入消费时尚、技术时尚、艺术时尚的专业教育模块,如图3所示。在专业基础教育阶段,采用科学严谨的直线递进式路径,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要求学生精通纺织品从原料、面料到造型成品的加工工艺以及必需的艺术设计基础知识;在专业教育阶段,采用感性自由的折线融合式路径,通过消费时尚、技术时尚和艺术时尚模块课程设置来培养学生“艺工商”融合的发散思维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纺织品+时尚”的纺织品创意设计知识和能力。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需要通过“纺织品+时尚”的聚焦作用来实现接轨“时尚纺织”的创意创新人才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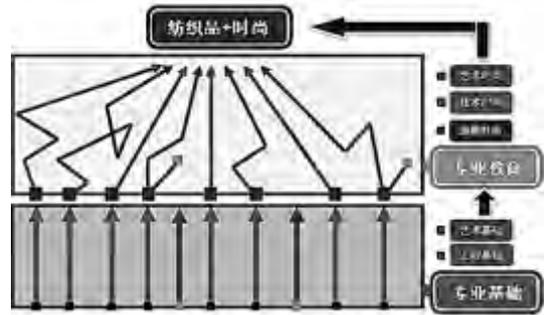


图3 “纺织品+时尚”思路下的“二段进阶型”人才培养路径

### 三、培养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的主要举措

#### (一) 构建“时尚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实现校内外教学资源联动

根据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将“纺织品+时尚”的理念转化为以“时尚任务”驱动为引领、以“时尚纺织品”展示为聚焦的改革举措,重新构建起校内专业教育和校外企业教育相互关联的课程体系,如图4所示。“时尚任务”是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的具体方案,要求学生在专业课学习前就制定“时尚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将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融合,针对“纺织品+时尚”的设计构思不论是来自技术时尚或艺术时尚,一定要接轨消费时尚,开发的时尚纺织品可以通过批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应用来引领时尚纺织生活。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按工程类、艺术类、时尚设计类及专业拓展类校内教育课程学分比为2:1:2:1来设置,并按理论教学学分不超过总学分70%,实践教学学分不少于总学分30%来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分。校内基础教育包括专业和学科导论、纺织工程类课程和纺织艺术类课程;校内专业教育包括纺织品设计原理类课程、纺织品设计实践类课程和专业拓展类课程。校外企业教育包括企业认知实习、企业工程实习、企业设计实习、企业毕业实习、毕业设计5个依次递进的企业课程(卓越计划企业环节累计1年)。校企联动贯穿人才培养始末。学生在“时尚任务驱动”下通过校企联动的教学资源实现渐进式主动学习,完成毕业设计和纺织品制作,并通过时尚产品展示来验证学生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的掌握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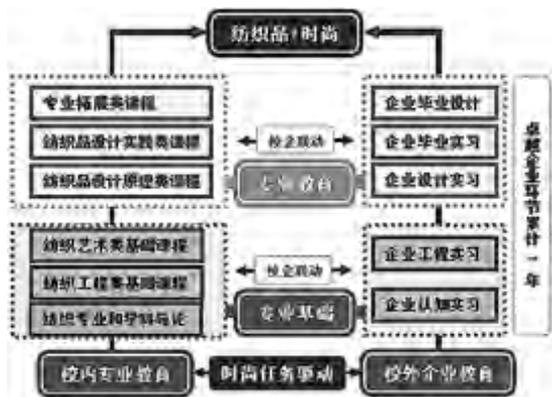


图4 “纺织品+时尚”思路下的校企联动的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建设

## (二) 建设接轨“时尚纺织”的校内外教学资源,提升纺织品设计人才的创意创新设计能力

1. 接轨“时尚纺织”校内外教学资源包含校内外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资源。由于时尚产业对于时效性有着特殊的要求,结合纺织工程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以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三位一体的精品课程体系为核心,带动整个校内专业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始终处于吐故纳新的动态平衡中。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网络课程,构建起优质校内专业教学资源;建设线上线下联动的课程教学资源体系。从导论课(例如“现代纺织与人类文明”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基础课(例如“纺织品CAD”国家资源共享课程等)、专业课(例如“纺织品设计学”浙江省精品课程、“素织物设计”校精品课程、“花织物设计”校精品等)、拓展课(例如“探索时装的奥秘”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等分模块进行建设。结合校内纺织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央地方共建纺织工程专业实验室和专业创新能力实践基地建设,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多层次、开放性校内实验教学平台和优质校内实验教学资源,满足学生“时尚任务”驱动的校内创新实践的要求。

2. 产业需求对时尚设计师的实践能力有深化训练需求,结合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施,积极构建以国家级校外实习基地为核心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群。例如省部级及以上校外实习基地有:巴贝领带服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浙江嘉欣丝绸集团纺织服装实践教育中心,省部级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宏华数码印花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部级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万事利丝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

部级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实习基地都是时尚纺织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每届学生都有机会在这些基地实习实践,接触市场前沿时尚,接触先进的技术和营销理念。学生能“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实训中,做到人才培养与产业、市场的无缝链接。

在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上,通过“时尚任务”驱动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在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环节将校内外教学资源有效整合联动,并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进程始末,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 (三) 创新“积极课堂”教学模式,建立“双跨界”教学团队及促进机制

以学生为本,创新满足“纺织品+时尚”人才培养需要的“积极课堂”教学模式,推动人才培养“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转移”。通过启发式教学、团队式合作、任务式驱动等不断提升教学效果。通过开展启发式理论教学,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纺织品设计的专业问题;强化学生团队式合作,培养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来解决专业问题的综合能力;通过任务驱动式实践教学,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来实现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依托网络化课程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超越课堂的全天候学习环境。

建立起“双跨界”的教学团队及管理促进机制,即校企跨界的教师配置和知识跨界的教师培养。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资源,邀请国内外“一流设计师、工程师、企业家”开展多形式教学,参与学生的课程作业、创新作品评价,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积极性。“纺织品+时尚”专业课程教学需要教师本身具备“艺工商”多元知识融合的素质。借鉴境外高校成功经验,培养青年教师的知识多元化,鼓励艺术背景青年教师进修产品工程设计知识,工科背景教师进修产品艺术设计知识,通过师资本身的知识融合来促进纺织品卓越设计人才的培养。

## (四) 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时尚产业的全球同步化趋势,必然要求我国的纺织时尚产业需尽快与国际接轨,吸收和借鉴国外时尚产业有用的养料和发展的经验。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积极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高学生国际化能力。浙江理工大学积

极开展与国外相关高水平纺织院校合作,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2+2 合作项目、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3+X 合作项目、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优秀本科生交流合作项目,聘请国外教授为学生讲授专业课程,如美国肯萨斯州立大学教授 Joy Kozar 来校讲授《Fashion and marketing of textiles and apparel》课程。学院也选派青年教师赴国外交流和培训,选派交换生赴国外合作大学进行学习。

#### 四、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培养改革成效

##### (一)学生全面展现时尚设计才能

近 5 年来,以“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 8 项,培养的纺织品设计专业毕业生 400 多人,毕业生平均就业率高达 98% 以上。学生共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二等奖、省一等、二等奖等 40 多项,有 60 多人次在全国及国际纺织品设计大赛中获大奖,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近 100 项,发表 10 多篇核心期刊以上论文,获得 8 项国家、省部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目前在浙江省重点建设的纺织时尚企业中,如巴贝领带、凯喜雅国际、万事利集团、达利丝绸等,都由笔者所在高校历届纺设毕业生担当设计团队负责人,新毕业学生迅速融入各个团队,独立担当起纺织品设计重任,形成人才梯队,得到社会和行业的高度认可。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浙江凯喜雅国际有限公司给予纺织品设计毕业生“贵校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强,专业能力优,在众多高校的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公司骨干”的评价。

##### (二)成果得到纺织服装界的高度认可

以“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得到纺织类高校的一致认可。多次在纺织类高校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交流会上进行改革经验交流。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对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成果对国内其它高校纺织高等院校纺织类专业设计人才培养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推广意义”。东华大学、苏州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来校交流与学习取经。除了对纺织院校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产生影响外,对其它相关专业也起到示范作用,如服装设计与工程、丝绸设计与工程、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等专业。成果也得到媒体广泛关注。中文核心期刊

《丝绸》2015 年“时尚·浙江”专刊,在时尚人才专栏中重点介绍纺织品设计专业和毕业生作品;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6 月 17 日以《贡献科技人才,扮靓“杭派女装”》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我校纺织类人才培养改革“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实现双链零距离”的特色;光明日报、新华网、绍兴日报、浙江在线等媒体也作了专题报道。

#### 五、结 语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方兴未艾,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向“注重纺织时尚创意、创新能力培养”转型也是必然趋势。通过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创建了以“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规划出以接轨“时尚纺织”为特色的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二段进阶型”培养路径,构建起适应“时尚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和校外教学资源,在笔者所在高校已经取得一定的“时尚引领、校企联合、创意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实效,同时,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队伍建设也有效促进了改革实践成果的提升。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成果可为面向新经济的传统专业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龚素臻,周超. 纺织企业产品设计人员创新能力提升路径探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4, 32(6): 515-518.
- [2] 陈李红,严新锋. 我国时尚创意人才的培养:基于纺织服装专业教育的探讨[J]. 广西教育, 2016, 39(10): 86-87.
- [3] 张蓓蓓,束霞平.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高校针织服装人才培养[J]. 针织工业, 2014(3): 67-72.
- [4] 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7 年中国时尚产业基本情况分析(图)[EB/OL]. [2017-6-20].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6/534045.html>.
- [5] 中欧国际商学院《中国时尚产业蓝皮书》课题组. 中国时尚产业蓝皮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7.
- [6] 束霞平,钱孟尧.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需求下高校服装人才培养[J]. 丝绸, 2013, 50(9): 75-78.
- [7] 陈建忠. 浙江时尚产业发展规划研究[J]. 浙江经济, 2015(4): 38-41.
- [8] 孔德议,张向前,林剑. 创意人才研究综述[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 33(6): 123-127.

##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xtile design talent training in line with “fashionable textile”

*ZHOU Jiu ,GONG Suli , CHEN Jianyong*

(Silk Institute,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t is urgent for the current textile education to train textile design talents conform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fash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textile industry to "fashion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issues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t textile design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serving "textile product chain" innovation, a new talent training mode following the idea of "textile+fashion" is created, and the "two-stage combination" route is built up. Moreover,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reconstruct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ashion task drive"; "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carried out; 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re integrated; "double crossover" teaching team and its promoting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is expanded and internat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platform are set up. As a result, the textile design talents owning the ability of textile originality and innovation design and leading the fashion consumption are cultivated.

**Key words:** fashion; textile; design; talent training; reform

(责任编辑:唐志荣)

# 国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分析

汪阳子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属于应用型的创意创新人才,其人才培养是将中国传统优势的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的基础之一。对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梳理,归纳境外欧美国家、日韩和港台地区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点,并通过与中国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国内内地高校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通过设置可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构建起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从而实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差异化培养。

**关键词:** 境外;中国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72-0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尚产业在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和新兴国家中快速增长,我国传统优势的纺织产业也正在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也面临着升级和优化的要求。如今的纺织行业不仅需要具有专业基础知识和动手能力的设计人才,更期望具有创新思维、个人魅力、能够独立进行设计研发的专业设计人才。同时,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需要构建适应行业发展的专业课程,境外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是很好的参考。本文将通过分析境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路径的异同,提出境内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

## 一、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中课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强调为大工业生产而设计,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并推崇和发展包豪斯教育理念中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夏雨<sup>[1]</sup>研究描述了包豪斯理念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指出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因此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并熟悉生产的工

艺和流程。在倪明<sup>[2]</sup>的教学模式启示中,提出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培养贯彻强调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强调工作室教学模式,并以自主探究的课题研究形式进行各项专业课程的学习,在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又有效地与企业进行了对接。

除此以外在流程化的设计项目制教学当中,将引导学生熟悉完整的调研、设计、小样制作等过程及方法。石晶<sup>[3]</sup>提到项目化教学法是境外许多大学对高年级学生进行综合训练的综合方法;张建辉<sup>[4]</sup>也详细描述教学过程会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思维创新能力、鼓励学生以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

### (一)英国、美国、欧洲家纺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殷沛枫<sup>[5]</sup>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荷兰等国绝大多数的艺术院校都遵循了包豪斯教学理念,其理念强调:艺工结合的教学模式,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收稿日期:2017-09-29 网络出版日期:2018-01-30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G20160049);纺织科学与工程浙江省重中之重一级学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6JG03);纺织科学与工程/开放基金项目(2016KF03);浙江理工大学全英文授课课程建议项目(QYKC1701)

作者简介:汪阳子(1990-),女,浙江杭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纺织品艺术设计方面的研究。

在其设计理论中还提出三个基本观点: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现代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且客观的法则来进行,才能逐步由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更科学、理性的表现艺术。王军亮<sup>[6]</sup>也强调包豪斯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办学模式;睦建华等<sup>[7]</sup>提出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以理论结合实践为基本框架。实训部分以自主研究、课题项目制进行各项专业课程的学习,杜群<sup>[8]</sup>和刘杰<sup>[9]</sup>也提到此类培养架构既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能与企业有效交流、合作。国外“项目制”教学,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自我宣传能力、项目讲解能力以及小组合作能力,能够有效的帮

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很好地锻炼自身的综合能力,并起到了良好的衔接作用。

#### 1. 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在圣马丁的纺织品设计本科教学计划当中,三年的课程被分为三个阶段,11个模块。阶段一的模块1)、2)、3)、4)教学内容为设计概念、方法和调研过程的介绍以及实践探索,利用批判性思维深化主题概念,探索学生自身的设计风格;阶段二的模块5)、6)、7)、8)为调研、设计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向的选择;阶段三模块9)、10)、11)为毕业设计的实践与应用。该校纺织品设计本科课程大纲见表1。

表 1 中央圣马丁纺织品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模块	教学内容	具体内容
一	1)	概念介绍	风格梳理、调研方法、技术研究方法、设计原理
	2)	调研过程与方法	设计、色彩介绍。机织、针织、印染、调研方法,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学习
	3)	调研、概念、设计与交流	调研、概念、设计与交流、调研和制作方法的应用以及个人风格探索
	4)	文化历史理论以及实践探索	文化历史理论以及实践探索,批判性思维深化主题以及探索个人设计风格
二	5)	纺织品设计调研方法	自主建立纺织品设计调研方法
	6)	方向选择	方向选择以及拓展性设计制作
	7)	未来服装和环境的纺织品设计	特殊的设计方法和材料的探索
	8)	概念设计、未来发展方向的确立	公司或政府合作设计项目
三	9)	毕业设计主题项目的调研、发展	未来职业规划相关主题设计
	10)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11)	毕业设计的制作与答辩	毕业设计的制作与答辩

在三年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形成其独特的个人设计方法和设计风格,并在与公司的合作实践设计中学习如何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在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当中鼓励学生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一对一的辅导中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出指导意见,并给学生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以启发式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实践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意识。

#### 2. 美国帕森设计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以帕森设计学院本科的时尚设计专业为例,其课程是以设计为主导通过二维、三维、四维的方式围绕着主题概念进行研究,通过探索手工制作与数字技术间的平衡应用,改善视觉创意能力,在它的核心

课程当中强调自我的发展,课程的内容包括视觉传播策略、材料研究和以系统性的思维实现时尚设计。在艺术和设计的历史和理论课程以及相关的工坊学习中将引导学生获得研究、写作和批判性推理的技能。同时作为开发创意探究的概念基础,课程还包括商业和媒体研究,拓宽学生对行业的了解。在毕业设计模块中帕森设计学院为学生设计理念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多种选择:包括服装、时尚产品设计、材料研究、时尚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论文、纪录片等。在以工业为中心的设计背景下与外部合作,以提高学生的设计灵敏度。该校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见表2。

表2 帕森设计学院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第一年	PUFY 1000	综合工纺	第二年	PUFD 2220	设计工坊
	PUFY 1010	综合研讨会		PUFD 2230	视觉传达工坊
	PUFY 1100	可持续发展系统		PUFD 2240	技术创新工坊
	PUFY 1020	空间/物质性		PLFS 2040	服装史讲座
	PUFY 1030	绘图/想象		PLFS 2041	服装史习题
	PUFY 1040	时间		PUFD 2221	设计工坊2
	PUFY 1001	综合工坊2		PUFD 2231	视觉传达工坊2
	PUFY 1011	综合研讨会2		PUFD 2241	技术创新工坊2
	PUFY 1000	历史中的物体 程序选修			程序选修 文科选修
第三年	PUFD 3320	设计工坊	第四年	PUFD 4220	毕业论文1:构思
	PUFD 3330	专业工坊		PUFD 4221	毕业论文2:完成 程序选修 文科选修 学校演讲选修
	PLFS 2050	时尚研究简介讲座			
	PLFS 2051	时尚研究简介练习			
	PLFS 3500	高阶调研研讨会:时尚			
	PUFD 3321	设计工坊4			
	PUFD 3331	专业工坊2 程序选修 文科选修			

在帕森设计学院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将立足点放在培养社会急需、实用的人才上,帕森的本科毕业生可在专业领域内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设计,创意;研究实践,造型,视觉营销,纺织品,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或生产制作。

### 3. 意大利马兰欧尼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以马兰欧尼时尚设计专业本科为例,在其三年的课程中通过研讨会、个人辅导、工坊培训、访问考察、讲座、信息技术培训、图书馆会议、小组项目和独立研究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第一年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从各种方向、背景以及可能性的理论知识框架以及基本原理,此外还有打版以及立体构成类课程向学生介绍所需要的技术并协助学生进

行实践应用,使他们能够在第一年结束时以二维的形式成熟的表达并陈述他们的作品。第一、二年的课程鼓励学生以挑战性的方式实验、思考,从而实现设计想法,深化第一年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并将个人风格细化到不同的市场应用当中。第三年课程目标是通过大量的练习使得学生能够熟练地完成某品牌的消费者、竞争对手、价格的统计,且学习营销、推广以及商业企划,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公司的市场定位,或是自己独立完成设计系列。该校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见表3。马兰欧尼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中,第一年阶段包含模块AD、FED、PCC、HAD;第二年模块包含单元BR、AFI、PS、FCCP;第三年包含模块PC、CD、RTP;选修单元为CD、IPP。

表3 马兰欧尼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内容
第一年	AD	结构设计	打版、立体构成设计、技术文件制作
	FED	面料探索与设计	印染、针织、打褶、廓形和细节制作
	PCC	作品搜集与创造	发展个人风格以及细化的市场应用
	HAD	艺术与服装史	艺术与服装的历史与关系
第二年	BR	品牌分析	1900年至今的时装研究
	AFI	艺术与时尚的相互作用	艺术以时尚的关系,以及面料材料、珠宝、鞋类、发型妆容的发展
	PS	个人风格	反思性学习、熟练运用技术表达个人想法
	FCCP	时尚、文化和当代视角	时尚与消费主义、时尚摄影与欲望、性别认同与身体、未来时尚
第三年	PC	系列准备	个人系列的调研
	CD	系列设计	个人系列的设计
	RTP	理论调研与实践	产业化信息搜集
选修单元	CD	系列发展	个人系列发展
	IPP	产品化作品集准备	个人系列完成或公司市场定位调研

马兰欧尼的教学体系是强调创造力的深入研究,从新趋势以及新的设计理念中寻求灵感,结合对当代时尚企业的分析研究,同时结合个人经验,将文化、艺术和设计作为灵感来源。密集的设计课程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视觉语言”,通过专业技能以及设计方法的学习,结合图形设计以及视觉传达设计相关知识,创造出适合当今时尚奢侈品市场的独特个人风格和形式。

在意大利的纺织类专业当中,本科三年的教学目的也是引导学生形成独立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里教授学生时装设计、时尚产品设计、男装女装配饰设计等相关的理论知识、技术方法和材料面料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将调研过程的方法应用于个人设计。从手绘技巧、服装制作基本知识开始,快速地进入服装设计技术知识。学生将根据客户要求或是品牌形象要求,结合市场需求和其他市场影响因素,开发创新,自主地开展个人创造性研究。

意大利时尚课程的教学模式当中还非常强调对市场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对市场的调研引导学生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又具有特色的创意时尚产品。

## (二)日本、韩国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日本、韩国的培养模式中除了专业基础知识理论、实践课程,以及创造力培养课程外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

### 1. 日本文化学院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时尚纺织品专业在第一年的课程安排为染色基础、机织基础、专业概述、技术实践,服装的构成要素,身体与布之间的关系等课程。通过制作衣服而学习技能,同时也培养设计的构思、设计表达能力基以及审美能力。以纺织品的各种原料、组织、加工方法为基础,逐渐理解设计的定义,如何设计以及设计和技术间的关系。

第二年的课程内容为纺织品制作的各种工序和技法,各种各样机器的使用,通过实践机器制作全面深入了解工艺以及设计过程。然后尝试以独立设计图案花型以及工艺组织图的方式来进行纺织品的设计。另外还要以趋势性的材料和时尚的动向为基础来进行商品的规划设计。第三年中将会根据纺织品界的实际业务,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再根据销售市场来模拟整体的设计规划。每个学生以商业化成品为设计目标,可根据个人的方向或擅长的技术锁定其设计产品所使用的工艺技术(织、染或两者兼顾)。通过原创作品的制作(整体过程的实际应用)加强应

用能力和创造性。

### 2. 韩国弘益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在弘益大学美术学院的纤维美术时装设计专业中,课程目标为施行纤维美术和时装设计等相关的理论和技能教育,培育从事纤维美术以及时装等各领域的人才。在课程当中引导学生学习纤维美术的艺术表现方式和创作倾向,提高能主导高附加值的时装创作领域设计师的创造能力。其本科专业课程包括:纤维基础造型、纤维艺术论、纤维服装平面设计、染色织物设计、时尚造型基础、时装绘图、服装造型、现代服装设计概论、立体裁剪、时尚插图研究、全球时尚商品化、平面图案设计等课程。

弘益大学的专业特色在于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任职与各个纤维和时装相关的企业:纤维贸易公司、装修设计公司、室内设计公司、汽车企业等;也可以成为纤维和时装杂志的记者、时装协调员、电影和游戏领域的设计师、舞台设计师等。专业的教学宗旨是通过时尚领域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 二、国内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

### (一)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在我国内地现有的纺织类专业教学体系中,大部分的基础和专业课程是以工程类课程为主,实践、创新类课程较为匮乏。正如楼利琴等<sup>[10]</sup>所剖析的,目前教学体系中培养的目标是以加强分析翻样能力和提高生产制造技术的应用能力为主,缺乏纺织品设计创意、实践类课程以及可提升学生手工制作能力的工艺操作课程。冯飞芸等<sup>[11]</sup>提到高校对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缺乏重视。董震等<sup>[12]</sup>和祝洲杰等<sup>[13]</sup>也提出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体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导致境内学生的原创设计能力和实践制作能力与境外的纺织品设计院校的学生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

### (二)港台地区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 1.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香港理工大学服装与纺织专业课程当中学生将根据专业成绩以及职业理想,从服装和纺织设计、服装和纺织营销、时装零售、时装、纺织技术和服装产业内部、针织服装设计和技术这六个专业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进行深入学习。其课程特点为培养出的学生除了具备专业能力外还具有团队合作、领导、有效沟通能力,企业家精神以及终身学习精神,还具有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具备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服装与纺织本科课程特色项目见表4。

表4 香港理工大学服装与纺织本科课程特色项目

项目	特色专项能力	核心能力-专业技能
1	资源整合能力	文字表达、口语表达、合作、协调
2	实践力	批判思考、解决复杂问题、 技术设计、设备选用
3	创意力	创意力、原创力
4	人文情怀	合作、协调、解决复杂问题

## 2. 台湾辅仁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台湾辅仁大学艺术学院应用美术学系的艺术与文化创意专业课程的目标在于厚植与培养文化创意产业跨领域整合与经营管理人才,以增进产业进步与发展。其课程的教育目标是推动人文情怀与服务,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培养跨领域文创产业创意整合人才;强化学生的实务能力与文创产业接轨。其课程的特色可以归纳为四大项专业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实践能力、创意能力以及人文情怀。

目前境内的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境外纺织类高校中的培养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专业分流时间上的差异外,在本科教育阶段的课程结构与时间安排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境内外的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梳理、分析和比较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总结境外的特色教育模式,并结合我院纺织专业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使学生能够主动自觉的学习纺织类专业内容,通过独立的思考、分析、探索、实践来完成学习目标。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形成一套自己的思维探

索方法,以开放性的思维解决实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寻找创新思维和可行性制作工艺之间的平衡。

## 三、国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

在欧美国家(地区)的纺织类专业课程培养模式中,特色的地方在于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项目制”教学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块以及文化研究教育模块。除此以外,还非常注重过程教育,即设计概念和设计制作过程。

## (一)境外学院纺织类专业教育模式横向对比结构与时间安排

与境内专业设置情况相似,英、美、日等境外院校的纺织类专业也分为纺织品设计和纺织工程两种方向,纺织品设计类的院校的教育模式以文化研究、工艺图案设计以及成品设计制作为主,注重设计方法的培养,工艺技术的学习以及设计概念的创新和突破;而工程类院校的教育模式则以纤维材料加工、成型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模拟为设计辅助,侧重于功能性和实用性。但不同于境内的培养模式的是英、美、日等境外国家(地区),特别是英国纺织类专业更注重专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技术的传承。所以在培养模式中除了鼓励学生花费大量时间练习纺织工艺技能,更引导学生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设计主题,以灵活变通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归纳方法。欧美、日韩以及港台地区纺织类专业设置见表5。

表5 欧美、日韩以及港台地区纺织类专业设置

国家(地区)	学校分类	学校	专业名称
美国	艺术	罗德岛设计学院	纺织品
		纽约时装设计学院(FIT)	纺织品/表面设计,布料造型
	工程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纺织工程
英国	艺术	伯明翰艺术学院	纺织品设计(纺织构造、纺织印刷和表面设计、刺绣设计)
		利兹大学	纺织品设计
		伦敦时装学院	时尚纺织品(刺绣、印染、针织方向)
		中央圣马丁设计与艺术学院	纺织品设计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纺织品设计
	爱丁堡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纺织品	
工程	曼彻斯特大学	材料科学与纺织技术工程	
欧洲	艺术	马兰欧尼设计学院	纺织与表面设计
		法国时尚学院(ESMOD)	纺织品/表面/材料设计
		欧洲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纺织品设计方向
		奥斯陆国立艺术学院	纺织品艺术
	工程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材料与纳米技术工程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表5续

国家(地区)	学校分类	学校	专业名称
日本	艺术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	时尚纺织品
		日本多摩美术大学	纺织品设计
		女子美术大学	染织品设计
	工程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设计经营工学,尖端纤维科学
韩国	艺术	弘益大学	纤维美术时装设计
		建国大学	纺织品学
港台	艺术	台湾辅仁大学	艺术与文化创意(纺织品方向)
	工程	香港理工大学	服装与纺织品

以英国本科教育模式为例,其课程结构及时间安排见表6,可知英国课程内容、时间安排、形式以及学生学习形式上的特点。

表6 英国课程结构及时间安排

模块分类	英国纺织类专业
课程内容	文化研究课、理论课、实践课
时间安排	灵活(可预约)
课程形式	一对一讨论
学习形式	自主学习

## (二)境外纺织品专业课程中的特色模块

通过对境外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模式的梳理,可归纳出三种模块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块,“文化研究”教学模块,“项目化”教学模式。

### 1. “自主探究”学习模块

在境外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特别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模式当中,“自主探究”学习模式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和个人学习方法的养成,通过学生独立的思考、分析、探索、实践来完成学习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判断质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想象创新能力,理解能力,自我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探索方法,以开放性的思维解决实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寻找创新想法和可行制作工艺之间的平衡。

在“自主探究式学习”教育模式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老师的监督与引导下,以灵活的学习方法掌握知识,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通过阅读推荐书目和其他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收集实践技术资料,完善纺织品设计相关知识储备。

### 2. “项目化”教育模式

与境内传统的课程安排不同,英国的设计学院主要采取“项目化”的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学生以老师规定主题项目,以个人或是小组的形式发展设计概念,并利用学习到的纺织制作技能独立完成面料的设计与制作。此种教育模式与国内传统的课堂作业形式相比更能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以及综合设计能力。在“项目化”教育中所使用的小班化讨论模式,一对一指导模式以及一对多项目陈述模式,与国内的教育模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程度更精准的给出评价。并在过程中引导,促进学生进行设计反思,以此提升专业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深入思考以及跨领域思考能力,经过一对一的讨论引导学生从概念衍生出设计思路,再根据设计思路制作小样和作品。

### 3. “文化研究”教育模块

“文化研究”是针对论文以及主题研究的,一种可跨学科应用的创新研究方法和教育模块。在此模块中将锻炼学生的归纳能力以及深入思考能力:如何把个人经验、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等总结为“文化现象”,并在研究此种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发现文化与人类活动、人类表达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间的关系。

“文化研究”也是锻炼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的一种方式:综合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历史、人类文化学和经济学跨领域多角度的探索,并解决现代社会的新问题,突破常规模式寻找答案,通过“文化研究”模块教导学生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和开拓性的思维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和境内纺织类教育模式相比,这三种模块模式的特色在于强调学生自主意识的提高,让学生通过各个项目化的模块学习,在工坊实践中解决实际操作的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相比较下国外的长时间工坊制作环节除了能够在实践的同时加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设备的理解能力,更能在

摸索和尝试性的实践操作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和设计思路。与境内理论教条式的教育模式相比,在实践中创新更容易开发出突破传统的设计产品。除此以外,“文化研究”教育模块更是特色显著,此模块能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发展观,树立文化传承,以及运用设计改变生活的目标。

#### 四、优化方案

通过比较梳理境内外纺织专业类院校的课程设置及培养模式的差异,可看出境外的纺织专业类学生在工艺制作、概念创新方面都更加具有独创性和个人风格。其思维模式能够有效的在未来工作当中灵活变通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不足之处是境外的艺术类院校为了减少思维的局限,对纺织工艺基础方面的理论知识教学较不深入,可能会导致学生的创意想法在工业化生产当中遇到一些工艺、材料应用上的问题。因此,本文针对中国内地高校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参考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特色模式模块,提出设置三个可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增加纺织创新人才的多样化。

##### (一)个人学习方法、设计方法研究模块

借鉴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纺织高校,特别是英国纺织类专业教育中的“自主研究”、“项目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指导的学习的形式,引导学生形成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以及研究方式,并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并以具体的设计实践项目巩固其设计方法。在教学以及与工厂协作的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实操与设计实践能力,也将衔接学校教育和企业实际需求。

此模块可与专业基础课结合,使学生在课程中老师的指导下,尝试使用自己的学习、研究方法实践操作完成设计作业,课程作业的形式与内容还可与企业实际设计需求相结合,此种合作形式不但可以鼓舞学生做出更好的设计作品,还可以有效地和企业对接。

##### (二)文化、传统工艺研究创新模块

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境外教育体系中也是贯彻始终的一大方针,特别是日本纺织类院校。对传统工艺以及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纺织类院校的愿景之一。因此文化、传统工艺研究创新模块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此创新模块可与毕业设计相结合,在选题中增加文化研究、工艺创新等研究类的设计主题。为传

统技艺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研究目标,使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的同时为维护、传承和创新提出构想,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技术的现代化进程。

##### (三)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块

参考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中设计实践以及实验操作的课时比例,以基础知识为主,实践操作为辅的学习模式,增加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块。以开放性的主题概念和成品形式促进学生的跨学科思维拓展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设计制作能力,提高学生个人特色以及全方位素质,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社会,且对时尚领域做出贡献。

该综合设计模块可以课程作业形式穿插在专业基础课程中,并结合各类纺织相关设计比赛或是设计展览的主题概念,在学生工艺学习的基础上,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完成。

#### 五、结论

境外纺织类院校的纺织品设计专业普遍采用“自主探究”、“文化研究”、“项目化”特色教育模式,不但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实际设计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的创意思维,发展个人特色。因此,参考境外纺织品专业教学模式是提高我国高校纺织品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举措。通过研究与分析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的教学模式,可以增加三个供学生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个人学习方法、设计方法研究模块”,“文化、传统工艺研究创新模块”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块”。此类创新模块的增加有利于构建纺织品设计人才多样化的培养模式,从而实现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差异化、多元化。

##### 参考文献:

- [1] 夏雨.包豪斯教育理念及其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借鉴意义[J].天中学刊,2016,31(6):149-150.
- [2] 倪明.英国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启示:以纺织品艺术设计专业为例[J].纺织服装教育,2015,30(4):343-344.
- [3] 石晶.英国高校“能力教育”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5(3):53-55.
- [4] 张建辉.英国创意人才培养对我国艺术教育的启示[J].纺织服装教育,2014,29(1):89-90.
- [5] 殷沛枫.浅谈包豪斯教育体系对现代设计教育的影响[J].艺教论坛,2017(2):157-159.
- [6] 王军亮.论包豪斯时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针[J].艺术大观,2017(6):129.

- [7] 睦建华,王国和,杨旭红,等. 纺织品创新设计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 纺织教育,2011,26(5):355-383.
- [8] 杜群. 关于时尚产业背景下传统的纺织类设计专业改造的思考[J]. 纺织服装教育,2015,30(6):446-448.
- [9] 刘杰.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纺织品设计教学[J]. 纺织教育,2010,25(3):42-44.
- [10] 楼利琴,张才前. 创意产业背景下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思考[J]. 纺织教育,2014(3):113-115.
- [11] 冯飞芸,朱诗威,韩晶晶,等. 纺织类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现状与对策[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4,32(2):170-174.
- [12] 董震,丁志荣. 产业升级加速背景下纺织高等教育:以南通大学为例[J]. 纺织教育,2012,27(2):100-104.
- [13] 祝洲杰,竺志超,谢剑云. 从企业用人模式谈学生工程能力培养与实践教学模式改革[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2,29(3):428-430.

##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textile design major

WANG Yangzi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Silk Institut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alents in textile design major belong to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basis for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into fashion industr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textile design major of China mainland and generaliz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textile design major of China mainland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Jap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and Taiwan.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utside of China mainland mode and China mainland mo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textile design major,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of talent training of textile design major in Chines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optional professional innovation module, a new diversified talent training mode was built to achieve differential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extile design major.

**Key words:** overseas; mainland China; textile design major;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责任编辑:王艳娟)

# 高校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

陈毕晟,方平,陈蔚

(浙江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杭州 310018)

**摘要:**校友资源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也是助推高校发展的多元动力之一。植根于国家“双创”战略需要,文章提出以高校校友协同学校“双创”人才培养的理念,对高校校友资源在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机制、所应承担的角色和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索。凝练出“四位一体”校友协同育人工作体系、“三个一”校友协同育人工程、“三化两联合”校友导师育人工作机制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资源整合路径,提出了个性化与项目化相结合、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工作思路,总结了在校友资源参与下的“双创”人才培养成效。提出的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探索可为其他高校开发、整合校友资源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提供经验和参考。

**关键词:**高校校友;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校友资源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80-05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大学作用与功能的共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人才培养是我国大学的核心工作和第一要务<sup>[1]</sup>。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而校友资源是学校最富饶的人才资源。”<sup>[2]</sup>高校校友资源具有丰富性、潜在性和可持续性,是高校得天独厚的育人资源。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校友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和帮助。校友资源是高校的社会资本,也是学校重要的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公共关系资源、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sup>[3]</sup>。高校的人才培育不同于中小学的人才教育,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要紧密结合专业、行业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此,校友如何配合学校的人才培育,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在人才培育中形成价值共识,并最终实现双赢选择,这是当前高校校友工作所要思考的共性问题,也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sup>[4]</sup>。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成立了校友专职工作机构,相对来说,知名高校和东部高校发展较快,也

发展得较好<sup>[5]</sup>。在校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方面,已有不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湖南大学汪建武<sup>[6]</sup>提出校友资源开发中“科学性”、“情感性”、“互利共赢性”和“可持续性”等理论原则;西安理工大学陈瑞<sup>[7]</sup>提出利用“一卡、二刊、三网、四库”加强校友载体和平台建设的方法。以上文献为校友资源的开发研究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一些工作思路和方法。但目前大部分校友资源研究主要是探讨如何利用和开发校友资源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sup>[8]</sup>,鲜见关于校友参与高校“双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深入探讨,实践案例则更少。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一词由此开始走红。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予以推动,并将“双创”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双创”战略对高校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培育“双创”人才也成为高校的时代使命之一。本文结合当前形势和笔者所在高校的校友工作特点,以校友资源为依托,构建了独具特

色的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工作机制,把校友资源有机融入到学校“双创”人才培育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

## 一、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理念及设想的提出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而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是体现教育教学成果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探索,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应用型、研究型、综合型等高校基本人才培养的理念而言,培育“双创”人才的理念定位,更切合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这既是对高校传统人才培养理念的进一步优化,也是对目前“以能力、素质培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提升。但就实际而言,当前很多高校在培育“双创”人才过程中,都遇到了课程设置、实践基地、师资配备、资金配套等核心教育要素缺乏的实际问题,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双创”人才培育的规模和质量。本文认为,坚持把校友资源作为学校可争取、可依托的重要办学资源之一,充分重视和释放广大校友所积累创新创业的实践经验、人生智慧、财富资金、社会资本等对学校培养“双创”人才的独特价值和积极作用,树立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工作理念,才能实现校友内蕴的资源优势和学校日益凸显现实需要之间无缝对接,也就是把校友资源内在特点和高校培养双创人才实践呼唤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充分展现出来,体现高校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的内涵,切合当前科教协同创新的时代要求。

## 二、校友资源整合体系路径的构建

校友资源既有可积聚的优势,也有易分散的特点,在利用校友资源培育“双创”人才的过程中,重视校友资源的挖掘和引入,可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友资源整合体系。对此,本文从“工作体系、育人模式、工作机制、基金运作”四个方面构建了独特的“双创”人才的协同培育体系。

第一、构建学校、学院党政班子、学院校友联络服务中心、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四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图 1)。充分发挥并调动各级组织及校友会的力量,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整合校友资源信息,深入挖掘校友资源;各学院可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动员专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骨干等力量,强化校友资源的挖掘和联络,增强与校友的交流,促成校友资源与学院、学生需求的有效衔接,不断增强校友参与学校育人工作的热情。笔者所在的

高校 2012 年开始实施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制度,目前聘任的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已覆盖全部班级;2013 年学校成立学院校友联络服务中心,这支由学院学工办主任、行政办主任、系主任、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等组成的学院校友联络服务中心队伍能够使校友资源有效地融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学校则相继成立各层级的学校、学院各地方、行业、专业校友会组织,2015 年学校成立校友导师联盟;这些都成为了对接校友资源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图 1 “四位一体”校友协同育人的工作体系

第二、构建“三个一”工程校友协同育人模式。即通过“一班级一校友导师、一专业一校友基地、一学院一校友协同育人品牌”的校友协同育人工程,让校友参与到学院、学生班级集体建设、专业技能培养、实践课程教学等人才培养各个方面。“一班级一校友导师”就是让校友走进每一个学生自然班,在生涯规划制订、专业能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一专业一校友基地”就是让每个专业的学生走进校友企业的实习基地,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一学院一校友协同育人品牌”就是各学院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打造适合学生发展需求和校友资源优势相结合的育人品牌。“三个一”工程的实施能够实现优质、多元的校友资源进班级、进专业,使校友资源的覆盖面、惠及面不断提升,并形成具有专业特点、学院特色的校友协同育人品牌。

第三、建立和完善校友导师工作机制,依托校友导师团队和校友课堂,打造多层次、多行业的企业家创业导师队伍。实施“校友导师全程化、培育方案个性化、创新项目实战化”和“理论+实践”、“课堂+基地”的系统培育模式,如图 2 所示。在引进校友导师资源的同时,按照“以管理增实力,以服务促发展”的思路,积极打造一支热情高、素质硬、效应强的高水平校友导师队伍。通过制定《校友导师职责》,明确校友导师工作目标体系,规范校友导师的准入、聘任、考核制度,能够有效推动校友导师的自我管理、

自我提升和协同发展。2015年3月21日,笔者所在的学校组建了校友导师联盟,通过联盟执委会与全体理事的努力,充分凝聚联盟校友导师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学校协同育人中。同时,也搭建起一个校友导师相互增进交流、促进合作、资源共享的大平台,截至目前,校友导师数量已近50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毕业5至10年的年轻校友,该机制体现了校友资源参与高校育人的模式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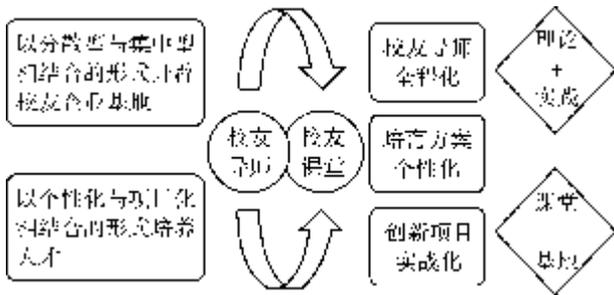


图2 “三化两联合”模式创新示意

第四、优化校友基金运作模式,以项目化的思路,提升校友基金在促进“双创”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将以往校友反哺母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的传统形式改设为“双创人才培养基金”,把基金的激励效应体现到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的过程之中,如由校友导师联盟发起的项目孵化培育项目,由学校和校友企业共建的孵化基地、实践平台和人才培养基金等。一改原有的奖学金评比模式,通过以赛事促实训、以竞赛评优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市场研判能力,培养适应市场所需的创新创业人才。

### 三、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 工作体系思路的建立

“双创”人才应具备创新创业所需的素质、能力、水平等多种要求,较纯粹的应用型、研究型人才,其培育过程势必要突破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更多地体现为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相结合、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训相结合。结合校友资源和学生需求,按照个性化与项目化相结合、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思路,才能构建起“从启蒙教育到技能辅导再到项目实战”的一站式“双创”人才培养平台,形成极具特色的工作体系。

#### (一) 实施创业的启蒙教育

通过让校友导师担任学生创新创业导师,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素质能力培养,激发潜能。如:学校法学院联合校友导师成立“法商协同育人中心”,

开设“模拟法庭”,以案说法,传授实务经验,包括案例筛选、诉讼文书撰写、庭审活动排演、诉讼技巧等等,让在校法科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学校另一学院聘请校友担任“校友课堂”创业导师,合作培养“卓越服装设计师”,为“创业训练营”的学生开特殊课程,由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组成核心团队,校友导师除了开展课堂式的创业教育之外,还开设实战实训课,培养学生的市场研判、团队管理、营销策略等创业技巧和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创业启蒙教育形式。

#### (二) 实施校友基地的创业孵化

通过利用校友基地资源,为学生的初创项目,提供微型企业发展所需的导师、技术、经费、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如笔者所在高校“麦扑”、“隐蔽者”、“无象皮具”等从孵化园走出去的创业项目已被业界所认可。校友导师联盟组织开展的“创客”项目,通过以校友导师为主导的精英成长营、资本项目相亲等形式,为学生提供点子培育、项目启动到加速提升的全程扶持。目前,两年已有二批近50个项目已得到校友导师联盟育人基金单项最高5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以及校友创意产业园的场地优惠配套政策等。这些都是大学生创业孵化的典型案例。

#### (三) 实施校友企业的创新实践

专业技能培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实践环节则尤为关键。在实践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可以依托校友导师实习实践基地来协同育人,提升素质能力为导向的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如经管学院实施了彩虹引领工程,把“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作为七类不同职业发展方向,每种颜色均相应配有资深的校友导师做“教练”,对学生进行全程式的分类指导和岗位实习,构建起精细化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创新能动力。截至2017年,在近100家校友导师企业建立的实习实践基地,每年有数千名学生到校友企业实习实训,以学习促实践、以实践带创新,加强学生在实践创新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等专业素质和非专业素质的提升,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 (四) 实施校友文化育人

校友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一所大学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办学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支撑。学校高度重视校友文化建设,以项目化、品牌化经营的理念,不断丰富校友文化内涵,增强校友文化的感染力、引领力和辐射力。

如学校通过开展多种主题的校友文化活动,积极弘扬“关爱、感恩、传承、共赢”的校友文化,组织开展如“校友文化节”、校友大讲堂、校友故事汇、“感恩言行形象大使”和“感恩言行之星”评选活动、“弘扬校友文化,争做模范公民”演讲比赛、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等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文化活动载体,学校与校友、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在校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更为紧密,校友协同“双创”育人工作更加深入。

本文提出的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育工作体系,可以深度有效地挖掘校友资源,充分利用校友自身的优势,激发校友参与学校培育“双创”人才的热情。在这个工作体系的指导下,笔者所在的高校在“双创”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鲜明的成效。

#### 四、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成效的表现

在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过程中,充分挖掘校友自身所经历和储备的创新创业精神等多方面优势,能够极大地丰富“双创”人才培养的实践,赋予其时代内涵,浓厚学校的育人氛围。以下是笔者所在高校在实行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体系后涌现的典型案例。

##### (一)大学生“双创”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

校友参与学校“双创”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和主人翁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校友导师的积极参与和辅导培育下,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和氛围不断增强。近三年来,创业项目和团队150余个,数十个创业项目或创意工作室进驻企业、社区和创业园区。在校期间创业的杭州麦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主要与旅游局合作,共同开发手机自助旅游导航软件,得到了天使基金380万的首轮投资。由学院组织教师和校友导师指导的第二期浙理创客项目《TOING(途影网)——杭州乐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荣获浙江省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类金奖,《原创街头服装品牌 Be Your Muse》项目黑白鸭舌棒球帽成为网红品,等等。

#####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得到有效补充

几年来,学校校友导师团队积极深入班级、走近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学生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据统计,从2012年至2016年,校友导师参与学生的专业指导、职业规划、就业创业、心理健康、班团建设等活动达500余次,参与校友达6000余人次,参与学生近50000人次;在杭州经纬国际创意产业园等校友企业建立“双创”人才培育基地和实习实训基地近100个,每年吸纳数千名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效应进一步增强。

##### (三)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丰富

学校各学院依托校友资源,结合学科专业特色,积极实施校友协同育人的项目品牌战略,优化“校友大讲堂”、“校友故事汇”以及学院的校友协同育人品牌,全方位、多角度地用校友文化激励学生,形成在校自我参与、自我发展、自我成才的良好氛围。如生命科学学院“生命之树”、艺术与设计学院“麦扑人才培育项目”等等。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引入校友课堂,为学校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延伸和补充,弥补教学中教学实践基地、教学师资力量、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资金等方面的不足,既拓宽了学生视野,完善了学生知识结构,又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 五、结 语

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是对拓宽人才培养的新尝试。探索与实践表明,校友资源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学术科研、文化交流与传承等方面的积极效应日益明显,尤其在推动学校“双创”人才培育过程中,校友的情感认同得到进一步升华,可最大化地发挥校友资源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因此,在校友协同育人体制机制、校友资源整合运用、校友企业创业孵化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加以探索和完善,有利于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助推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为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的“双创”人才。

#### 参考文献:

- [1] 詹美燕,楼建悦,郑川.高校校友资源应用于育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大学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3(4):86-89.
- [2] 杨韶昆.高校校友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3):396-400.
- [3] 韩丹.高校校友资源管理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7:6.
- [4] 贺美英,郭樑,钱锡康.对高校校友资源的再认识[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6):78-82.
- [5] 雷旭东.让校友资源成为促进大学建设发展的重要源泉[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11(2):24-26.
- [6] 汪建武.高校校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
- [7] 陈瑞,孙卫,曹长征.高校校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初探[J].高教学刊,2016(11):194-195.
- [8] 钱晓田.社会资本视域下高校校友资源的创新整合[J].南京社会科学,2016(9):88-93.

##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lumni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CHEN Bisheng, FANG Ping, CHEN Wei

(Alumni Affairs Offic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lumni resource is the multi-dimensional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and also is the important social resource. Based on the need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ultivation conception of university alumni participating in the co-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made an exploration on the role and action of alumni resources in the co-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and summarized the unique alumni resources integration paths such as “Quaternary” alumni work system, “Three One” alumni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program, and “Three in One and two combinations” alumni tutor working mechanism.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working ideas of alumni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ersonalization and project integration, dispersion and concentration combination, summarize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training effect under the participation by the alumni resources. These experienc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alumni resources.

**Key words:** university alumni;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lumni resource

(责任编辑:王艳娟)

# 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与演化路径分析

##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赵春鱼<sup>a</sup>, 刘培峰<sup>b</sup>

(中国计量大学, a. 高等教育研究所;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28)

**摘要:**以2011年1月至2017年6月被CNKI检索的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 5.0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探讨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时空分布、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师范类高校研究人员为研究主体;研究热点聚焦于大数据、信息技术和个性化学习等领域;研究角度和内容经历了对海量数据的“解释分析”到“主动引领”的变化。

**关键词:**学习分析技术; CiteSpace 5.0; 热点领域; 演化路径; 科学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85-06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相关研究领域的大量使用,教育领域充满海量数据信息。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需要教育技术领域进行技术革新,这促进了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学习分析技术概念在2011年的首届“学习分析和知识国际会议”中被提出,会议对其定义是:学习分析技术是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有关学生及其学习环境的数据,用以理解和优化学习及其产生的环境的技术<sup>[1]</sup>。《2012NMC地平线报告(高教版)》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学习分析技术是指对学生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以评估学生的学术进展、预测学生未来的表现,找到学生潜在的问题<sup>[2]</sup>。由此可以看出,学习分析技术是以学生及其学习环境为研究对象;以海量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提取、归类、分析和总结,进而对学生学习状态和教学成效实现统计、测评和判断。

学习分析技术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被运用到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其中美国新媒体联盟(NMC)所发布的年度地平线报告已成为国际研究学习分析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早在学习分

析技术这一概念产生以前,与之相关的技术、工具和平台就已经开始了基础性研究,为学习分析技术的产生、发展奠定基础,如通过交互文本、视频、音频和系统日志来对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信息等内容进行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有参与度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方法等。早期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以结合学习分析理论开发学习分析的应用软件和在线学习平台为主;随着对学习分析应用研究和平台创新不断深入,开始转向实践应用,并围绕教与学的主题研究不断细化。那么,迄今为止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展如何,取得哪些实质性突破,当前研究聚焦于何处以及将来会往哪方面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本文借助CiteSpace 5.0对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可能趋势进行可视化文本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把握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现状。

###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鉴于学习分析技术概念于2011年正式被提出,因此本研究将文献时间点截取为2011年1月—

2017年6月;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学术文献较为集中的网络检索平台,因此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被CNKI检索的正式发表文章。以“学习分析技术”为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得到263篇文献。剔除与主题不符合的研究文献后共得到260个分析样本,其中期刊文献215篇,学位论文45篇。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与情报学学院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5.0对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展进行知识图谱分析。CiteSpace是一个文献挖掘可视化软件,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来帮助读者理解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它既能够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状况,也能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和发展前沿进行探测。具体做法是将从知网下载好的260篇文献数据输入到CiteSpace 5.0软件中,将网络节点类型选择为词共现、关键词共现分析等,选择标准为每个时间切片前30%的数据,同时选择默认的阈值,运行CiteSpace 5.0软件得到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图,并根据图谱进行研究和解读。

**二、研究结果**

**(一)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时空分析**

**1. 时间分布**

从每年的文献量可以看出领域研究的热度。分析最近几年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的年度分布(见图1),发现学习分析技术自2011年正式提出以来,研究热度逐年上升,2013年以后成倍增长。从侧面提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发展的潜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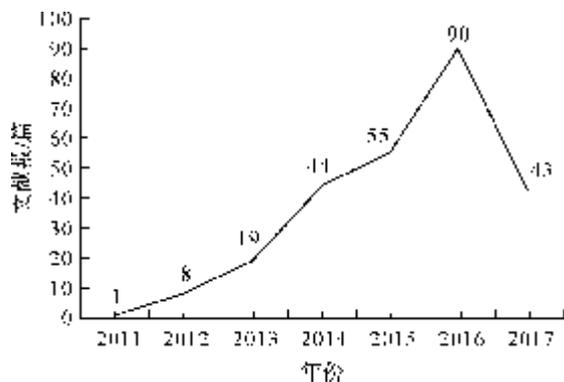


图1 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刊出年份一览表(2011—2017)

**2. 空间分布**

统计发现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机构以高校为

主,且高校间分布不均衡。通过对排名前十位的机构发文数量分析(见图2)东北师范大学有23篇(14.74%),华东师范大学有19篇(12.18%),北京师范大学有14篇(8.97%)、华中师范大学有14篇(8.97%),浙江工业大学6篇(3.85%),可以发现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高校。笔者认为,学习分析技术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的学习现象,从属于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与师范类院校的研究对象交叉、重合,且教育技术类学科在综合性师范类院校的布点最多、最广。但从一个侧面也提示,由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知识壁垒较高,一线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研究缺乏计算机、教育技术等知识储备,致使将学习分析技术全面运用于日常教育教学改革还有一定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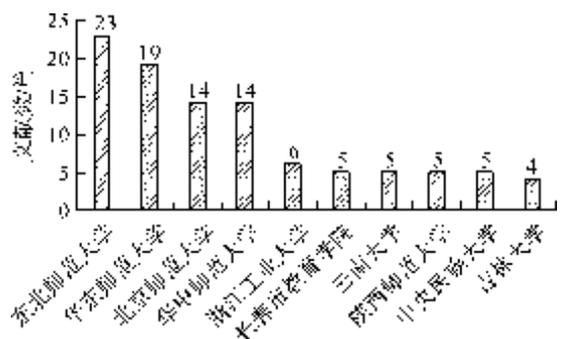


图2 排名前十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分析

如图3所示,在对260篇学习分析技术论文的作者进行数据统计会发现,发表有关学习分析技术的论文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赵蔚教授,发表了11篇论文;其次是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姜强教授,发表了8篇论文;排名第三位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的顾小清教授,发表了8篇论文。这表明他们是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也进一步说明师范类高校的教育信息技术专业是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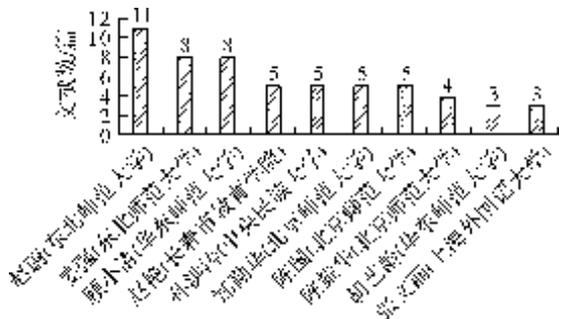


图3 排名前十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作者分析

### 3. 期刊分布

从期刊来源看,主要集中于教育信息技术类期刊,包括:中国电化教育 15 篇(10.56%)、中国教育信息化 15 篇(1.56%)、电化教育研究 13 篇(9.15%)、开放教育研究 11 篇(7.75%)、远程教育杂志 9 篇(6.34%)等。笔者认为,由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本身的跨学科性壁垒,研究专业性较强,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专业性期刊中,教育类综合性期刊发文较少,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尚停留在技术层面,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有待加强。

#### (二) 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用来表述文献的主题、内容、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的关键性词汇,主题词是从文献标题、摘要、关键词和索引词位置提取的名词性术语。在 CiteSpace 中同时选中“关键词”和“主题词”进行共词网络分析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也即研究热点。通过“Node Types”和“Top N per slice”设定,剔除“学习分析”和“学习分析技术”节点后,得到“学习分析技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2011—2017)”(详见图 4),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关键词或主题词的词频大小,连线代表两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圆点大小和连线的厚度代表着中介中心。

CiteSpace 中  $Q$  值(Modularity)和  $S_i$  值(Silhouette)是衡量聚类效果的关键指标,一般认为, $Q > 0.3$ , $S_i$  值越接近 1 时说明聚类效果越好。如图 4 所示,在本研究的聚类中, $Q = 0.6338$ , $S_i = 0.7368$ ,说明本研究所得出的聚类网络是稳定的。



图 4 学习分析技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分析(2011—2017)

从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两个维度探索当前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热点。首先进行高

频关键词分析(具体见表 1),出现频率较高的依次是“大数据”、“分析技术”、“数据挖掘”、“信息技术”、“MOOC”、“个性化学习”、“学习过程”、“可视化分析”、“学习行为”、“社会网络分析”等,反映了目前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大数据”出现频次最高,远远大于其他高频关键词,说明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中,大数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背景,也可以理解为学习分析技术是大数据研究在学习领域的一个深化。

表 1 排名前十位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频次
1	大数据	52
2	分析技术	24
3	数据挖掘	18
4	信息技术	16
5	MOOC	16
6	个性化学习	12
7	学习过程	10
8	可视化分析	9
9	学习行为	9
10	社会网络分析	8

其次,进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分析。中介中心性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弗里曼提出,它测量的是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对”的“中间”。他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者位于其他行动者中间,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sup>[3]</sup>也即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可以提示两个研究领域的转换或连接。由图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大数据”、“MOOC”、“信息技术”、“分析技术”所对应的关键词节点的中心性都大于 0.10,这表明它们具有高中介中心性,也说明它们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且“信息技术”的中心性值则远远大于其他中心性关键词。从排列位置来看,“信息技术”位于“大数据”、“数据挖掘”等聚类与“学习过程”、“分析技术”等学习相关聚类中间,由此不难得出“信息技术”是“大数据”与学习研究领域的中介作用,即借助信息技术将大数据与学习研究领域相连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倒逼传统“教”与“学”活动变革,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使得 MOOC、SPOC 等在线学习得以实现并扩散,学生学习痕迹被全部保留,从而使得学习分析成为可能。由此不难理解,信息技术成为大数据研究领域与学习研究

领域的中介。此外,同时大数据还连接了互联网、智慧教育与个性化学习。同理,大数据的使用使得具有高度私密性的学习信息能够被抓取、分析,并由此形成服务于个性化学习的智慧教育。

表2 排名前十位的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中心性
1	信息技术	0.50
2	分析技术	0.27
3	大数据	0.20
4	Mooc	0.12
5	学习行为	0.07
6	非正式学习	0.07
7	学习过程	0.06
8	数据挖掘	0.05
9	高中信息技术	0.05
10	社会网络分析	0.04

第三,比较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发现关键词“大数据”出现的频次大于“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关键词的中心性值又大于“大数据”,表明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中,“大数据”是研究热点,是大多数研究开展和实施的基础和背景;“信息技术”是连接大数据研究与学习领域研究的关键节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与发展影响着学习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并日益成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重点。

### (三)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演进路径分析

为了解不同时间段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学习分析技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2011—2017年)”的基础上绘制了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前沿关键词时序知识图谱(见图5)。发现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2年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为2013—2014年的起步时期;第三阶段为2015年以来的全面腾飞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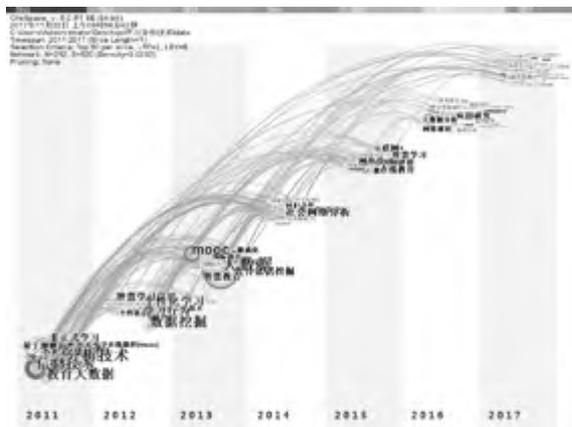


图5 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前沿时序图谱(2011—2017)

#### 1. 奠基期:2011—2012年

2011—2012年作为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奠基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概念辨析、范围区分等,共搜索到相关文献9篇。从核心词来看,研究侧重点在于使用数据挖掘的分析技术工具或思路展开学习分析(见图5),如李青等<sup>[4]</sup>认为学习分析技术具有多样化的数据来源、现代化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可视化的分析结果、面向学生和教师等系列特点,数据挖掘方法和学习分析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分析技术;魏顺平<sup>[5]</sup>介绍了应用数据挖掘算法和工具将来自 e-Learning 软件系统(主要是网络教学平台)的原始数据进行挖掘的案例;张涛<sup>[6]</sup>介绍了电子档案袋的使用等。

#### 2. 起步期:2013—2014年

2013—2014年作为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起步时期,对其研究由原来的简单概念研究开始向深入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研究内容由抽象的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探索,两年共搜索到相关研究文献63篇。从图5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有大数据、MOOC、教育数据挖掘、智慧教育、社会网络分析、教学设计等等,体现了国内研究者对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如何通过学习分析技术为教育领域内各要素服务,国内对其研究进行了很多的实践性探索。具体研究内容包括:a)智慧教育:运用学习分析技术支撑智慧教育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清超<sup>[7]</sup>提出云计算理念下的智慧校园建设,并认为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技术是实现智慧教育的两大基石;b)MOOC中的学习分析技术。MOOC等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学习痕迹数据,研究者开始探索如何使用这些数据<sup>[8-9]</sup>。具有代表性的如胡艺龄等<sup>[10]</sup>通过对国际知名学者斯蒂芬·唐斯的采访,向国内学者系统介绍了数字化时代进行有效学习的解决思路,即通过知识点间的网络连接,帮助学习者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最初的联通主义和MOOCs中;c)学习分析技术在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中的其他应用,包括学业质量评价<sup>[11]</sup>、数字化(网络)学习<sup>[12-13]</sup>、培训活动<sup>[14]</sup>、远程教育<sup>[15]</sup>等。

#### 3. 腾飞期:2015年至今

2015年开始,国内学习分析技术进入全面深化发展时期。目前发表学习分析技术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有188篇。从图5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

的核心主要有智慧学习、在线学习行为、学习分析技术规范、混合学习等等。具体为:a)智慧学习。代表研究有吴红艳<sup>[16]</sup>设计并尝试应用了智慧学习视角下个性化在线学习系统,郁晓华等<sup>[17]</sup>提出了在线教与学的智慧教育,唐丽等<sup>[18]</sup>探索了智慧学习环境下基于学习分析的干预机制等;b)在线学习。有代表性的是郑勤华等人 2016 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从建模方法、课程评价、教师评价、学习评价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sup>[19-22]</sup>;c)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其他方面。包括规范性研究<sup>[23]</sup>、混合式学习<sup>[24]</sup>等。表明该时期的研究已开始深度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重视学习环境的优化和教学优化,通过借助建构结构应用模型和技术规范来对教育大数据潜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

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程来看,国内对于学习分析技术的研究早期(2014 年以前)侧重于对于海量互联网数据的适应性分析,研究的初衷是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并用以解释教育现象;后期(2015 年以后)研究的侧重点偏向于运用学习分析技术为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提供支撑。总体来说,学习分析研究呈现从教育数据的“解释分析”走向个性化学习“主动引领”的演进轨迹。

### 三、结 语

本文应用 CiteSpace 5.0,以多元、动态视角对学习分析技术概念自引入中国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信息挖掘、整理和知识图谱分析,进一步理顺近年来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时空分布现状、发展趋势和热点领域,从而为把握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现状提供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a)从时空维度来看,学习分析技术自 2011 年提出以来,引发研究热潮,研究潜力巨大;从研究机构来看,师范类高校引领了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流,主要研究人员归属于计算机或教育技术相关单位;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融入教育教学完整环节的程度不深。

b)当前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要聚焦于大数据、信息技术、个性化学习等领域。其中,大数据是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使得学习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得以实现,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成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关键。

c)学习分析技术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奠基期、起

步期和腾飞期的演变路径,研究内容从对现有数据的数据挖掘到运用数据引领和指导个性化学习的转变,总体而言体现对海量数据的“解释分析”到“主动引领”的转型。

### 参考文献:

- [1] 魏顺平. 学习分析技术:挖掘大数据时代下教育数据的价值[J]. 现代教育技术,2013,23(2):5-11.
- [2] Johnson L, Adams S, Cummins M. 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2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J]. New Media Consortium,2016,24(4):311-334.
- [3] 刘军. 整体网分析: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M]. 2 版.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9-130.
- [4] 李青,王涛. 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述评[J]. 中国电化教育,2012(8):129-133.
- [5] 魏顺平. 未来五年改变教育的六大技术及其对国家开放大学建设的启示[J].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6):1-5.
- [6] 张涛. 信息化环境下学习分析技术的应用探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S1):155-157.
- [7] 柯清超. 大数据与智慧教育[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13(24):8-11.
- [8] 程璐楠,韩锡斌,程建钢. MOOC 平台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及其影响[J]. 远程教育杂志,2014(2):58-66.
- [9] 徐华洋. 基于课程大规模开放的图书馆在线学习支持及其应用技术研究[J]. 现代情报,2015,35(12):134-138.
- [10] 胡艺龄,顾小清. 从联通主义到 MOOCs:联结知识,共享资源:访国际知名教育学者斯蒂芬·唐斯[J]. 开放教育研究,2013(6):4-10.
- [11] 恽敏霞,刘辉. 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区域性中小学学业质量综合评价模型[J]. 上海教育科研,2014(12):24-26.
- [12] 吴星阳. 学习分析技术在企业数字化学习中的应用与研究[D]. 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4:18-19.
- [13] 曾东薇. 学习分析技术在网络学习中的应用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13-14.
- [14] 辛宪民,赵燕. 探究干部培训应用新技术[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22):57-58.
- [15] 赵艳,赵蔚,姜强. 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效果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4(9):132-138.
- [16] 吴洪艳. 智慧学习视角下个性化在线学习系统设计与应用[J]. 中国电化教育,2015(06):127-131.
- [17] 郁晓华,江绍祥. 在线教与学集体智慧的有效利用:学习分析的视角与架构[J]. 开放教育研究,2016(03):98-106.

- [18] 唐丽,王运武,陈琳.智慧学习环境下基于学习分析的干预机制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02):62-67.
- [19] 郑勤华,孙洪涛,陈耀华,等.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综合建模方法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12):40-45.
- [20] 孙洪涛,郑勤华,陈耀华,等.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课程综合评价参考模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11):25-31.
- [21] 陈耀华,郑勤华,孙洪涛,等.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教师综合评价参考模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10):35-41.
- [22] 郑勤华,陈耀华,孙洪涛,等.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用:学习者综合评价参考模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9):33-40.
- [23] 姜强,赵蔚,李松,等.MOOC低完课率现象背景下的设计质量有效规范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1):51-58.
- [24] 石云,陈伟,管彦允.学习分析技术和计算机自适应测验在基于Moodle的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教育论坛,2016(24):212-213.

## A study on domestic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path of learning analysis technique based on the view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ZHAO Chunyu<sup>a</sup>, LIU Peifeng<sup>b</sup>

(a.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b.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CiteSpace 5.0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all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CNKI from January 2011 to June 2017. Besides,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research hotspot and change trend of domestic learning analysis technique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learning analysis technique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in which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ers are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studies focus on the domains of big data, information techniqu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e study perspective and content have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explanatory analysis” to “proactive leading” of massive data.

**Key words:** learning analysis technique; CiteSpace 5.0; hot field; evolution path;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责任编辑:任中峰)

# 大学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 ——基于个体社会化视角

甄月桥<sup>a</sup>,张殷鹏<sup>b</sup>,朱茹华<sup>c</sup>

(浙江理工大学, a. 机关党委;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c.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 杭州 310018)

**摘要:** 培养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校中, 缺乏对社会的认知, 为使大学生更好适应和服务社会, 不能忽视对其社会化的引导。而实现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就是通过自我概念的内化作用。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950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得分总体较高, 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在人口学上存在差异; 自我概念九个维度中除自我批评维度外, 其余八个维度均与六种类型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概念内容与结构维度上, 道德自我、自我行动对亲社会行为具有良好预测作用。正确把握认识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对促进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个体社会化; 自我概念; 亲社会行为

**中图分类号:** B84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9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sup>[1]</sup>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青年人做出的新判断、新要求。青年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社会化将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 积极探讨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的培养, 更有助于高校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个体社会化研究, 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烈耶娃认为:“个体社会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 个体通过学习知识技能、在人际交往中逐步获得社会经验的过程; 另一方面, 包括个体自我主动融入

社会环境, 积极参与社会关系互动的过程。”<sup>[2]</sup>可见, 个体社会化不仅是个体被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 更是个体积极内化观念、增强体验的过程。而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方面, 即: 个体行为模式如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宗教、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按照安德烈耶娃等人的观点, 个体社会化是外在教化影响与个体自我内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 在关注社会教化的同时, 我们更不能忽视个体社会化的内在动因: 自我概念对个体的积极引导与内化作用。

自我概念主要指, “个体在生活环境与人际交往形成的经验基础上对自身的一种综合看法, 包括个体对自我生理、心理、道德等多方面的自我评价”<sup>[3]</sup>。而亲社会行为通常指: “一切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且对他人和社会具有积极作用的行为, 如捐献、安慰、帮助、分享、同情与合作行为等。”<sup>[4]</sup>在自我概念与亲社

收稿日期: 2017-11-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1-26

基金项目: 杭州市软科学项目(20170834M48); 浙江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Xgz1709);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和课堂教学改革项目(jg20160055); 浙江理工大学党建与思政课题(DS201711Y)

作者简介: 甄月桥(1962-), 女, 江苏金坛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

会行为的关系问题上,王楠<sup>[5]</sup>研究发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在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间起中介作用。”但其缺乏对自我概念不同维度与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深入探讨。因此,笔者以个体社会化理论为视角,从自我概念内容和结构维度,深入挖掘其对6种类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寻找提升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有效途径及方法。

## 一、研究对象、工具和方法

### (一)研究对象

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6所高校,对性别、年龄、学历、生源地等进行随机抽取,覆盖文、理、工等学科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950份,获得有效问卷894份,有效回收率为94.1%。被试基本情况详见表1所示。

表1 被试基本情况一览表

分类	变量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495	55.40
	女	399	44.60
年龄	18~20岁	214	23.90
	21~22岁	348	38.90
	23~25岁	281	31.40
	26岁及以上	51	5.80
学历	本科	508	56.80
	研究生	386	43.20
生源地	农村	398	44.60
	城镇	273	30.50
	城市	223	24.90
专业	文科	247	27.60
	理科	318	35.60
	工科	329	36.80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399	44.60
	否	495	55.40
兄弟姐妹个数	1	390	78.80
	2	79	16.00
	3	15	3.00
	4	8	1.60
	5	3	0.60

### (二)测量工具

#### 1.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

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修订版),该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其中对反向计分题进行重新编码,共70题,涉及社会自

我(SO)、家庭自我(FA)、生理自我(PH)、心理自我(PER)、道德自我(ME)、自我批评(SC)、自我行动(B)、自我满意(SA)、自我认同(ID)9个维度和自我概念总分(TOT)维度。除自我批评为负向因子,其余维度均为正向因子。经检测,分量表和自我概念总量表Cronbach  $\alpha$ 系数在0.662~0.896之间,且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性较高,维度分量表相关较小,信效度达到要求。

#### 2. 亲社会倾向量表(PTM)

运用寇或修订的Gustavo Carlo编制的《亲社会倾向量表》,从“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按5点计分,共26题。包括匿名、公开、依从、利他、紧急、情绪性6个维度。笔者亲测,亲社会倾向总表Cronbach  $\alpha$ 系数在0.8以上;分量表 $\alpha$ 系数在0.6以上,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性绝对值在0.618~0.845之间,分量表的相关性绝对值在0.4~0.6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自我概念现状及人口学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90后大学生自我概念9个维度按项目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自我( $M=4.179$ )、道德自我( $M=4.024$ )、自我认同( $M=4.003$ )、自我行动( $M=3.783$ )、社会自我( $M=3.753$ )、生理自我( $M=3.751$ )、心理自我( $M=3.610$ )、自我满意( $M=3.516$ )、自我批评( $M=3.200$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大学生自我概念在性别、学历、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

#### 1. 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大学生在心理自我( $t=-2.303^*$ ,  $p<0.05$ )、道德自我( $t=-6.095^{***}$ ,  $p<0.001$ )、家庭自我( $t=-3.322^{**}$ ,  $p<0.01$ )、自我批评( $t=2.058^*$ ,  $p<0.05$ )、自我行动( $t=-2.479^*$ ,  $p<0.05$ )、自我认同( $t=-4.103^{***}$ ,  $p<0.001$ )和自我概念总分( $t=-2.835^{**}$ ,  $p<0.01$ )7项上呈显著差异,但在其他项三个项目上差异并不显著。除自我批评项外,其他维度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

#### 2. 不同学历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本科生与研究生在社会自我( $t=-3.650^{***}$ ,  $p<0.001$ )、生理自我( $t=-2.592^*$ ,  $p<0.05$ )、道德自我( $t=-2.446^*$ ,  $p<0.05$ )、自我行动( $t=-3.120^{**}$ ,  $p<0.01$ )、自我满意( $t=-2.346^*$ ,  $p<0.05$ )和自我概念总分( $t=-2.733^{**}$ ,  $p<0.01$ )6项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批评维度上,本科生得分高于研究

生,但在其他维度上研究生得分均高于本科生。

### 3. 不同年龄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18至26岁以上的大学生在社会自我( $F=4.146^{**}$ ,  $p<0.01$ )、自我行动( $F=4.292^{**}$ ,  $p<0.01$ )、和自我概念总分( $F=3.048^*$ ,  $p<0.05$ )3项上呈显著差异。经事后比较发现,在这三项上,21—25岁大学生得分高于18~20岁大学生。

### 4. 大学生在其他选项上的自我概念得分差异

大学生自我概念在生源地、学科分布及独生子女与否选项上差异并不显著( $p>0.05$ )。

## (二)亲社会行为现状及人口学差异分析

研究显示,90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6种类型按项目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紧急( $M=4.036$ )、利他( $M=4.028$ )、情绪性( $M=3.746$ )、匿名( $M=3.722$ )、依从( $M=3.709$ )、公开( $M=3.464$ )。运用SPSS考察人口学在性别、学历、独生子女与否、生源地、学科及年龄段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

### 1. 不同性别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在性别因素上,大学生在紧急( $t=-2.011^*$ ,  $P<0.05$ )、利他( $t=-3.519^{***}$ ,  $p<0.001$ )、依从( $t=-2.691^{**}$ ,  $p<0.01$ )和亲社会行为总分( $t=-2.301^*$ ,  $p<0.05$ )4项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但其他3个指标上差异不显著。

### 2. 不同学历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本科生研究生在紧急( $t=-2.406^*$ ,  $p<0.05$ )、匿名( $t=-2.605^{**}$ ,  $p<0.01$ )、情绪性( $t=-2.165^*$ ,  $p<0.05$ )、依从( $t=-3.413^{**}$ ,  $p<0.01$ )和亲社会行为总分( $t=-2.994^{**}$ ,  $p<0.01$ )5项上呈显著差异,且5个维度均表现出研究生高于本科生。

### 3. 不同年龄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18岁至26岁以上的大学生在匿名( $F=4.694^{**}$ ,  $p<0.01$ )、依从( $F=5.208^{**}$ ,  $p<0.01$ )及亲社会行

为总分( $F=3.985^{**}$ ,  $p<0.01$ )3项上存在一定差异。经事后比较发现,23~25岁大学生得分高于18—22岁大学生。

### 4. 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独生子女与否选项上,大学生在依从( $t=-2.503^*$ ,  $p<0.05$ )和公开( $t=3.052^{**}$ ,  $p<0.01$ )亲社会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及总分上并不存在差异。

### 5.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生源地上,来自农村、城镇、城市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仅在紧急( $F=3.462^*$ ,  $p<0.05$ )维度上存在差异,经事后比较发现,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得分明显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 6. 不同学科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在学科分布上无明显差异( $p>0.05$ )。

## (三)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

事实上,以往研究多关注自我概念一般水平或自我概念的单个因子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但自我概念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自我概念一般水平与具体水平不容混淆、等价。因此,本文从综合、内容、结构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文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双尾检验法”,对自我概念总分及其9个维度与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6种类型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除自我概念的自我批评维度与亲社会行为6种类型及总分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外,其他如:社会自我、家庭自我、道德自我、生理自我、心理自我、自我认同、自我行动、自我满意8个维度均与匿名、依从、公开、利他、紧急、情绪性6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笔者认为,自我批评是负向因子,故其与亲社会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2 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矩阵

变量	紧急	利他	匿名	情绪性	依从	公开	亲社会总分
社会自我	0.331**	0.318**	0.253**	0.287**	0.243**	0.183**	0.337**
生理自我	0.214**	0.238**	0.191**	0.126**	0.158**	0.075*	0.206**
心理自我	0.346**	0.377**	0.299**	0.269**	0.304**	0.178**	0.369**
道德自我	0.380**	0.443**	0.281**	0.257**	0.314**	0.108**	0.378**
家庭自我	0.327**	0.384**	0.267**	0.282**	0.296**	0.167**	0.367**
自我批评	0.034	-0.051	-0.023	0.032	-0.056	0.060	-0.008
自我行动	0.385**	0.429**	0.299**	0.281**	0.300**	0.139**	0.385**
自我满意	0.309**	0.296**	0.236**	0.268**	0.221**	0.194**	0.318**
自我认同	0.377**	0.395**	0.287**	0.300**	0.315**	0.210**	0.397**
自我总分	0.408**	0.429**	0.315**	0.321**	0.315**	0.199**	0.417**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下同。

本文将表2中的相关系数分成三类:较高相关 $|r| \geq 0.3$ 、低相关 $0.1 \leq |r| < 0.3$ 、弱相关 $|r| < 0.1$ 。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有:a)自我概念总体状况与除公开亲社会行为外的5种亲社会行为及总分均显著高相关( $|r| \geq 0.3, p < 0.01$ );这说明自我概念整体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社会自我、家庭自我、心理自我、道德自我4个因子均与紧急、利他及亲社会行为总分都呈显著高相关( $|r| \geq 0.3, p < 0.01$ );但生理自我与公开亲社会行为呈弱相关( $|r| < 0.1, p < 0.05$ );该结果证实了刘志军等<sup>[6]</sup>的结论。同时在研究范畴上有效拓宽了余娟<sup>[7]</sup>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c)自我行动、自我认同、自我满意均

与紧急亲社会行为及亲社会行为总分呈显著高相关( $|r| \geq 0.3, p < 0.01$ );以上结果不仅充分说明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密切,而且从实证角度进一步佐证了郭兰等<sup>[8]</sup>对关于自我概念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的阐述。

#### (四)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

本文为探讨自我概念整体状况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能力,又以自我概念总分为预测变量,以亲社会倾向为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发现:自我概念总分可分别解释紧急、利他、匿名、情绪性、依从、公开及亲社会行为总分维度17.0%、18.4%、8.7%、10.8%、9.8%、4.2%、18.1%的变异量。

表3 自我概念总分对亲社会行为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预测变量	B	R <sup>2</sup>	调整R <sup>2</sup>	F	常量β	t
自我总分	紧急	0.819	0.170	0.169	182.085	0.412	13.494***
	利他	0.893	0.184	0.183	201.575	0.429	14.198***
	匿名	0.651	0.087	0.086	85.196	0.295	9.230***
	情绪性	0.661	0.108	0.107	107.837	0.328	10.384***
	依从	0.612	0.098	0.097	97.123	0.313	9.855***
	公开	0.466	0.042	0.041	39.245	0.205	6.265***
	亲社会总分	0.674	0.181	0.180	197.097	0.425	14.039***

事实上,笔者还以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相关的8个维度及自我概念总分为预测变量,以亲社会行为6种类型及总分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自我概念中的自我行动、自我认同、自我满意3个因子对情绪性亲社会行为及亲社会行为总分具有

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生理自我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4个维度可分别联合预测13.5%和20.7%的变异量。这有效扩展了王楠<sup>[5]</sup>和谢志萍<sup>[9]</sup>的研究,结果详见表4所示。

表4 自我概念8个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 <sup>2</sup>	调整R <sup>2</sup>	F	常量β	t
紧急	自我行动	0.462	0.156	0.155	164.763	0.319	6.035***
	自我认同	0.385	0.178	0.176	96.606	0.211	4.812***
	生理自我	-0.277	0.197	0.194	72.664	-0.195	-4.383**
	道德自我	0.165	0.201	0.198	55.972	0.110	2.221*
利他	道德自我	0.346	0.198	0.197	220.462	0.221	4.557***
	自我行动	0.418	0.218	0.216	124.161	0.276	5.343***
	自我认同	0.305	0.224	0.221	85.648	0.160	3.736***
匿名	生理自我	-0.24	0.236	0.233	68.633	-0.162	-3.725***
	自我行动	0.303	0.077	0.076	74.841	0.189	4.664***
情绪性	自我认同	0.295	0.091	0.089	44.402	0.146	3.600***
	自我认同	0.39	0.086	0.085	84.239	0.211	4.776***
	自我行动	0.354	0.105	0.103	52.07	0.241	4.997***
	生理自我	-0.35	0.126	0.123	42.725	-0.244	-5.168***
依从	自我满意	0.27	0.135	0.131	34.543	0.135	2.977**
	自我认同	0.363	0.090	0.089	87.773	0.203	4.405***
	自我行动	0.294	0.109	0.107	54.278	0.207	3.878***
	生理自我	-0.242	0.121	0.118	40.824	-0.174	-3.721***
	心理自我	0.169	0.125	0.121	31.773	0.110	2.045*

表4续

因变量	自变量	B	R <sup>2</sup>	调整 R <sup>2</sup>	F	常量 β	t
公开	自我满意	0.385	0.042	0.041	38.795	0.171	3.774***
	自我认同	0.311	0.049	0.047	23.087	0.149	3.302**
	生理自我	-0.159	0.054	0.051	17.081	-0.098	-2.207*
亲社会总分	自我行动	0.370	0.151	0.150	159.149	0.321	6.938***
	自我认同	0.387	0.186	0.184	101.482	0.266	6.298***
	生理自我	-0.243	0.203	0.201	75.699	-0.216	-4.766***
	自我满意	0.135	0.207	0.203	57.941	0.086	1.981*

此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从自我概念的内容、结构两大维度考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心理自我与自我认同进入所有回归方程;而道德自我和自我行动进入大部分回归方程;进一步比较个别解释力发现:道德自我对紧急、利他、匿名、情绪性、依从及亲社会行为总分的解释力分别为:14.6%、19.8%、1.5%、1.8%、2%、14.1%。详

见表5。自我行动对紧急、利他、匿名、情绪性、依从及亲社会行为总分的解释力分别为:15.6%、18.3%、7.7%、8.6%、9%、15.1%。结果见表6所示。

综上,自我概念总体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自我概念具体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也不容忽视,道德自我、心理自我、自我认同和自我行动等维度均是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

表5 自我概念内容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 <sup>2</sup>	调整 R <sup>2</sup>	F	常量 β	t
紧急	道德自我	0.417	0.146	0.145	152.182	0.278	6.813***
	社会自我	0.170	0.168	0.166	89.687	0.146	3.517***
	心理自我	0.208	0.172	0.169	61.551	0.133	2.815**
	生理自我	-0.14	0.177	0.173	47.832	-0.099	-2.387*
利他	道德自我	0.522	0.198	0.197	220.462	0.333	7.919***
	家庭自我	0.162	0.212	0.210	119.609	0.130	3.033**
	心理自我	0.197	0.216	0.213	81.555	0.121	2.721**
	生理自我	-0.123	0.219	0.216	62.431	-0.083	-2.045*
匿名	心理自我	0.295	0.072	0.071	69.257	0.171	4.173***
	道德自我	0.260	0.087	0.085	42.458	0.156	3.821***
情绪性	社会自我	0.182	0.082	0.081	79.653	0.154	3.434**
	道德自我	0.180	0.100	0.098	49.473	0.119	2.659**
	生理自我	-0.222	0.106	0.103	35.110	-0.155	-3.582***
	心理自我	0.197	0.115	0.111	28.802	0.125	2.496*
	家庭自我	0.140	0.121	0.116	24.35	0.115	2.43*
依从	心理自我	0.292	0.088	0.087	86.249	0.191	4.042***
	道德自我	0.247	0.108	0.106	54.206	0.168	3.753***
	生理自我	-0.16	0.114	0.111	38.010	-0.115	-2.677**
	家庭自我	0.137	0.120	0.116	30.334	0.117	2.567*
公开	社会自我	0.178	0.037	0.036	33.925	0.134	3.086**
	心理自我	0.157	0.041	0.039	19.105	0.088	2.041*
亲社会总分	道德自我	0.241	0.141	0.140	146.268	0.202	4.715***
	心理自我	0.211	0.171	0.169	91.985	0.17	3.559***
	社会自我	0.109	0.181	0.178	65.516	0.118	2.746**
	生理自我	-0.142	0.188	0.184	51.311	-0.126	-3.03**
	家庭自我	0.114	0.194	0.189	42.715	0.12	2.637**

表6 自我概念结构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 <sup>2</sup>	调整 R <sup>2</sup>	F	常量 $\beta$	t
紧急	自我行动	0.404	0.156	0.155	164.763	0.279	7.245***
	自我认同	0.345	0.178	0.176	96.606	0.189	4.916***
利他	自我行动	0.475	0.183	0.182	199.428	0.314	8.288***
	自我认同	0.353	0.204	0.202	114.225	0.185	4.889***
匿名	自我行动	0.303	0.077	0.076	74.841	0.189	4.664***
	自我认同	0.295	0.091	0.089	44.402	0.146	3.600***
情绪性	自我认同	0.287	0.086	0.085	84.239	0.155	3.574***
	自我行动	0.197	0.105	0.103	52.070	0.135	3.040**
	自我满意	0.177	0.109	0.106	36.110	0.088	1.964
依从	自我认同	0.344	0.090	0.089	87.733	0.192	4.789***
	自我行动	0.249	0.109	0.107	54.278	0.175	4.364***
公开	自我满意	0.301	0.042	0.041	38.795	0.133	3.173**
	自我认同	0.234	0.049	0.047	23.087	0.112	2.667**
亲社会总分	自我行动	0.283	0.151	0.150	159.149	0.245	6.408***
	自我认同	0.340	0.186	0.184	101.482	0.234	6.110***

### 三、大学生社会化、自我概念、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分析

#### (一)大学生社会化:自我概念的作用不可低估

人的社会化过程,从个体角度看是个体自我积极主动参与社会互动,不断学习社会规则,并将外界社会对自我的各种约束、规范和要求逐步内化为个体心理特质,外化为个体稳定的行为模式的过程。换言之,离开自我概念,个体不可能完成真正的社会化过程。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概念的作用不可低估。原因如下:

首先,大学生社会行为目标的形成和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对自身能力的觉知。大学生依据自身掌握知识和观念会对自身行为的价值意义做出评判,进而决定是否采取相应行为。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也认为,行为者在对社会信息予以关注的基础上,会将榜样力量以浓缩符号形式进行内化保存,进而依靠组织反应,产生动作再现或继续得到强化。在此过程中,个体获得行为与结果的认知体验,形成完整的自我概念系统。

其次,积极的自我概念能够给大学生社会行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心理动力。自我概念的心理维度主要反映了主体在与社会现实互动中的自我价值感和心理成熟度。当理想自我与现实社会达到相符且满意程度时,积极的自我概念将有利于增加大学生成功情绪体验,进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自尊心、自信心,这有利于个体采取积极的利他性的社会行为。

再次,自我概念的激发和调节作用对社会行为的发生有较大驱动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自我概念对社会行为的发生有驱动作用,在个体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自我概念可激发主体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完成既定行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自我概念对干扰因素的抑制、解释作用,它帮助主体抑制一切与行为目标无关的行为,引导行为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良好的自我概念不仅对大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升大学生社会行为发生的能动性有重大推动作用。

#### (二)自我概念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显著

本文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中的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生理自我4个维度可联合预测20.7%的变异量,这充分表明自我概念这四个因子对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这是因为大学生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主要反映其认知水平、情感需求及行为抉择,即该群体的自我概念状况及水平。同时,自我概念总分能单独解释利他和亲社会行为总分18.4%、18.1%的变异量,表明自我概念总体对亲社会行为影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王楠的研究结果。

较高的自我认同水平有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0]</sup>。人的发展离不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进行比较。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人

依据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反思性自我”<sup>[11]</sup>。当个体经过反省的自我判断与社会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相一致时,个体较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更易采取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亲社会行为。否则,则可能产生认同危机,进而导致偏离社会标准的失范行为。

积极的情绪体验利于个体调节自我认知,克服认同危机,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确立,生理上和心理上也不够成熟,情绪变化较为激烈。他们对自己反思的主观性认知程度不高,自省过程中建构的“理想我”与客观世界中的“现实我”较易产生矛盾与冲突,易产生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出现自卑、情绪低落等心境,归属感降低,进而产生偏激性或退缩性社会行为。而良好的自我概念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则积极调整自我,达到个体与社会的一致性平衡,产生较高的心理支持感和满意度,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自我行动作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社会法则、保持心态平衡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其本身就需要通过亲社会行为来获得。通常当主体与关系发生对象交往顺利、关系和谐时,则大学生与社会的关系呈良性循环,更易做出亲社会行为。反之,则会直接影响主体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甚至产生个体社会融入困难问题。

此外,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生理自我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发生存在一定的吻合。如:残疾人勇救落水老人,病患闯火海救出襁褓中的婴儿。其前提都是将自我安危置之度外,未将自身生理状况作为必备条件加以考虑,而是完全从主观愿望出发所做出的亲社会行为。

综上,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正如自我知觉理论强调:“若个体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么,他就会很自然的做出亲社会行为。”<sup>[12]</sup>就本文研究得到的大学生在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道德自我等维度上得分有待提高的事实。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看到身处多元环境中的大学生,存在自我认知模糊,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满意度感偏低,社会角色定位不准,自我概念出现偏差,尤其是道德自我建构面临巨大挑战,造成在行为抉择上亲社会行为弱化现象。针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本文的结论,提出了新时期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同时,牢牢把握高校大学生群体自我概念的特征,从提升主体的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道德自我入手,有效提升其亲社会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与讨论,不难发现自我概念中的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提升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促进大学生个体社会化良性发展,教育工作者要重视从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如:清楚地了解和把握校园中大学生主体的诉求,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塑造学生道德人格;有条件的院校应开设心理课程与讲座,建立心理辅导一对一机制,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帮助大学生合理宣泄负面情绪,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提高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满意度;多渠道组织大学生学习进入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学以致用;强化实践训练,提高自我行动力。

#### 四、结 语

培养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校园中,接触社会面较窄,为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能忽视对其社会化的有效引导。合理情绪行为疗法的创立者、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强调,个体的认知和信念、观念等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关键,是促成个体行为发生的中介要素<sup>[13]</sup>。由此可见,实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自我概念的内化和调节作用,增强大学生对社会责任、道德感的信念、价值观、偏好等来强化亲社会行为。本文对 90 后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做了有益的探讨,但研究视角还可进一步拓展。事实上,自我概念是一个极为广义的概念,后续研究可就自我概念的延伸部分如自恋、自我关注、自我意识、自尊<sup>[14-15]</sup>等作进一步探究,对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质性分析,通过定量研究技术精确地考察自我概念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当然,关于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也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方向。

另外,本文采用的方法较为单一,未来研究可考虑个案研究,通过个体访谈等方式获取被试更多的信息。也可尝试模拟真实情境的实验研究,为加深对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理解提供可靠的实验数据支持,以提高对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认知,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2] 安德烈耶娃. 社会心理学[M]. 李钊等译. 上海: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4: 311.
- [3] 黄希庭. 简明心理学辞典[K].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284.
- [4] 王美芳, 庞维国.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式[J]. 心理科学进展, 1997(4): 36.
- [5] 王楠. 大学生自我概念、亲社会行为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 [6] 刘志军, 张英, 谭千宝. 高中生的自我概念、父母教养方式与其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30): 112-115.
- [7] 余娟. 中学生亲社会行为及其与自我概念的相关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6.
- [8] 郭兰, 张建平. 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两个主要因素[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1(2): 60-62.
- [9] 谢志萍. 初中生自我概念与社会行为发展特点及关系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04.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
- [11]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 方文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8: 58.
- [12] 王振其, 程斌. 自我概念在亲社会行为形成中的作用[J]. 淮南师专学报, 2000(4): 60-61.
- [13] 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9-72.
- [14] 陆冬晓, 甄月桥. 大学生自尊心变性: 双重权变形式模型的构建[J]. 人类工效学, 2017(1): 40-47.
- [15] 陆冬晓, 甄月桥. 大学生自尊获取机制与自尊发展的关系[J]. 教育导刊, 2016(10): 50-55.

##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cept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ZHEN Yueqiao<sup>a</sup>, ZHANG Yinpeng<sup>b</sup>, ZHU Ruhua<sup>c</sup>

(a. Party Committee of Institution; b. School of Marxism; 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o cultivate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important tasks for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live a secluded life in the ivory tower and lack the cognition of the society. To make them better adapt to and serve for the society, no educators can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effective instructions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fact,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ir self-concept. A total of 950 college students in Hangzhou Xiasha Higher Education Park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As a result, the scores of both self-concep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generally high and there is a demographic differenc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cep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all nine dimensions of self-concept,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eight dimensions of self-concept and six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with an excep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self-criticism.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self-concept, moral self and self-action have a good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Grasping the link between self-concep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paves a way for a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self concept; pro-social behavior

(责任编辑: 王艳娟)

# 协同论视域下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深度融合理念转型与机制探索

王 琼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思政教研室,杭州 311112)

**摘 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运用协同论梳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规模化课程系统、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及相互关系,得出社会教育制度环境差异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是影响各系统协同关系的重要因素的结论。通过协同教育理念、协同教学模式、协同保障机制,发挥协同效应,可实现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信息技术;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论;融合理念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2-0099-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1]</sup>。”这是当前形势下,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和重要指导意见,也为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的运用和实践指明了方向。从高校思政教学实践看,信息技术与思政课之间无论是从理念认知还是教学实践来看,都与“深度融合”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为目前各类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的开展已经从最初的微课、翻转课堂(FLIP)、慕课(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等进入混合教学的阶段,研究方向已从概念界定,模式选择阶段进入到课程建设阶段,并最终融入教学阶段,但是由于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领域窄,使用信息技术的思政教学各环节之间缺乏系统性关联,从而导致信息技术运用虽然使用频次较高但对思政课实效性提升效用不显著,思政信息化教学表面热而实质冷的问题较为突出。

信息技术在思政课中的运用已不仅仅是当前信息化浪潮背景下的被动选择,或只作为教育研究服

务促进教学教改工作的工具,而是两者之间不断地交汇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形态<sup>[2]</sup>。但对于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形态能否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高效课堂教学的契机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信息技术能改变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方式,代表思政教学改革未来方向,可以成为思政课高效课堂教学的契机,并希望藉此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出现突破性进展<sup>[3]</sup>。二是认为信息技术运用过程中简单跟风运用或不恰当使用,不仅无法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反而有丧失传统思政课优势的风险,需要对这种教育领域的热潮进行谨慎冷静的思考<sup>[4]</sup>。从以上分歧可见,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未深度融合是造成思政课实效性无法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而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一、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各子系统分析

所谓深度融合即在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政课两者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教学模式,促进教学教改工作,充分凸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

效性,并在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两者之间的双向建构过程中,突破“使用”、“运用”等传统范畴,实现理念和机制的高度整合,形成了一个由新的核心理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构成的与传统教学形态截然不同的教学综合系统。这一教学综合系统以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同教学模块结合,形成了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若干子系统,聚合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系统构架,体现为信息技术与思政课融合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等。协同论认为各子系统之间互相协调配合就能协同效应,形成耦合关系。反之,各子系统彼此互不关联或相互掣肘,就会造成整个管理系统内耗增加<sup>[5]</sup>,系统内各子系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整个系统将处于无序状态,因此对各子系统状况进行具体分析是建立深度融合机制的基础。与传统的硬件设备运用于思政课堂教学不同,本文所界定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的信息技术手段主要是指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即主要通过移动技术、网络技术、三维计算机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字化学习技术、和综合技术等技术类目类别为主的模式,根据其系统化程度以及在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程度和运用特点可分为以下几个系统:

### (一)规模化课程系统

规模化课程系统是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最主要形式,包括各类在线开放精品课程、慕课(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体系,以及各高校依托此类课程体系而形成的网络教学体系等;在信息技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借用PC或移动终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以帮助学生构建一个自主、开放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为核心目标,通过在线学习、在线互动、在线测试等一系列方式为载体,同时借助丰富的后台数据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使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得以落实,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过程。规模化课程系统是思政实体理论授课方式一种重大变革,优点在于以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为基础,打破传统学习方式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提升教学效果等。但在推进规模化的信息系统课程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校建设水平不一,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意愿和技能不一,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不一等问题相继凸显,成为影响系统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 (二)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

这是目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辅

助教学系统。主要以微博、微信、QQ等各种互动交往型的社交工具和平台,以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心理状况的手机运用,以及各类以提高课堂管理效率为主的网络平台和运用为载体。在信息技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以特定的网络社交工具和情境影响师生互动和交往模式,并通过塑造舆论焦点和舆论共识等影响教学内容。其优点在于能有效地辅助理论课主体课堂提高教学的效率,针对当前思想政治课大班教学师生互动不充分的问题,网络课程师生互动不充分的问题,实现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嵌入。使得教师有意识地参与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去,并形成教学的土壤和成长环境,将有助于大幅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当前这种辅助教学方式组织化程度不高,组织系统内部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受限和客观环境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 (三)虚拟实践教学系统。

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形式主要是通过创设具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和意义的虚拟仿真场景,对学生开展具有一定教育目的的实训活动。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运用过程中,Virtual reality(VR)虚拟现实技术平台可以更多地被运用于思政课实践活动中。一般认为,VR实践教学“是顺应信息时代下的新媒体环境发展需求及学生的接受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而创设的实践教学形态,它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发展规律及新生代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较之其他实践教学方式,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实践优势”<sup>[6]</sup>。目前该技术手段在思想政治课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但随着未来若干年份中VR技术运用于教学将成为一种趋势,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将有效地改善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时间和空间受限的特点。

根据协同论的观点,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并不会自发的实现,唯有从宏观环境入手,分析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机制中的各个子系统及相互关系,考察影响两者融合的诸因素,探究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融合机制,才是实现两者深度融合必经之路。规模化课程系统、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是各类信息技术与思政课各领域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基本涵盖了当前思政课传统教学领域中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及部分第二课堂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是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融合机制的基础。

## 二、深度融合各子系统协同关系序参量分析

序参量是指综合系统内外对各个子系统协同作用发挥起决定性作用的参量形式。对于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体系而言,判断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教学系统中的序参量形式,并分析它对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是实现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耦合,呈现有序发展的核心要素<sup>[7]</sup>,也是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深度融合路径的关键所在。目前对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造成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

### (一)教育体制环境差异

教育体制环境对系统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各子系统平衡关系的影响。信息技术与类思政类学科教育融合的主要形式在西方教育体制环境下主要以规模化课程系统形式呈现,促成这一融合的动力、价值关怀、建设机制、保障机制均与本土思政课的融合形式不同。西方建设规模化系统课程重要原因是高校生源锐减,基于成本控制而提出的以标准化形式提供的课程传播形式,其内在动力源自于教育市场化的需求,相关的课程体系需经市场调研,由网络教育平台联合各高校以商业化的资金投入的运作方式开展课程建设,课程内容和课程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市场化特点,并主要通过高昂学费的方式约束学生的学习行为,通过线上测验等方式监测学习结果,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的约束力较弱。而中国建设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目的在于运用信息技术以促进课程教学教改,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和教学实效性,其建设推动力主要源自于教育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肩负着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重任,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责任。主要通过政策和规划导向,由教育主管部门推动,名校牵头建设,通过实体课堂以及学校对课程的有效管理,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辅助和约束,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

当前国内思政课在信息化建设方法论层面过多依赖于西方信息化教学经验,造成思政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平衡以及互相掣肘的局面。在西方教育体制环境下基于强烈的市场化动因,信息技术与类思政课程的高度融合呈现为规模化课程系统占绝对主导地位,而碎片化的教学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缺失的特点。目前我国思政课程教学中,主要通过在线开放课程、微课、慕课或部分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开展思政课程的信息化建

设,信息技术在第二课堂和思政实践教学领域中的运用未受到应有重视,造成思政综合教学体系中各子系统发展不平衡,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和信息化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的功能和优势未能较好发挥。同时,西方教育体制下基于自下而上和网络平台主导的课程建设组织形式使得信息化课程教学内容选择缺少倾向性,在课程设置上具有分散性,在课程效果监测上缺乏制约性,无法保证三大系统课程内容体系的连贯和同向,呈现无序和非系统化的特征。而对于中国的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而言,不仅要求内容选择的规范化也要求建设方式上的系统化,如借鉴西方信息化建设方式将缺乏系统的规划,易导致各子系统出现教学资源选择的分歧和价值观的冲突,出现各子系统之间互相掣肘、实效性抵消的情况。

### (二)思政课学科教学特点

思政课学科教学特点对系统间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各子系统耦合关系的影响。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意识形态性、批判性和社会实践性、强时效性等鲜明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信息技术手段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区别于其他学科。其中意识形态特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特征,也是思政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三大子系统协同关系的内在规定和价值倾向。该特征要求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学科定位和教学资源选择必须谨慎,注意甄别和选择,要在科学性、学术性的基础上强调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宗旨,以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教学内容。批判性和社会实践性是思政课作为主要指导性理论的基本特点,体现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功能倾向性。例如思政规模化课程倾向于系统性理论教育功能,但以慕课为例,慕课的网络在线教学模式只是做到了课程资源的共享,却无法给予学习者校园文化熏陶、社交互动等能力的培养<sup>[8]</sup>。同时,由于慕课缺失课堂教学,教师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师生间口传心授的情感交流都不复存在<sup>[9]</sup>。因此,慕课只是一个课程的传递共享平台,仍需教师的讲授<sup>[10]</sup>。而思政学科教学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实践性则更多地依赖于校园文化、社交及舆论环境等客观外部教学环境,以及相关学生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碎片化的辅助教学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则承担着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按思政课教学要求构建外部教学环境、突破实践教学限制条件开展教学以达到良好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功能。强时效性决定了教学

资源持续更新的必要性,是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耦合功能发挥的主要场域。理论联系实际并适当地根据不断丰富的理论时代内容等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是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核心要求。思政学科资源建设过程中,后期更新和维护的频率等将要远远高于其他学科,且三大系统的相关资源更新必须保持同步,方能真正形成耦合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在资源更新过程中,规模化课程信息系统提供理论引导,碎片化教学信息系统提供即时教学资源,而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则按其他两大系统提供的教学资源适时调整实践活动内容。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教学系统中,影响各系统之间关系的具体因素很多,找出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就能把握整个系统的发展方向。

### 三、参量因素影响下的信息技术 与思政课深度融合机制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过程中,本土化的教学情境及思想政治特定学科两大参量因素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教学体系将主要通过控制外部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以相同的教育目标和深度融合为指向,形成一系列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具体路径。

#### (一)形成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导系统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

共同的教育理念主要是指基于共同的教学目标和技术环境并渗透于所有子系统和系统要素之中,形成包括实现资源共享,丰富课堂表现形式、拓宽师生交互方式、虚拟教学环境、完善记录评价等涵盖整个教学目标系在内的教学形态的塑造。教育理念的一致性是在外部社会情境和思政课学科特点的影响下实现协同机制的基础,有助于各子系统协同,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政课之间的融合程度以展示性——工具性——实质性层次不断深入。贯彻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形成协同教育模式的基础。

在开展各类信息系统平台系统建设时,不仅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使之成贯穿三大平台系统建设的理念导向和价值目标,更要充分考虑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定位,开展各类信息平台建设时,均要以思想政治课为主体和依托。要根据各个子系统当前所处的不同建设阶段和建设要求做好规划,在全面开展规模化课程系统建设的同时,强调碎片化教学系统和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

在思政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三大系统建设的均衡发展。在全力开展规模化课程系统建设时,处理好“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客观看待西方经验,审慎对待西方教学资源,不以技术手段使用的强度和范围来衡量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的融合程度,并适时结合不同的学生类型,学校特点和授课层次,制定恰当融合策略,因地、因时制宜,不搞一刀切。要鼓励碎片化教学系统的多元化发展,可以根据学校的地域、教育层次、教学特点、校园文化等,积极探索截然不同的建设模式,使之成为思政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并以学校为主体积极探索适合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工具运用于思想政治课的实践研究,将各富有蓬勃生机的教育素材和教育思想融入其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第二课堂模式。要加大对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的投入和研究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连接点,围绕思政课的建设要求,逐步形成虚拟现实场景规范化建设范式。

#### (二)建设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三大子系统协同发展的教学模式

突破实体课程、网络课程、实践课程壁垒,根据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倾向,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探索与规模化课程系统、碎片化教学系统以及与实践教学系统建设的有效连接方式,以发挥系统协同效应。首先是围绕思想政治课学习的知识、情、意三大目标系,以现有的课程理论知识体系为基础,在建立各种类型思政学习资源库的基础上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综合利用各种技术和媒体形式,及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理论、新政策、新成果开展学习和研究,结合学生特点和学校实际开发适合网络学习特点的各类型的思政学习资源,包括微课视频、讲座视频、学生活动视频、调研视频以及相关的学习材料、互联网+教材等,除固定的教学内容外,还可以将动态的课堂讨论、学生思政社团活动、实践教学成果等纳入资源体系,实现思政综合化信息系统平台内部各种资源的有效流通和运用,并根据实际更新平台资源,建立三大教学系统平台定期联动更新制度,确保三大信息系统平台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其次是根据三大系统功能倾向,建立互补性的教学模式,实体课堂与网络课堂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现实教学与虚拟教学相结合的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体系。在规模化课程系统教学开展过程中,学习者进行思政相关课程的系统性学习,并通过答疑、考试等完成

完整的学习流程,主要体现学习的深度和系统性。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通过各类社交工具和新媒体工具,提前形成问题讨论的场域,塑造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并使教师能提前了解学生对于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和基本态度,并及时调整规模化教学的线下讨论教学设计,有效提高线上和线下交流活动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学习的灵活性和即时性。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则通过规模化教学的理论指导,碎片化教学系统的情境导学,模拟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状况,由学生开展调研、分析,从而实现规模化课程和碎片化教学的扩展和延伸。因此,在规模化课程系统中,无论是社会热点、教师观点和学生作品、社交活动以及课程实践教学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均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更完整的记录,更大范围的有效传播,发挥思政教学隐性教育的功能,实现实体课堂和网络课堂、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现实教学与虚拟教学的有机衔接。

**(三)建立思政科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三大系统协调运行的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规范碎片化教学系统和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建设形式,防止随意性和分散性。为充分发挥协同教学模式重要作用,应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硬件保障三个方面保障并推动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深度融合。一是要将信息技

术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同领域的融合推进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框架,精心部署,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融合。推动各个学校的基层探索机制,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结合的推动体系。在学校内部,成立推动融合工作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二是要加强制度保障,形成合力。规模化课程系统建设时间早,拥有较规范的建设方案和机制,碎片化教学系统以及虚拟实践平台系统的建设则必须以规模化课程系统为参照,避免建设过程中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应由思政教研部门提交行之有效的建设方案,教学资源须经教学团队讨论和专家评估,建立资源更新的联动机制以及建设实效性评估机制等。三是要实现信息技术实施的硬件和软件保障。加大对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增强课程资源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加强对信息系统平台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信息技术各子系统顺利运行。同时建立相应的培训和激励机制以引导教师自觉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工具等。

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协同发展的教学模式必须以资源平台为基础,以三大系统综合性思政教学为主导,以信息化互动交往圈为环境与保障,共同构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深度融合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体系。

以上的系统、参数和机制,可以用图 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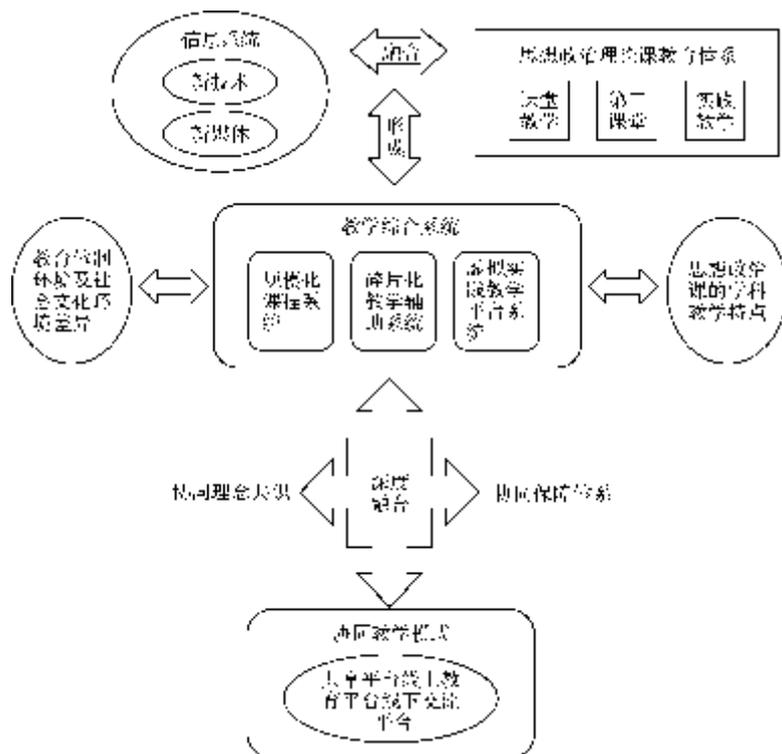


图 1 融合机制概略图

从图1可以看出,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必须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综合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影响思政子系统协同作用发挥的主要是教育体制环境差异和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特点等两大参量因素。

#### 四、结 语

通过探究两大参量因素影响下系统协同作用发挥掣肘受限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协同教育理念、协同教学模式、协同保障机制等作为实现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的对策,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效。在信息系统和思政课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思政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渗透,其内涵和外延将不断变化。在不同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层次视角下,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也将呈现截然不同形态和模式,各子系统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被赋予全新的功能和定位,结合不同主体层次进行个案分析和开展实证研究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此项研究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 [2] 沈壮海,史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J].2017(1):15-21.
- [3] 雷儒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
- [4] 马秋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慕课的风险及规避策略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J].2016(3):123-126.
- [5] 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7-9.
- [6] 邱婷.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校本推进策略研究与实践.中国教育信息化[J].2013(9):39-41.
- [7] 哈肯.协同学引论[M].徐锡申,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4:2-3.
- [8] 彭德倩.慕课来了挑战传统大学教育学校间围墙将被消融[N].解放日报,2013-07-09(2).
- [9] 顾钰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慕课热”以后的“冷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J].2016(1):115-122.
- [10] 吴万伟.“慕课热”的冷思考.复旦教育论坛[J].2014,12(1):10-17.

## Idea and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s

WANG Qi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y Political The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1112, China)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ynergetics is used to sort out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large scale curriculum system, the fragmented education-aided system and the virtual practice teaching platform system which ar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uch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 of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synerge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ystems.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an be realized by synthesizing education concept, synthesizing education model, synthesizing safeguard mechanism and play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ystem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ynergetics; concept of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王艳娟)



##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九届编委会成员

主 任 裘松良 常务副主任 陈文兴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王兆青	刘朝马	杜时贵	李加林
杨云芳	邹奉元	汪亚明	沈满洪	陈文华
陈文兴	陈改玲	陈建勇	郑旭明	赵辅昆
胡旭东	胡觉亮	胡剑锋	姚菊明	徐定华
渠长根	喻擎苍	傅雅琴	蒙兴灿	裘松良

秘 书 长 郑今欢  
 主 编 陈文兴  
 副 主 编 唐志荣

##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ZHEJIANG LIGONG DAXUE XUEBAO

月刊(Monthly)

逢双月 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第1期 2018年2月

Feb. 2018, Vol. 40 No.1

(1979年9月创刊)

(Started Publication in Sept. 1979)

主管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b>Authority in Charge:</b>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主办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	<b>Sponsor:</b>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出 版: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	<b>Published by:</b> Periodicals Agency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社 长: 郑今欢	<b>Edited by:</b> J.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t.
编 辑: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电话: (0571) 86843739 (兼传真) 86843152 电子信箱: Journal@zstu.edu.cn 网址: http://xuebao.zstu.edu.cn/ 地址: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浙江理工大学(310018)	Address: Xiasha Higher Education Zone, Hangzhou 310018, China Tel: (0571)86843739 86843152 E-mail: Journal@zstu.edu.cn Website: http://xuebao.zstu.edu.cn/
主 编: 陈文兴	<b>Editor in Chief:</b> Chen Wenxing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杭州莫干山路勾庄)	<b>Printed by:</b> Hangzhou Yuhang People's Printing Co., Ltd. (Gouzhuang, Moganshan Road, Hangzhou)
订购发行: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18年2月10日	<b>Issue Date:</b> Feb. 10, 2018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定价: 10.00元

ISSN 1673-3851



9 771673 385183

